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难忘的故事

出奇制胜

第八册



出奇制胜 难忘的故事

## 毛泽东和他的哨兵们

1937年元月，中央机关从志丹县搬到延安城。毛主席住在了凤凰山下的一个院落里。

那一年冬天特别冷。

一天早晨，毛主席同往常一样早早起来，走出窑洞，打算活动活动筋骨。

天阴惨惨的正在下雪，寒风卷着大片的雪花铺天盖地地袭卷了凤凰山。

主席不禁打了个寒颤。但他没有立即回屋，而是大步走进了风雪中，走到了院门口站岗的哨兵面前。

哨兵是位个头不高却很结实的小战士，尽管落了一身的雪，却仍旧笔直地挺立着。见到主席走来，郑重地行了个军礼。

主席拍了拍小战士的肩膀，赞许地说：“好样的！小鬼！”他摸了摸小战士的衣服，满脸的关切之情，问：“天变啦，冷吧？”

“不冷！”小战士把胸脯挺得高高的，实际上他的浑身上下已经冷得不行了。

“别撒谎了。我刚从屋子里出来还打了个寒颤呢。”主席的话里充满了疼爱。“哦，你等一下。”说着，他转过身，大步地往回走去。片刻，他又从窑洞中出来，手里拿了件破旧的棉大衣，这件棉大衣不知从哪天起就陪在主席身边了，爬过雪山，趟过草地，主席一直舍不得丢弃。

主席轻轻地把大衣披在哨兵身上：“穿上吧，破是破了些，还能挡些风雪。”

“主席，我不要！”哨兵连连摇头。他怎么能要这件大衣呢？主席在深夜里工作时，还得用它来御寒呢！

“听话，小鬼，这是命令！”主席故意用严肃的口吻说。

“可是您？”哨兵的眼中泛起一层浓浓的水雾。

“我不冷！屋子里生着火，比这冰天雪地可暖和多了。”主席一边给哨兵系着大衣扣子一边说。又恢复了和蔼慈祥的笑容。

“日寇封锁紧，咱们生活条件差，穿不上暖和的棉衣。可只要我们有信心，一咬牙就挺过去了！”他的目光中充满了信心。“以后，谁上岗谁就穿上这件大衣。你们既要坚守岗位，又不要冻坏了身子，如果你们都冻病了，谁来警卫我？咱们要互相关心嘛。”主席帮哨兵把武装带系好，“小鬼，你站你的岗，我也该回去干我的工作了。”他转过身来，走了。风雪中，是他那高大坚毅的身形。

毛主席地位虽然很高，但他很平易近人，从不拿架子。办公间隙时，他常常和哨兵们拉家常，或到他们住的房子里坐坐看看，问寒问暖，还教他们读书认字。

一天中午快吃午饭前，主席又来到哨兵宿舍里。由于战士们正在全神贯注地复习主席教的字，主席进了门，他们都毫无觉察。

主席怕打扰他们，便一声不出地站在门口，脸上满是欣慰的笑。突然，他发现一位姓陈的小战士右手握着笔认真地一笔一划地写着，而左手却使劲地捂着胃部，脸色煞白，豆大的汗珠顺着两颊流淌。

“这小鬼，准是胃病又犯了。”主席知道小陈的胃不好，平时就常提醒他多注意。可是生活实在艰苦，吃的又实在不好，能怎么注意呢！

主席轻手轻脚地退出屋来，对正在站岗的哨兵说：“小鬼，去向李医生

要点治胃疼的药来。另外通知炊事班，午饭做碗面条。”

“是！”哨兵“啪”一个立正，转身跑去了。一边跑一边纳闷：主席没有胃病呀，要治胃病的药干嘛？转而他又有点高兴：平时，主席总和我们吃同样的高粱米煮野菜糊糊，这回终于主动吃碗面条了，应该说是个大进步。

很快，胃药和面条一同送到了主席房间。主席满意地看了看那碗顶香顶香的白面条，小心地端起来，走出自己的窑洞，来到了哨兵宿舍中。战士们仍在专心地学着。

主席悄悄地走到小陈面前，轻声地说：“小鬼，胃疼了吧？”

小陈吃了一惊，一见是主席，连忙“腾”地站起来，其他战士也抬起头来。

“主席，我……没胃疼。”小陈又摇头，又摆手。

“别扯谎嘛！疼得汗都出来了！”主席把面条放到桌上，把药片放到小陈手里。“先把药吃了，再把面条吃下去，就好喽。”

“这……，主席……，我……”小陈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

其他战士们明白了眼前发生的事情后也都十分激动。他们呼啦围过来，七嘴八舌地说着：

“主席，您自己都舍不得吃一口白面。”

“主席，您对我们太好了！”

“我们都没发现小陈病了，主席怎么知道的？”

“小陈，你就吃了吧！”

那位去取药的战士这才知道，原来主席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战士呀！

在主席关切的目光里，小陈流着泪吃下了药，吃下了面条。

“小鬼，好好保护身体哟。别忘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主席宽厚地笑着，又对大家说：“走，该喝咱们的高粱粥去了！”

“走！”战士们声音乐观而有力！

## “柴胡”和狗

抗日战争时期，身为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叶剑英同志工作十分繁忙，他房间的灯光常常到后半夜两三点钟才熄灭，甚至彻夜长明。加上日寇疯狂的“扫荡”，严密的封锁，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十分艰苦，缺吃少穿的。叶总长的身体日渐消瘦憔悴下去，宽阔的前额像糊上了一层铁锈一样失去了光泽。

警卫员、通信员们看到他日渐变差的身体状况，那个急呀！几次正面“批评”，侧面提醒，收效却微乎其微。没办法，叶总长就是这样，工作起来不要命！

一天清晨，阳光透过窗子照亮了房间，又是伏案通宵的叶剑英吹熄了油灯，站起身来，想到外面活动一下手脚。突然，他感到浑身发冷、脸色苍白，牙齿和四肢抖动不止。正巧警卫员小陈进来送开水，一见他这样，慌了。放下水壶，连托带抱地把他放到炕上。又飞似地冲出去叫来了卫生处的肖医生。

经医生诊断，确诊为隔日疟疾。

“怎么样，问题不大吧？”叶剑英感到说话有些吃力，但他尽量装作无所谓的样子。

“是隔日疟疾。”肖医生也故意使语调显得轻松，为的是让叶总长放心。“首长，先打一支‘奎宁’看看。”一边说着，一边熟练地做着注射准备。

“‘奎宁’？”叶剑英摇了摇头说：“不要用‘奎宁’，我这点病用‘柴胡’就可以了。”他知道，由于日寇的封锁，根据地的药品十分短缺，“奎宁”的数量非常少，属于珍贵药品，而柴胡是咱们自己的总部药厂生产的，相对多些。

“这——！”肖医生犯了难。由于技术设备等方面的原因，咱们自己生产的柴胡注射液有些杂质，不但效果不如奎宁，还有可能会出现热源反应，怎么能给叶总参谋长用这样的药呢？万一出点问题，耽误了治疗，可不是小问题呀！于是，他争取道：“首长，你的病实际上还有一定的严重性，用‘奎宁’会好得快些！”

“‘柴胡’也可以嘛！别的同志患疟疾不都是用它吗？”叶剑英的语气不容置疑。

“可是，您是首长，有许多工作等着你去做，你得尽快恢复健康呀！”警卫员小陈也帮着肖医生劝说。

“首长——首长就该用好药吗？”叶剑英的声音仍然和缓，却也不乏严肃和坚决：“我们现在这点好药是许多同志冒着生命危险，甚至是用血换来的，应该给重伤员用，他们在前方英勇杀敌、流血负伤，保卫着我们的根据地，难道不应该尽量给他们用最好的药？”这些话几乎是用全身力气说出来的，累得他喘了好一会儿气。待稍稍平静后，叶总长十分真诚地望着肖医生，像是命令，又像是请求地说：“请给我用‘柴胡’吧！”

肖医生凝视着叶总长憔悴的病容，回味着他动人的言语，渐渐地视线模糊了。面对这样一位严于律己，时时处处为前线将士着想的首长，他还能说什么呢？只好小心翼翼地为首长注射了一支“柴胡”。

两天后，叶剑英的病好了，只是身子骨还很虚弱。

警卫员小陈找到通信员小胡商量：叶总长病刚好，需要增加些营养，可伙房里的饭连白面、大米都难得一见，更别提肉了。叶总长是广东人，爱吃狗肉，咱们一块到老乡家里给他买只狗吃吧。

小胡完全同意小陈的想法。于是，两个人便兴冲冲地出去了。可是，跑遍了整个村子，连只狗的影子都没看见。他们俩难受得要命。哭丧着脸往回走。幸好碰到一位热心的老乡，告诉他们离村不远的小镇上有个小地主，家里养了好几只狗。他们可以去看看。

小陈小胡又来了劲头，一路小跑着到了镇上，果然，镇东头有一户养了好几只狗的小地主。那几只狗都不大，看样子肉一定嫩而鲜。于是，他们的高兴劲儿就甭提了。

本打算用钱买一只，可又一想：这是地主家的狗。打土豪还付什么钱呢？于是他们连招呼都没打，捉了一只小狗就回去了。

吃晚饭的时候，小陈把炖好的香喷喷的狗肉端到叶剑英面前：“首长，您补补身体吧！”眉宇间不乏得意之色。

叶剑英看到一大碗狗肉，不由一愣，而后和蔼地问：“这是哪儿来的？”

小陈便滔滔不绝地把经过讲了一遍，以为首长会夸奖他们。

可叶剑英的表情却严肃起来，语重心长地说：“小鬼，现在不比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了，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团结的力量越多越好。当然，对反动的恶霸地主是要镇压的，但是，对一般的地主却要团结，小地主更是我们的团结对象呀！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有着严明的纪律！我们不是

经常唱：‘红军纪律最严明，大家要牢记，切莫忘记了，打土豪要归公，不拿半分毫，谁要违反了，处罚决不饶。’我军的纪律人人都要自觉遵守，我们不能光会唱，还要照着去做呀！”他拍了拍小陈的肩膀，态度又和蔼下来：“小鬼，要知道政策和策略很重要，搞革命一定要讲政策，讲纪律啊！这样我们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维护，才能战胜敌人。”

叶剑英的一番话，使两个小战士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他们深为自己不懂政策、违反了纪律而后悔，很快赔偿了这户小地主的狗钱，并诚恳地作了检讨。

## 智斗不速之客

“西安事变”虽然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然而在大敌当前，大片国土沦丧，日寇铁蹄践踏我大好河山之际，蒋介石却仍不忘消灭共产党，总想以抗日之名，把八路军推上前线与日军正面交锋，企图借日寇之手消灭八路军。在八路军第129师师部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一天，第129师师部来了一位名叫乔茂才的国民党官员，声称要见师长刘伯承。当时任该师参谋处长的李达接待了他。令李达感到奇怪的是，事先既没有接到八路军总部的通知，也没有国民党第2战区的通知，此人还口口声声地说有要事需面见刘伯承本人。李达立即报告了师长刘伯承。

刘伯承想了想说：“这个乔茂才我认识，可是我已经和他几十年没有来往了。听说他做了国民党的高级参议，来我们这儿干什么呢？在没有弄清他的来意之前，我暂时不好出面。你先去招待一下，搞清他的真实来意。对他就说我到前边部队检查工作，有什么事，待我回来再说。”

李达来到会客室，告诉乔茂才，师长到部队检查去了，现在还没有回来。乔茂才着急地问：“不知何时能回师部？”

“那说不好，师长走时，也没有说定回来的日期。”

闻此言，乔茂才不知所措地在屋里走来走去，看着他那副着急模样，李达试探地问道：“乔参议，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可否由我等师长回来秉告转达？”

乔茂才终于沉不住气了，说：“李处长，兄弟此行，一是拜望，二是有公事相商。请您转告刘师长。”说着，从公文包中取出一封公函递给李达，“请李处长过目。”

李达接过来一看，原来是蒋介石亲笔签署的一个命令。大意是：要129师经陇海路转平汉路北上，加入石家庄方向作战。

李达看罢，觉得这里面大有文章：第一，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交给129师的任务，是到晋北方向，协助阎锡山的晋绥军抗击从忻口方向朝太原攻击的日军，然后南下开辟太行山等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并无参加国民党军的正面作战之说。第二，国共谈判时已商定，国民党政府指挥八路军各部队，应通过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于是，他问道：“乔参议，蒋委员长的手令，朱德总司令看过了吗？怎么我们没有接到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呢？”

“没，没有。”乔茂才很尴尬。

李达见状，便暂时稳住他说：“这个命令，先放在我这里，刘师长回来就交给他。我先给你找间房子休息一下。”

李达安顿好乔茂才后，又派了两名参谋“陪伴”他，这才拿着蒋介石的手令去报告刘师长。

刘伯承略微吃惊地说：“好家伙，还是蒋介石的亲笔签字呢！真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说着，走到地图前，边看边说：“现在115师已经到了灵丘、广灵、涞源、阜平、曲阳和行唐之间；120师正在神池、宁武、朔县一带活动。日寇9月13日占了大同，以20万兵力沿着平绥、同浦、平汉和津浦几个方向挺进。我们如果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加入石家庄方向同日寇正面作战，就会同115师、120师失掉联系，也打乱了党中央的部署。”

李达说：“这样一来，我们师就要被迫孤军作战，担任正面防御。以我们师目前的实力，和敌人相差悬殊，应当尽量避免正面作战。”

“对！这是个阴谋，是蒋介石要借日本人的刀来杀我们。我们不能上这个当啊！”刘伯承沉思地说，“我要马上报告毛主席和朱总司令。”

“这个乔茂才怎么打发呢？”李达问。

“他已经充当了国民党特务的角色，我不能见他。你把这个手令退还给他，就说一时找不到我。再说，蒋介石这么干，既不符合国共谈判的协议，也不符合军队指挥的惯例嘛！让他等着，等得不耐烦了，他就回去了。”

李达见了乔茂才客气地说：“我刚才打了几个电话，没有找到刘师长，请您先住一天，明天再说。”

乔茂才只得说：“好，好，兄弟在此恭候。”

一连几天，李达陪他吃饭、散步。乔茂才问起刘师长时，李达不是说没有回来，就是说没有找到。乔茂才终于明白是刘伯承不肯见他，自知无趣，于是自找台阶对李达说：“兄弟还有些公事要回去办。等刘师长回来，再来拜访。”

李达顺水推舟地说：“既然乔参议有公事，我就不好相留了。蒋委员长的手令还是放在您手里为妥。”

乔茂才接入手令，快快而去。不速之客就这样被李达送走了。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你们认识我吗？”

1937年9月，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奉中央军委的命令，要他率师东渡黄河，到山西省的东南部建立抗日根据地。

9月30日，刘伯承亲率师先遣队从富平县庄里镇出发，踏上了东征的漫漫征途。秋风阵阵吹来，田野中一片浓浓的秋色。刘伯承的座骑杂色大马一路领先，两名警卫人员和前方指挥所的人员纵马紧随其后。此行人员的一个共同心愿。是赶在日军之前，尽早到达晋东南开展游击战争，担负起侧击日军的任务，以配合太原会战。

10月5日，经夜宿晓行，先遣队到达黄河西岸的韩城县芒川镇。此镇渡口是秦晋黄河的一处要津。河面约有5公里宽，水流湍急，翻滚直下，咆哮声惊天动地。奉刘伯承命令沿河岸去找船的参谋，回来报告说连条船的影子都没有。刘伯承已派参谋寻找芒川镇的国民党地方官。

抗日战争已爆发了两个多月，正值国难当头之际。而芒川镇的国民党地方官员似乎没有一丝共赴国难的样子。刘伯承派出的参谋费尽周折，才找到两个管渡口事务的官员。这两个家伙被从赌场上拉来，显得很不耐烦。来到

刘伯承面前，仍然嘟嘟囔囔，骂骂唧唧，似乎不该搅了他们的发财梦。刘伯承听参谋汇报了找人的情况后，劈头就问这两个家伙：“你们这里为什么不备好船？”这两人被他的威势所慑，不敢说三道四，但是仍然支支吾吾，虚于应付，说：“我们不知道贵军今天要过河，实在抱歉，明天一定想办法。”

部队已陆续来到渡口。看着急于渡河东征抗日的将士，又看看眼前这两个家伙，本来就痛恨这帮作威作福、为霸一方的国民党官吏的刘伯承，一听他们说明天才找船，不由心头怒起，挥起巨掌一拍桌子，厉声问道：“你们认识我吗？”

这两个家伙不明所以，忙说：“不认识，不认识。”

“他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

听参谋人员一介绍，两个家伙似乎从梦中惊醒，连忙点头哈腰，恭维着说：“知道，知道，刘将军大名，我们早有耳闻，今日得见，非常荣幸。”

刘伯承最听不得这些令人肉麻的奉承话，又狠狠地一拍桌子，声色俱厉地说：“什么荣幸不荣幸，别来这一套。告诉你们，我是奉了蒋委员长、阎司令长官的命令，要渡过河去晋北前线抗日的。我的大队人马必须明天上午全部过河，限你们两个小时以内把船给我调齐。要是贻误了军机大事，我就把你两个当汉奸论处！”两个家伙颤栗着说：“是，是，是，一定照办，一定照办。”夹着尾巴溜了出去。

船按时找来了。刘伯承连夜安排部队渡河。

一位参谋问正在指挥渡河的刘伯承：“师长，我可从来没见过你发过昨夜那么大的火呀？”

刘伯承说：“你看到了吧，国民党政权腐败成这个样子，还能不失民心？不打败仗？我在旧军队里呆过，知道国民党的作风，他们欺软怕硬，媚上压下，看势头办事。何况这次是故意刁难我们，吓唬他几下子，他就知道八路军是不好惹的了，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说罢，便哈哈大笑起来。

刘伯承率部队过河后继续前进。到达山西后，部队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所到之地，街道两旁站满了欢迎的群众，“热烈欢迎八路军”“誓死抗日”的口号声响彻天地之间。指战员们一面向群众挥手致意，一面高唱起“上前线”的战歌：

“炮火连天响战号频吹，决战在今朝。我们抗日先锋军英勇的武装上前线。用我们的刺刀枪炮头颅和热血！喂，用我们的刺刀枪炮头颅和热血，坚决与敌决死战！……”

## 顾“茅麓”，搞统战

1937年上海、镇江、南京等地先后沦陷后，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伸向了我国江南腹地。苏南地区狼烟四起，战火弥漫；人民生灵涂炭，血流成河。

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肩负重任，亲自率领新四军第一支队第1、第2两个团挺进苏南敌后，着手开辟以茅山山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当时，茅山地区有位有财有势有资望的民族资本家纪振纲，他所开办的茅麓公司是该地区的一个很大企业，出产著名的茅峰茶，远销国内外。纪振纲是一位出过国、留过洋，既是基督徒，又是政客的华侨大亨。为了“茅麓”这个“40万投资、20年经营”的公司，他呕心沥血，组织了一支200多人的



自卫队，配有 20 多挺轻重机枪和大批新式的步枪、迫击炮。是一位集军人、士绅、政客、民族资本家于一身的实力人物，交际广泛，影响极大，各方头面人物都敬畏他几分。

对于这样一位实力派人物，日本鬼子和国民党都在加紧争取拉拢。而纪振纲自己有自己的想法，他毕竟是个中国人，而且他经营的茶场受到日本飞机的轰炸，经营的茶叶受到日商的排挤，所以，他是不会甘于做日寇帮凶的；另一方面，他也不愿受国民党管辖，那样将大大削弱自己的势力，早晚被吞并，成为国民党刀俎下的鱼肉。鉴于这些考虑，他就采取中立态度，拥兵自卫并不抗日。

陈毅到了茅山地区后，就十分重视这支特殊的力量。许多同志看到纪振纲的部队武器装备精良，却不抗日，便认为应该解除纪振纲部队的武装。陈毅坚决制止他们这种想法。他说：“对于纪振纲这样的中间势力，我们要尽可能地把他们团结、争取过来，使他们成为一支抗日的力量，如果去伤害他们，就会‘为渊驱鱼’，把中间势力推到敌人一边去，使我们在江南受到孤立，站不住脚。”

这一番话，解开了同志们的思想疙瘩，大家都认为作好纪振纲的统战工作确实重要。

纪振纲可不是一个好接触的人。威望高，架子大。陈毅便决定亲自下柬相邀。

还好，纪振纲的架子还没大得过分，终于坐着八人抬的大轿，带着 100 多名卫队，浩浩荡荡地来了。

陈毅列队热情迎接，朗声笑着说：“久闻先生大名，今日得见，让我们好好叙谈叙谈。”纪振纲随声寒暄了几句。

陈毅爽朗地说：“先生不愿做亡国奴，武装自卫，我钦佩先生的民族气节。”

纪振纲没想到共产党的高级将领竟如此坦率，初来时的傲慢神情被恭敬所代替，连忙说：“陈司令过奖了，鄙人旨在经商，无心卷入军界，来去自由，不受拘束。”

陈毅诚恳地说：“日寇侵吞中国的虎狼之心国人皆知；国民党消极抗战，大家心中早已有数。先生想洁身自好，自由经商，走中间道路，恐怕时局不允许。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到茅山的宗旨是打日本鬼子，希望先生能和我们携手团结，互相合作。”

陈毅将心比心的态度打动了纪振纲，他说出了几句真心话：“国民党把你们新四军推到日寇的钢刀之下，你们虽然纪律很好，但人少枪少，装备太差，凭你们这些人能打败鬼子吗？”话中流露着明显的怀疑和悲观。

陈毅理解纪振纲的情绪，便同他谈起了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亡国论’是没有根据的。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人民爱国，不会被日寇征服。当然，日寇很强大。因此，‘速胜论’也是不现实的。而是必须进行持久的艰苦斗争。共产党就是要发动和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持久抗战，我们一定要也一定能把侵略者全部赶出中国。”

纪振纲听了频频点头。他开始相信：只要照共产党说的去做，最后的胜利的确可以争取到手。因此，他越听越受鼓舞，越听越心情开朗，对陈毅也越来越感到亲近起来。

看到纪振纲情绪高涨，陈毅又和他谈起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民族英雄如

岳飞、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等，明确希望纪振纲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效法古贤，挺身而出，参加抗日。

陈毅的话真真正正印到了纪振纲的心里。许多天里他都在认真思考着，自己该选择哪一条道路。

陈毅知道，仅凭一次谈话，很难真正将纪振纲争取过来。于是他就不厌其烦地先后三次去茅麓公司登门拜访；派出文工团进行慰问演出，让新四军部队和纪振纲的自卫队一起联欢，增进彼此的了解和友情。

纪振纲从陈毅的一言一行中，看到了共产党光明磊落的胸怀，真诚待人的品格。又看到新四军纪律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对抗日事业一片忠心，对他的部下亲如兄弟，思想上震动很大。他主动向陈毅表示：自己虽然当不了民族英雄，却也千万不能做民族败类；虽然不愿意公开打出抗战的旗号，但愿意为新四军提供方便，在医药、经费、物资、弹药等方面努力支持新四军抗战。

有一次，日本大部队到茅山地区“扫荡”。陈毅作了周密的军事部署，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彻底粉碎了鬼子的“扫荡”。后来又奇袭新丰车站，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纪振纲大为佩服，对陈毅越发敬重。

1939年初，日寇又一次加紧“扫荡”，占领了茅麓公司，并把纪振纲软禁起来，要他同意出任金坛、丹阳、溧阳、宜兴、武进“五县剿匪总司令”。纪振纲知道，所谓“剿匪”，实际就是对付江南的抗日部队。当上这样的“司令”，当然就是汉奸。他不想当汉奸。

正在纪振纲走投无路的时候，收到了陈毅送给他的一封信。信中仍然用民族大义教育他，用民族英雄激励他，并指点他赶快离开茅麓公司，提出：如愿到皖南新四军去，愿意护送；如愿到国民党地区去也为之饯行。

在陈毅的教育和鼓励下，他坚定了自己的民族立场，没有接受日寇的委任，并施了个巧计，脱身离开了茅麓。

再次见到陈毅的时候，他们几乎已经成了朋友。

纪振纲真诚地对陈毅说：“我有财产、家小需要照顾，所以不能和你们一道打日本了。但我绝对不做亡国奴，也不当汉奸。我决定到上海去做生意，请陈司令接收改编我的部队，以表明我的抗日态度……”

起初，陈毅不肯接受，纪振纲就词恳意切地再三请求，陈毅才同意收编他的部队。

纪振纲解下随身佩挂的一支镶有金边花纹的勃朗宁手枪，双手捧给陈毅，“这小小的礼物，请陈司令留下做个纪念吧！”

在纪振纲的带动下，当地许多国民党区长、乡长和一大批开明的地主、绅士主动接近新四军。

就这样，陈毅率领的新四军旗开得胜，克服种种困难，顺利地茅山地区站稳了脚跟。

## 许光达赴宴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八路军和新四军不仅要与日伪军进行武装斗争，还要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政治斗争，必要时，也要开展军事斗争。身为晋绥军区第2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2旅旅长的许光达一上任，就了解到驻守在黄河西岸府谷县的国民党第86师第258团近来不断制造摩擦。许光达与地

委的领导同志共同研究，决定派人去做该团的统战工作，宣传我党我军的主张。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成效很大，国民党部队不再隔河向我方打枪，一般也不过河来抢劫和闹事了。

一天，驻河西府谷县的第258团团长高致国派人送来请柬，请许光达司令员过河赴宴。去，还是不去呢？有的同志不同意去，认为他们没安好心，搞不好是“鸿门宴”，凶多吉少；有的同志主张去，去了可以了解一些情况，可以联络一下感情。许光达决定赴宴，借此机会可以当面宣传我党我军的方针和政策。如果不去，显得我们没有礼貌，授人以柄，会给今后的统战工作带来困难。决定之后，许光达带领3名随员，按约定的时间过河去了。

宴席上，除了高团长和几名副官之外，还有一名政训处长。许光达发现这名政训处长皮笑肉不笑的，说话也是阴阳怪气，对他存有戒心。

许光达向高团长阐述了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表白了我方的态度。高团长听得连连点头，诺诺连声。而政训处长却首先发难，在和许光达碰杯之后，一边擦嘴一边说：“许司令员，您对统一战线很热心，可您对部队约束不严，前几天，贵军隔着黄河打伤我方一名士兵，这如何解释呢？”

许光达知道政训处长说的事情，那是他亲眼所见，是对国民党方面向我方射击并击伤我方士兵的还击。他从容地笑笑：“处长先生，凡事总有个起因和来龙去脉。那天，是贵军首先开枪射击，打伤我方战士，才迫使我方还击的。我军历来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政训处长摇摇头说：“我已查实，我方士兵打伤贵军战士，实属走火，并非有意挑衅。”

许光达冷笑一声：“奇闻！隔着一条黄河，如果不是瞄准射击，怎能击中我方战士？按处长的理论，枪走火应该打中自家弟兄才是，为什么偏偏打中一河之隔的我方士兵？”

“这个……”高团长搪塞着，“许将军，容兄弟进一步查实，如属有意，重责不贷。”他又假惺惺地对政训处长说，“回头给我好好查一查。”

政训处长像斗败的公鸡，阴着脸说：“是！”

许光达端起酒杯，站起来说：“现在是国难当头，生灵涂炭。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这是历史的必然。我们的口号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凡是有血气的中国军人，都应该枪口朝外。高团长，你有一团之众，理应报效祖国。是当民族英雄，还是当民族的罪人，望团长三思而行。”

一席话打动了高团长，连声说：“许将军金玉良言，甚谢，甚谢。”

“来，为了我们河东河西能真诚地结成统一战线，干杯！”许光达提议说。

“干！”所有的杯子碰到一起，砰然有声。

这次赴宴，许光达发现高团长并无恶意，只想试探一下我军的态度。这位高团长年纪不大，还有一点民族正义感，决定进一步做他的统战工作。

几天之后，许光达给高团长发出请柬，约他过河来赴宴。如果他们肯来，说明他们对搞统战还有几分诚意；如果他们不来，我们也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今后的关系搞不好，责任完全在对方。结果，他们也按约定的时间来了，也是4个人，其中包括那个政训处长。高团长前来赴宴，心情是矛盾的：八路军对他一片诚意，使他感动，他想亲自过来看看八路军根据地的情况。而最近一个时期，日军对他拉得也很紧，令他左右为难。投靠日本人吧，怕河东的八路军吃掉他，日后不好做人；投靠八路军吧？又怕八路顶不过日军，

遭殃的还是自己。所以，借赴宴之机，过来看看，探探虚实。

许光达看出高团长矛盾的心理状态，宴会前，专门陪高团长一行参观了八路军的训练、生产，参观了保德城的抗战秩序和民兵搞的地雷演习。高团长看得目瞪口呆，没想到八路军在日本的反复“扫荡”之下，仍然那样斗志昂扬，军民团结，秩序井然，生机勃勃，他嘴里不说，心里却暗暗吃惊。许光达乘机对他说：“谁坚持抗日，谁就会得到民众的拥护。中国是不会灭亡的，日本是可以打败的。你是知道的，前不久，日军‘扫荡’晋西北，结果呢？我们在甄家庄打了个歼灭战，消灭700多名日本鬼子，100多名伪军。日军的第59旅团第85大队被打垮了，前来进犯保德的日军也被打得狼狈逃回去了。”说到这里，许光达故意抬高了声音问高团长：“听说田村大队长还派人同你打过交道。”

高团长的脸一下子红了：“误传，全是误传。”前不久田村确实派人来找过他，劝他投靠日本人。

许光达看出他有些尴尬，就转换口气说：“误传就好。高团长你对抗战的形势，在河西是看不明白的。在我们这里，你就会看到，日军对我们‘扫荡’越多，我们就越发展。日本帝国主义能灭亡中国吗？不能！”

“对！对！许司令言之有理。”

“高团长，我们一向以抗日为重，注重同友军的团结。这你应该是清楚的。希望你不要听信某些人的挑拨，做出对不起朋友的事。”说到这里，许光达将目光转向政训处长，严肃地说：“最近，河西的257团和你们258团都有一些袭扰我河防的行为，我很遗憾。为了顾全大局，我们暂且忍让了，我已派人转告你们高双成师长，必须杜绝此类事件继续发生，否则，一切后果由贵方负责。”

听了这一番不软不硬的话，高团长说：“贵军在河东抗日，兄弟我是亲眼所见的，鄙人历来主张贵我双方精诚团结。司令方才所提之事，是少数官兵滋事生非，兄弟回去后一定严加训戒，请许将军海涵。”

在此之后，河西的国民党军队果然减少了对我军的敌对行动，并在我军的积极努力下，2分区同河西的第258团达成了八条协议，这些协议除了团结抗日、防止摩擦、打击汉奸、严惩挑衅肇事者外，还有扩大双方贸易的条款。

## 陈再道开辟冀南

1937年12月，我八路军第129师根据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决定以陈再道为司令员、冀豫省委书记李菁玉为政委，率领由第385旅769团的3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和第386旅的1个骑兵连组成的东进纵队开赴冀南平原，开辟平原抗日根据地。

此时，年仅28岁的陈再道，经过十年的征战生涯，已锻炼成智勇双全的八路军将领。他深入冀南敌后，虽仅带少量人马，但靠谋略和胆量，很快打开了抗战局面。

冀南地区是指河北省平汉路以东，卫河以西，沧石公路以南，漳河以北的平原地区。这个地区是连接山西省和山东省的纽带，又是控制南北交通的重要地区，物产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当时，冀南地区的情况异常混乱。河北省的石家庄、邢台和山东省的德

州失陷后，国民党在冀南的军队，如宋哲元等部，已经南逃。日军南下占领大部分县城之后，主力继续南进，留在平汉、津浦路及沧石、邢（台）临（清）公路的部队，收买、利用一些民族败类在各县筹组“维持会”、“皇协军”，以建立政权。各地的土匪、失意军人等，到处招兵买马，一时匪迹遍野，“司令”如毛；地主、商人、政客等则打着“防匪自卫”的旗号，组织民团和各种道门，以维持其统治。

1938年1月15日，陈再道率部跨过平汉路，到了河北省隆平县（今隆尧县）的魏家庄，准备向冀南地区——巨鹿和南宫县前进。巨鹿和南宫离铁路较远，敌人尚未占领。1935年在中共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这里曾举行过暴动，群众基础较好。陈再道准备以这两个县为立脚点，开辟整个冀南工作。

到了魏家庄后，当地党组织的同志和群众告诉陈再道他们，巨鹿一带正在打仗。为了进一步弄清情况，陈再道决定暂时住下。

住下后的一天，陈再道他们正在开会，侦察参谋突然领着一个衣衫褴褛、面带倦容、年约30岁的老乡来见陈再道。不等参谋介绍，这个老乡就伸出两手紧紧握住陈再道的手，眼里含着泪光，兴奋地说：“可找到了！”

原来，他是冀南地下党派来给陈再道送信的。这真使陈再道喜出望外。只见他急忙取出缝在棉衣里的信，然后向陈再道详细报告了巨鹿一带的情况。

正在打仗的是巨鹿县土匪刘磨头、史汝南、邱庆福、王子耀等部，为争夺地盘和势力而在互相火并，已经打了10多天。刘磨头等本是当地的惯匪，近来打着“抗日义勇军”的旗号，收容了一批国民党溃散的官兵，裹胁一些群众，居然扩大到六七千人。他们到处烧杀奸虏，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巨鹿县保安团长王文珍、警察局长甄福喜、县政府秘书刘建三等，是当地封建势力的代表。现在又秘密接受了日军的委任，筹组伪维持会，他们的保安团有近千人，人数虽没有土匪多，但老兵多，装备好，战斗力较强，同时又有相当深厚的封建统治基础，不少群众还受其欺骗和蒙蔽。

巨鹿是进入冀南的一个门户，必须正确地处理这一件事，否则，东进纵队就难以在这里立足。大家一致认为，两方面都不能帮助，因为一方虽打着抗日旗号，却是土匪性质的部队，另一方是已与日军有勾结的封建势力。正确的解决办法应该是，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双方晓以抗日大义，进行调解，争取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抗日。

根据讨论的结果，陈再道一面派人赴刘磨头指挥部，劝说其停火，一面写信送到巨鹿城，要保安团深明大义。为了对双方施加压力，陈再道还将部队移至紧靠火并地区的邢家湾。刘磨头在我方代表的耐心说服下，见正义难违，同时惧怕我东进纵队与保安团联合起来消灭他们，便见阶下台，答应停火，王文珍第2天也复信，欢迎我东进纵队派代表进城商谈调解。

1月25日一早，陈再道和李菁玉率部队由驻地出发，下午3时到了城西关。

这时，城门口已站着一大堆人，他们有的穿着长袍马褂，有的穿着西服或军装。看到我军便哈腰鞠躬、拱手作揖。可是就在这些笑脸后面，城墙上，城门口却刀枪林立。

我军装做没有看见，正要入城，掌握该县实权的县政府秘书刘建三，急忙向前深深地鞠了一躬，满脸陪笑地说：

“敝县城内房子少，难民甚多，贵军在此下榻，恐使官佐身受委屈，吾

辈同人商议，想请贵军暂且退驻城西一带，务期察谅民困。粮草概由政府筹办。”

显然，这是他们在耍花招，拒绝我东进纵队入城。陈再道考虑，在此情况下，如我军强行入城，就有可能发生武装冲突，不利于分化其内部，争取和团结广大群众。因此，决定李菁玉进城继续谈判，陈再道则将部队带至西北2公里多的张家庄住下。

如何制敌，陈再道决定利用骑兵优长，故意示形于对方，给对方一个下马威。

第2天拂晓，陈再道派骑兵连绕过巨鹿县城到城东南去警戒威县之敌。骑兵连有意拉开距离，过沙地向东南方向奔驰时，沿途尘土飞扬，兵力莫测。王文珍、甄福喜疑神疑鬼，认为我东进纵队是在包围巨鹿城，于是急忙以巨鹿政府、保安团、警察局、名流士绅等名义请陈再道去吃饭。

宴会中，刘建三有气无力地再三解释不让我东进纵队入城的理由，请陈再道切勿误解。王文珍、甄福喜等也灰溜溜地坐在陈再道对面，一声不吭。但是，有几位开明绅士，对我东进纵队调解表示感谢。

针对这种情况，陈再道又将党的政策，特别是将统一战线政策宣传了一番。说明八路军东进纵队是奉命为破坏津浦路，配合台儿庄会战，发动和领导冀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建立冀南抗日根据地而来的，不仅巨鹿城要进，冀南一切地方都要进。

最后，陈再道又明确地提出了3点要求：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接受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保安团听候八路军改编。

陈再道讲完话，那几位开明绅士来向陈再道敬酒，表示坚决拥护。王文珍、甄福喜等则急忙向刘建三递了一个眼色。刘建三不得不强自振作起来，宣布他们完全接受陈再道提出的条件，表示今后一定参加抗日，并准备明日欢迎我军进城。

27日上午，陈再道率部队开进巨鹿城，群众敲锣打鼓，夹道相迎。

“巨鹿事件”的解决，是我东进纵队到冀南后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东进纵队以南宫为中心，东向津浦路、西向平汉路、南向邢临公路的发展，都获得了预期的胜利。但是向北的发展却遇到了严重困难。这时，在武邑、衡水、枣强、景县、阜城、故城、武强等10余县，盘踞着赵云祥的“河北民军2路”、段海洲的“青年抗日义勇军团”以及临清的赵狗旦等游杂武装和土匪。赵云祥自恃实力雄厚，还想把段海洲部收编为他的部下。段海洲部共六七千人。

赵、段两部是当时冀南游杂武装中最大的两股。能否争取和团结他们共同抗日，或暂时争取其对八路军保持中立，不仅关系到南宫等县的巩固，而且关系到整个冀南抗日局面的打开。因此，东进纵队进入南宫时，就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提议由三方派代表举行会议。但这一建议，被赵云祥坚决拒绝，段海洲也表示犹豫，因而一直未能实现。当东进纵队已在南宫、新河、清河、冀县等处展开时，赵云祥又迫不及待地想用武力吞并段部，两股武装冲突时有发生。段海洲为了保存实力，派代表与我东进纵队谈判，想依靠我东进纵队，以摆脱赵云祥的威胁。

在这种形势下，陈再道、李菁玉决定：进一步争取段海洲，对顽固不化、争取无效的赵云祥采取孤立和分化政策。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决定由陈再道

出面邀请赵云祥、段海洲在南宫举行会议，商谈共同抗日问题，并派马国瑞亲赴段部进行争取工作。

段海洲很快就表示同意我东进纵队的提议。赵云祥内心虽然坚决反对，但不敢公开放弃抗日的旗帜，同时，又害怕我东进纵队和段海洲联合起来对付他，因此也不得不表示愿意参加会议。通过谈判，三方成立了军政委员会，由陈再道任军政委员会主任。

军政委员会的成立是我东进纵队在冀南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取得的第二个重大胜利。这一组织的成立，对以后我东进纵队改编段海洲部，分化赵云祥部，进一步打开整个冀南抗日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1938年3月中旬，129师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为加强冀南的领导和八路军的力量，又派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率骑兵团来到冀南。宋任穷和骑兵团到达后，将部队迅速展开，协助地方党组织开展工作，并消灭了已公开勾结日军、坚决反对八路军的土匪刘磨头部。同时，加紧了对段海洲部的争取和团结，进一步孤立和分比赵云祥部。

段海洲自从南宫会议以后，因为公开和赵云祥撕破了面皮，更加向我八路军靠拢。加之八路军派往该部工作的同志，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团结了一部分青年军官和广大士兵，他们积极要求改编为真正抗日的八路军。其间，我129师副师长徐向前还把段海洲邀请到南宫住了几天，亲自跟他谈话做工作，并派386旅参谋长李聚奎到段部做工作。从而进一步坚定了段接受八路军改编的决心。

5月中旬，段部由武强开至南宫改编为“青年抗日游击纵队”。

赵云祥自南宫会议以后，更加反动，不断向八路军挑衅。群众不堪赵部蹂躏，纷纷请求八路军替他们除害。在此情况下，赵部内部矛盾更加尖锐，特别是所属葛桂斋和邵伯武两部对赵非常不满，经我方争取、教育后，葛、邵两部自愿合编为东进纵队第5支队。于是，我东进纵队在葛桂斋和邵伯武原来盘踞的景县、衡水、武邑、故城、阜城等县建立了抗日政权，打开了冀南北部的局面。

至此，东进纵队由原来的5个连，很快发展至3个团和若干个支队，共2万余人，并组成了5个军分区。

## 陈毅“游说”武功山

湘赣边的武功山脉，绵亘数百里，峰峦叠嶂。山上长满了遮天蔽日的松杉，在这一望无际的青翠松杉林间，镶嵌着一株株火红耀眼的枫树。这一带，人烟稀少，猴子、野猪等野兽出没无常。

一个晴朗的黄昏，如火的晚霞燃红了西边的天空。武功山脉沉浸在一片秋日黄昏的寂静中，无声无息。

忽然，远远传来一阵“吱吖、吱吖”的声音，一顶四人抬的竹轿，忽闪忽闪地姗姗行来。坐在轿子里的是一位举止潇洒、仪表不凡的中年男子，头戴博士帽，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身着一件府绸长衫，提着一只牛皮公文包，手拄一根文明棍。此人是谁？他乃新任命不久的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陈毅。别看他一副派头十足，游山玩水的悠然模样，他可是肩负着党中央赋予的重要使命。

自“七·七”事变以后，国民党面对日军进攻的嚣张气焰，不得不同中

共中央进行第二次合作。中共中央从大局考虑，决定将南方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然而这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转变并非一蹴而就那么容易。三年多来，南方八省红军吃尽了国民党的苦，一直视国民党为最可恶的敌人，如今竟要同“敌人”合作，取消苏维埃，改编红军，自然会有一些同志想不通，有怨气。面对这一现实，陈毅担负起了“游说”的任务，他不畏艰难险阻，深入各游击区，以其特有的学识、风度、口才、人品，将一个个游击队请下山来。此次，他亲赴武功山，就是来寻找湘赣边区游击队，动员他们下山整编抗日的。

竹轿逶迤前行，坐在轿里的陈毅边观赏着路边的山峦风光，边同轿夫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

突然，路边的大树上跳下来两个荷枪实弹的游击队哨兵，挡住了去路。

小个子哨兵横着步枪，手指扣紧扳机。个子高的哨兵用机警的目光审视着端坐轿中，不慌不乱的陈毅，喝问道：“你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陈毅依旧是那副悠然的模样，平静地说：“我是奉党中央之命，来找湘赣游击队谭余保的。”

“你找谭余保干什么？”大个子哨兵仍然满脸警觉地逼视着陈毅。

陈毅让轿夫放下轿子，款步走出轿来，魁伟的身躯呈现着一种威严。他温和地说：“同志，听口音，你们是四川人吧！咱们还是老乡呢。”他拍了拍大个子哨兵的肩膀，继续说道，“我这次是奉党中央的命令，来请谭余保率领所部下山的。现在国共合作重新开始，为图抗日大业，中央红军已改编为八路军，南方八省游击队，也要集中起来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请你们带我去见谭余保同志吧！”

两个哨兵感觉陈毅不像坏人，讲话也有道理，便将4个轿夫打发走，把陈毅带到了湘赣游击队所属红5团团部所在地，交给了团长段焕竞和政委刘培善。

一封由项英同志具名的介绍信，摊在松树做成的桌子上，信上写着：“特派党代表陈毅来你们这里联络。”但既没有抬头，也没有公章。

当时，段焕竞、刘培善并不认识陈毅。而残酷的阶级斗争使他们培养了高度的警惕性，他们怎么能凭一封没有公章的信就轻信眼前这位衣冠楚楚、绅士模样的人！

陈毅看出了他们的怀疑，诚恳地说：“同志们，我理解你们对我的怀疑，斗争的残酷确实需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这是可贵的。但我这次来确是奉党中央之命，决非叛徒，希望你们能带我去见谭余保同志。”

刘培善和段焕竞商量了一下，便派人连夜押送陈毅到游击队司令部，让谭余保亲自审查。

谭余保早已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国共合作的消息。但由于国民党暗地里推行“北方合作，南方剿共”的政策，对湘赣游击队的进攻仍然很强。因此，谭余保便认为国共合作是骗人的鬼把戏，根本不信这一套。

这天，当他知道陈毅是来劝说他下山的，便大喝道：“陈毅，你这个叛徒。”并让人把陈毅五花大绑捆起来。

陈毅毫无惧色，也不进行任何反抗，仍是面带微笑地望着谭余保：“余保同志，你该认识我，咱们在井冈山见过面。”

“我是认识你，还听过你讲的课。那时你讲革命、讲阶级斗争，我敬佩



你。可如今你是‘说客’、是叛徒，我要杀了你！”谭余保怒视着陈毅。

“莫说我是叛徒，叛徒都是怕死的，可我陈毅何时怕过死哟！说我是个‘说客’，倒是不假。不过我这‘说客’却是奉了党中央的委托来的哟！你说我当初讲阶级斗争，那是革命形势的需要嘛，可现阶段，日寇要灭亡中国，吞并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已不再是主要矛盾，中国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矛盾成了最主要的。形势要求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联合起来抗日，所以我们必须摒弃前嫌，讲阶级合作，共同抗日……”

谭余保嘴里衔着旱烟斗，使劲儿吸着，神情已不像开始那样严峻。

陈毅继续和颜悦色地侃侃而谈：“……东北军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起西安事变，把蒋介石抓了起来，我们党几经努力，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停止剿共，一致对外抗日。党中央从大局出发，按照国共合作协议，进行军队改编。鉴于有些同志想不通，有思想疙瘩，就派我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到处做工作，这不就到你们这儿来了嘛！”

谭余保又深吸了两口旱烟，说：“抗日我赞成，不过蒋介石得把井冈山周围的革命根据地还给我们。”

陈毅朗声大笑起来，说：“同志哥，莫怪我说你目光短浅呀！你就不想想，我们今天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主动权、领导权，抗日战争胜利后，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岂只是个井冈山地区！”

谭余保不由得点了点头。

陈毅活动了一下被捆绑得生疼的筋骨，进一步说：“现在局势起了变化，国共合作，军队整编，这确是事实。你们如不相信，要杀我，作为我个人是无所谓的，不过那就会贻误党的工作。你们真要杀我，也望等几天再杀。我写一封信，你们派人把信送到新四军驻吉安通讯处去，假若查明我说的是假话，再杀也不迟嘛！”

谭余保经过一番考虑，又和游击队的另几位负责同志商量了一下，决定暂时把陈毅禁闭起来。同时，派人去验证陈毅的身份。

两天后，派出去的人回来了，证明了陈毅所讲的完全属实。

谭余保深感内疚，他亲自到禁闭室去请陈毅。望着陈毅魁梧伟岸的身躯，望着他眉宇间那股不屈的英气，谭余保愧疚得哽咽了：“我完全错了。我离开你们久了，许多事情不知道……我对不起你，请你原谅。”

陈毅依旧微笑着，亲切地拍着老谭的肩膀劝慰地说：“你革命警惕性高，斗争坚决，做得对嘛！产生一点误会，我也有责任嘛，谁叫我的手续不完全……你的烟杆子几次扬起来要打我，倒底还是没有打下来哟！”

满天乌云消散了，同志们皆大欢喜。

后来，这支游击队经过短时间整训，开赴浙江开化，编为新四军第1支队第1团第4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这支部队跟随陈毅南征北战，东西驰骋，立下了卓越的功勋。

解放后，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陈毅又见到了谭余保同志。他专门请谭余保到他家里作客。

席间，当他们举杯祝酒时，陈毅风趣地说：“余保同志，你看，那个时候你要是把我杀掉，现在不是少了一个元帅吗？”

在座的人听了，都哄然大笑起来。

人民是最高的山

1938年4月，根据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徐向前同志带领一队人马，告别了刘伯承、邓小平，告别了生活战斗的巍巍太行山来到了石家庄、邯郸以东的大平原开展平原游击战争。

这真是名符其实的平原！一马平川，几乎没有一个山丘。

习惯了在高山密林纵横驰骋的官兵们打心眼儿里不喜欢这股“平”劲儿：种庄稼倒挺合适，打起仗来怎么办？连个隐蔽的地方都没有。哪像在大山里呀！敌人来“围剿”了，可以钻深山；飞机来轰炸了，可以进山洞；没粮食吃了，可以上山采各种各样的野果、竹笋，还有味道鲜美的野味……。可这大平原有什么呀！日本鬼子又是飞机，又是坦克，又是骑兵，我们没有了大山作屏障，能站住脚吗？

这些在山的滋养下成长壮大的八路军战士们已和山结下了深深的感情。乍一离开，想不通、发牢骚也是正常的。甭说他们了，就是徐向前自己也有些作难呢！可不是吗，他也不大喜欢平原。且不说生在山里，长在山里，单从参加革命后，十多年来就几乎没离开过山。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和红军在东江，靠的是莲花山；在鄂豫皖苏区，靠的是大别山；到了四川，靠的是大巴山。多年来，“山地游击战”是他的拿手好戏，“围点打援”被他运用得得心应手。靠着山，他总结了一条条行之有效的战术原则，打了一个个胜仗；靠着山，他率领的队伍日渐壮大。可如今，失却了山的屏障，该怎样对付强大的日本鬼子！

他思想负担比谁都重，肩上的担子比谁都重，可他不能像其他官兵那样只知道发牢骚，他必须得想出对策，必须为今后的工作找到一条正确道路。因为他是冀南地区的最高领导人，是全体官兵的主心骨儿！

于是，他不分白天黑夜，废寝忘食地工作。一天24个小时，除了两三个小时的睡眠外，他都在看地图，作调查，找干部、群众谈话，调查冀南的民俗风情。与宋任穷等领导人反复研究着如何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如何发动群众，如何组织群众抗日等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渐渐地，一个想法在他心中明晰起来：人民群众是最可依靠的山！他不禁拍了一下自己的头：“嘿，天天讲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怎么到关键时候却把这个真理忽视了昵？”他埋怨着自己。而后叫来警卫员，让他通知全体官兵集合，他要给大家解解思想疙瘩。

很快，队伍集合起来了。一双双眼睛望着他，不知这位不喜欢言语的首长今天怎样给大家解疙瘩。

“同志们。”徐向前的声音不高，却挺有力度。“我知道大家在深山密林里呆惯了，刚到这一马平川的大平原来不习惯，还担心没有山的掩护，不好对付日本鬼子，是不是呀！”

“可不是吗！”有的战士说。

“这是正常的。别说你们，我开始也特别担心，可现在我不担心了，因为我想通了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其实大家都知道，那就是依靠群众。我们常说，军队是鱼，老百姓是水。有水，就能生鱼。山再大，天天挖也能挖平，能移走；人的山，却是永远挖不平，移不动的。所以呀，人民群众是最高的山，最深的林，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大力量。我们要在平原开展游击战争，必须把广大人民发动起来，组织起来，造成‘人山’……”

徐向前侃侃而谈，官兵们的表情由不解而变得越来越明朗，长久以来遮

挡在大家眼前的迷雾渐渐褪去，心里的疙瘩一点点解开了。徐向前一讲完，大家就热烈地鼓起掌来。

徐向前知道大家有了共识。便接着说道：“可是，目前，老百姓对我们的队伍还缺少了解，躲着我们，甚至怕我们。有的老乡说我徐向前青面獠牙，像个妖怪。”他的话把大家逗笑了。

等笑声停下来，徐向前继续说：“老百姓的这些误解一方面在于我们来的时间还短，另一方面则是受了地主和反革命的蒙蔽。我们要想得到群众的拥护，首先就得让他们真正了解我们的队伍。所以，今后大家必须更加严格地执行党的群众政策，不做有损于群众利益的事……”

徐向前有条有理地讲着。官兵们对今后的工作越来越充满信心。

当时，在冀南平原的老百姓中存在一种特别的组织，称作“六离会”，几乎家家户户有人参加。每人一个红包袱，包着红衣服。说声集合，打开包袱，穿上红衣，包袱皮系在头上，一碗冷水吞下黄表符，握着刀，嘴里吆喝着“神明保护，刀枪不入”，形同鬼魅。实际上，这是地主和反革命蒙骗了老百姓，用来对付八路军的。

对这样的特殊组织，硬打是不行的，不但会增加仇恨的情绪，还会伤害老百姓。思虑再三，徐向前决定把制服“六离会”作为让老百姓了解八路军的突破口。

于是，八路军向“六离会”展开了攻心战。捉住活的，教育几天，放回去；抓了头头，不打不骂不杀头，讲明道理，也放回去。还找他们的亲友、母亲、妻儿去劝说，要他们改邪归正。工作虽然艰难，可是，很快见了效。各村的“六离会”大多数改邪归正，洗手不干了。不少人还报名参加了八路军。

冬天过去，春天到来。冀南平原一色绿，“六离会”被制服了。各村庄人民组织起来了。抗日救国的口号，响彻平原，抗日的歌声，直冲云天。军民一条心，攻打鬼子和伪军据点，破坏敌人的交通线。真是人的山，人的海，人的密林。八路军在人山人海，生存发展和壮大，每个村庄都像一座山、一片森林。徐向前的话真的被验证了。

是的，在他的心中，千千万万觉悟起来的老百姓是真正最强有力的山。

### 信念不动摇 抗日更坚定

随着芦沟桥的枪声，抗日战争爆发了，蓄谋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我国。日寇为了保证“后方”的安全，大量增兵东北，日本关东军由1934年的30万猛增至1938年的70万，包括7个步兵师，3个混成旅团，1支装甲部队，还有飞机，对东北军民频繁“讨伐”并展开了“总体战”，妄图斩尽杀绝抗日力量。仅在三江地区就有5万日军、1万伪军来回“篦梳式”、“踩踏式”的“扫荡”。东北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最艰苦的阶段。

面对重兵压境，困难重重，做为抗联领导人的周保中却更加坚定革命信念。他说：“我们是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战，任何困难都能克服，就是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他带领部队分散为小支队，游击在白山黑水之间。

周保中每逢战斗，总是不顾个人安危，曾经几度化险为夷。1938年2月，周保中寻找党中央的关系返回7军，途中遇到了企图捉拿他的大批日伪骑

兵，当时敌人正悬赏 5 万元活捉周保中。周保中机智地摆脱了敌人，在茫无人迹、深可没人的雪地中艰难地走了 3 天，终于到达 7 军驻地。在那里，他了解到 5 军在宝清一带正同几十倍于己的敌人周旋，处境危险，心急如焚，立即要赶去宝清。同志们劝他：“敌人在四处捉拿你，路上很不安全，还是等一等再说吧。”周保中硬是不肯久留。次日便带领 6 名随行人员冒雪动了身。不料由于叛徒出卖，下午 5 时左右他们走入了敌人预先设下的包围圈，陷入了重围之中。敌指挥官狂叫着：“要活的！要活的！谁把周保中打死就枪毙谁！”并督促着人马逼来，周保中果敢命令随行人员分头突围，自己断后，一边催马疾进，一面开枪击敌。不料他骑的赤红马被坎坷绊倒。敌人欣喜若狂，赶忙上来抓。周保中手中枪响，几个敌人连同上来抢“功”的叛徒应声毙命，其余则吓得赶忙卧倒，又不敢对周保中开枪，趁此机会，周保中起身便跑。由于长途跋涉和极度劳累，此时周保中大口大口吐出鲜血，头重脚轻，眼黑昏花，但他下定决心，为了党和人民，要活着，争取虎口里逃出去，继续斗争，决不束手就擒而为敌利用或嘲笑，为党留下耻辱，为天下人骂作“懦夫”。于是继续猛跑，终于在随行人员支援下脱离了险境。到达 5 军后，周保中立即和负责人共商新的作战计划，使 5 军甩开了敌人重兵，绕到敌后投入了游击战争。

入冬后，日寇疯狂进攻，我游击根据地不断被破坏，周保中带领部队只能过艰辛的雪地露营生活。地上冰雪三尺，有的部队还穿着单衣，只有依靠烤火取暖。但他们仍然表现出革命的乐观主义，他们编了一首《露营歌》，生动逼真地描绘了这种生活：“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草枯金风疾，霜沾火不燃”，“烟火冲空起，蚊吮血透衫”。粮食困难时，山果、野菜、树皮、草根等都成了食物；医药奇缺，负伤了绷带没有，就撕下一片衣服包扎。敌人狠毒地围攻山林，到处纵火、施放毒气，同时无耻地把裸体女人的画片、女人的内衣挂在树上，甚至到处留下酒肉和“亲慰书”、“招降书”，企图从精神上瓦解我军。在艰险面前，有些人对抗战前途发生动摇，5 军 1 师师长秘密投敌并企图拉队伍也投敌，周保中命令抓捕并枪毙了这个败类，同时对部队进行思想教育。日本侵略者又气又恼，更仇恨周保中，竟卑鄙到以 1 两黄金换周保中 1 两肉的“价格”，“悬赏”捉拿周保中。这激发了战士们对周保中的更加拥戴，大家说：“有周指挥领导，我们一定会胜利。”

### “神头岭”下摘鬼头

1938 年 3 月的一天下午，活跃在山西的八路军 386 旅的团以上干部，正在一间敞亮的房子里举行作战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根据 129 师首长指示，制定伏击从潞城出动的一支日军援兵的作战方案。在明确了作战意图后，会议很快转到了伏击地点的选择上。指挥员们围着一张国民党出的地图察看分析，视线不约而同地集中在了一个叫“神头岭”的地方。从地图上看，这个地段有一条深沟，公路正从沟底通过，两旁山势陡险，部队既便于隐蔽，又便于出击，是个理想的伏击战场。

正在大家为找到了理想的伏击地点而高兴的时候，旅长陈赓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神头岭’的地形谁看过？”一下子把大家都问住了，因为谁也没到现地看过。

“这不是纸上谈兵吗？刘师长常讲：‘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靠

国民党的老地图吃饭，要饿肚子啊！我看，会暂时开到这里，先去看看地形好不好？”陈赓见大家被问住了，就提议道。

于是，大家跟着旅长来到“神头岭”。到达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实际地形与地图出入甚大：公路不是在山沟里，而是铺在一条几公里长的秃秃的山梁上；路两边，地势虽比公路略高，但没有任何隐蔽物，只在紧贴路边有一些过去国民党部队修的工事；山梁的北侧，是一条大山沟。显然，这样的地形是不适合打伏击的，因为部队既不好隐蔽，也难于展开；北面又是深沟，预备队运动不便，搞不好，还可能使自己陷于困境。

陈赓边仔细地察看地形，边指着公路对大家说：“怎么样，这一趟算没有白跑吧？粗枝大叶要害死人哪！”随后，他见指挥员们气愤地埋怨那张国民党地图，情绪有些低落，便笑呵呵地说：“走，回去讨论好啦。地形是死的，人是活的，想吃肉，还怕找不到个杀猪的地方么？”

晚饭后，会议继续进行。指挥员们根据下午实地看过的地形，各抒己见，有的主张把伏击地点放在这个地方，有的主张放在那个地方，可就是没有人再提那个“神头岭”。轮到旅长拍板了：“我看这一仗还是在‘神头岭’打好。”大家一听，十分惊疑。陈赓看到大家疑惑不解地样子，便提着手杖走近地图，解释选择“神头岭”的理由：“一般讲，‘神头岭’打伏击，的确不太理想。但是，现在却正是我们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的好地方。正因为地势不险要，敌人必然麻痹，而且那些工事离公路最远的不过百来米，最近的只有20来米，敌人早已司空见惯，如果我们把部队隐蔽到工事里，隐蔽到敌人鼻子底下，切实伪装好，敌人是很难发现的；山梁狭窄，兵力确实不易展开，但敌人更难展开。”说到这里，他把手杖架在两张桌子上，问大家：“独木桥上打架，对谁有利呢？”

“当然是谁先下手谁占便宜。”一名团长答道。

“好哇，只要我们做到突然、勇猛，这不利条件就只对敌人不利而对我们有利了！”

“这样是不是有点冒险？”有人担心地说。

“有的险冒不得，有的险却非冒不可。诸葛亮的空城计，也是冒险嘛？如果一点险也不敢冒，他只好当司马懿的俘虏，还有什么戏好看。”众人被旅长这几句诙谐的话逗乐了，气氛又活跃起来。

接着，指挥员们又对旅长提出的意见进行了充分讨论，当大家的思想统一之后，陈赓当即作了周密的战斗部署。结果，部队按计划进入“神头岭”伏击地点隐蔽后，从潞城出来的约1500名日军，虽沿途不断派出骑兵搜索，但他们果真如陈赓所料，只注意了远处，对于他们脚下那些见惯了的旧工事，根本没有放在眼里。由于战士们伪装得好，藏得巧，有几个敌人的骑兵甚至来到距八路军战士2、3米远的地方，却丝毫没能发现任何可疑之处。当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后，英勇的八路军战士将敌人打了个猝不及防，敌人在挣扎中兵力又难于展开，除走在前面的骑兵逃掉100余名外，其余1300多名全部被歼。

这次闪电式的围歼战，打得敌人丧魂落魄，异常震惊。陈赓在3月16日的日记中，以愉悦的心情，简练的记录了这次战斗：“当时神头岭附近，日寇死尸满沟满野满屋，胜利品遍地皆是，纸张书画随风临空飞舞，似为天女散花，庆祝我们的胜利一般。”

侥幸逃脱的日本《东奥日报》随军记者本多德治记述说：“中国军的‘最

后’作战是游击战术，……神头村附近的战斗也正是它的典型战术……”。战斗一开始，“我们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一两千在前方高地棱线上露出来的脸，连被憎恶燃烧着、充满敌气的心、睁着眼的眼光，都可清楚的看到了。”在后来缴获的日军士兵的家信、日记中都提到这次被袭的惨重损失。据一日军伍长的《阵中日记》中记载：“据潞安兵站友部的情报，日前辎重受袭的原因是为了没有警戒而休息，计战死者 290 名，战伤者 40 名，失踪 60 名，纸币 15 万圆全部被夺去，108 师团这样的损害是从来没有的。此外警备一小队也全灭了……潞安到黎城的道上鲜血这边那边流着，我们的部队通过其间，真觉难过，禁不住流下滚滚的热泪。”

这真是：陈赓妙算赛诸葛，“神头岭”下摘鬼头。

### 徐向前谈笑歼日寇

响堂铺，是位于河北涉县以西、山西黎城县东阳关以东，邯长大道上的 1 个小村。这个先前并不起眼的小村，因为八路军 129 师主力在这里由徐向前副师长指挥痛歼日军，一时间名噪一时，远近百里无人不知。

徐向前，这位解放后被授于元帅军衔，黄埔军校的高材生，曾因在路灯下苦读，被蒋介石发现而受到蒋介石的称赞。他希望徐向前成为党国栋梁。然而，徐向前并不买老师的帐，从黄埔毕业，直奔大别山脉，领兵 8 万，与蒋介石军展开了血战。如今，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徐向前又杀向了抗日战场。当蒋介石得知响堂铺战斗是徐向前所指挥时，眼前又浮现出了十多年前路灯下，遇到的那位腼腆青年的身影，他十分惋惜这位战将，没有成为国民党的一员。

村南侧，是海拔 1400 多米的高山，山峰陡峭；村北边，是海拔 1200 多米的高山，山势平缓，地形起伏，并有一些村庄。两山之间是一条长长的峡谷，日军依山顺谷修了一条简便的汽车路。所以，响堂铺是日军由邯郸进犯山西的咽喉之地。

1938 年 3 月下旬，侵入晋南、晋西的日军，虽然连续遭到我八路军的沉重打击，但为实施其配合津浦铁路线作战，相机进攻潼关、西安和陕甘宁边区的计划，仍继续向黄河各渡口猛犯，邯长大道和由长治至临汾的公路，是敌人的两条交通要道，汽车每日往返不断。由于八路军不久前在神头岭战斗中歼敌 1500 余人，所以，敌人对这条大道的警戒比以前更严。敌人除在黎城驻有千余人外，在东阳关还驻有 150 余人，涉县也驻有 400 余人。但这 3 股驻军之间空隙较大，我军仍有歼敌之机。根据上述情况，为了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刘、邓、徐首长经反复商议，决定还是用我军的拿手好戏：巧设伏兵。在东阳关至涉县之间的响堂铺地段，消灭敌人的运输队。

于是，三位首长当即决定：386 旅 771 团和 385 旅 769 团的主力，分别在邯长大道以北的后宽漳至杨家山一线山地设伏。同时，769 团抽出几个连在椿树岭、河南店、王堡等地设伏，阻击可能由涉县西援之敌，并掩护该团左翼。

386 旅 772 团主力集结在右后方的马家拐，并派出小部队向东阳关附近之苏家峻游击警戒，阻击可能由黎城、东阳关来援之敌，以保护我伏击部队有后方安全。同时，还决定以徐向前为此次战斗前线指挥。

各部队接任务后，分别抓紧时间进行思想动员和战前准备。

在传达战斗任务时，771 团团长江吉深和政委吴富善特别向连以上干部说明，这次在前线指挥战斗的师首长是徐向前副师长。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因为该团的干部和绝大部分战士来自红四方面军，徐向前副师长是该团的老首长，他在指战员中有很高的威信。30 日午夜，部队准时进到响堂铺村北山坡上的宽漳村附近。386 旅旅部指挥所设在后宽漳，在 771 团左翼。在 771 团左翼杨家山、江家庄地段的 769 团主力和右后方马家拐的 772 团也都按时进入阵地。

天刚拂晓，771 团得到情报：东阳关的几百名敌人，向苏家峻的 772 团 7 连伏击阵地开去。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军的行动？如果真是这样，这对我军完成伏击任务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当时大家都很着急。

但作战经验丰富的徐向前副师长却冷静地作出分析判断：

昨天东阳关敌人只有 150 人，今天突然出现几百人，这说明东阳关增兵了。我军昨夜的行动十分隐蔽，今天拂晓敌人是不会知道的，敌人至多只能发现我苏家峻之小部队，不可能发现我主力部队的行动。

徐向前副师长胸有成竹，指挥若定，立即果断地命令 772 团派一个营到庙上村以东的高地，加强警戒，保护埋伏部队的右后方安全。又命令埋伏部队继续隐蔽，耐心等待敌人。并对 769 团团长陈锡联说：

“你们仍应集中注意力准备打敌人的运输队，即使敌人几百人绕到你们后面来，也不要管。你和徐青深各给我 1 个连，我来掩护你们消灭敌人的运输队以后，向南撤出。”

徐副师长的正确判断和坚定决心，使参战部队受到很大鼓舞。大家很快安下心来，继续搞好设伏。

8 点多钟，观察所侦察参谋高厚良报告：“听到东阳关方向有汽车马达声音。”接着他又报告：“敌人的汽车队已由东阳关方向沿公路往东开来。”

徐吉深命令观察所继续观察敌人有多少汽车，及时准确地报告。

观察所接着又报告说：“敌汽车队继续开进，已过 64……97……113……153……180 辆，后面没有了。”

不一会儿，敌先头的几辆汽车已通过 771 团第卫营正面，进到 769 团的伏击地段。这时，徐吉深、吴富善商量：771 团担任伏击任务，应该多消灭些敌人，打后头 100 辆；769 团有几个连担任对涉县的警戒任务，放过 80 辆让他们去收拾。

“啪！啪！”两声枪响，两发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指战员们都明白，这是徐向前副师长发出了总攻击命令。

顿时，我八路军的步枪、机关枪和迫击炮一齐怒吼，密集的火网，打得敌人懵头转向。

紧接着，几十把军号一齐响起“啼啼啦，哒哒啼……”的冲锋号声，战士们如猛虎一般冲了下去。

就在 771 团紧张战斗的同时，769 团在团长陈锡联的指挥下，也与敌人展开了激战。

11 时，战斗基本结束。敌人的 180 辆汽车和随车的 170 多名日军，除了 30 多人乘我八路军南山部队少，空隙大，钻空子逃掉外，其余的均被歼灭。车上的军用物资也悉数被我缴获。

那时，我军没有汽车驾驶员，汽车开不走，只好把 180 辆汽车——点着。顿时，一团黑色烟柱冲上几十米的高空。敌人的 180 辆汽车很快全部化为灰

烬。这时，我军指战员满怀胜利的喜悦，抬着缴获的迫击炮，扛着歪把轻机枪和崭新的38式步枪，挂着皮子弹盒，拿着黄呢子大衣、皮靴、饭盒等军用品，高高兴兴地撤离了战场。

果然不出徐副师长所料，当我军在响堂铺与敌激战之际，驻黎城和东阳关之敌步骑兵共400余人，很快出动，并向马家拐地区的我772团发起进攻，企图解响堂铺之危。

但敌人哪里知道，我772团早就按照徐副师长的部署，进行了战斗准备，所以当即奋力反击，很快把进攻之敌击溃。这时，黎城之敌又出动200余人会同被击溃之残敌再次向我772团进攻，又被我击溃。与此同时，涉县之敌也乘6辆汽车驰援，在椿树岭以东被我769团打援部队击退。

下午4时，敌人出动10多架飞机，飞到响堂铺上空轰炸。但是，徐向前早就预料到：敌人在地面上吃了败仗后，必然从空中来“示示威”，以挽回面子。因此，在战斗快结束时，他就命令部队迅速打扫完战场，当即撤离，并留下少数部队动员、组织群众疏散隐蔽。所以，当敌机飞到响堂铺上空时，我军早已全部向马家峪、佛堂沟一带山地转移。敌机转了一圈，发疯似地投下一排排的炸弹。又在上空盘旋许久，才向北飞去。黄昏以后，我军已休息了几个小时，吃饱了饭，带着胜利品，怀着喜悦的心情，在群星辉映的夜色中，迈着矫健的步伐向着新的地点开进了。

这次战斗，共毙伤敌少佐以下官兵400余人，烧毁敌军汽车180辆，缴获各种枪枝130余支、迫击炮4门。我伤亡300余人。

对于响堂铺一战，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派赴第18集团军的少将联络参谋乔茂才在致蒋介石的电报中曾作了如实反映，并要求“传令嘉奖，以资激励”，为该部补充弹药。

### 出奇制胜巧伏击

1938年9月下旬，日本侵略军推行“中攻武汉，南取广州，北围五台”的作战计划。华北日军兵分25路，气势汹汹地围攻我以五台、阜平、涞源等地为中心的北岳区，妄图分割摧毁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央军委命令八路军第120师急速向晋察冀边区挺进，配合边区内的兄弟部队，粉碎敌人的进攻。

此时，张宗逊任第120师第358旅旅长。他奉命率部出击同蒲路北段，积极开展游击战，牵制敌人向北岳区的进攻。

11月初，张宗逊率部来到五台城南一带。派出的侦察员报告，驻五台的敌主力蚋野大队700多人，昨晚从五台出动，今天凌晨在五台以东70里的高洪口偷袭我2分区的5大队，使当地军民受到一些损失。

得到这个情况后，张宗逊立即和旅政治部主任张平化及第716团团团长黄新廷、政委廖汉生一起研究作战部署。从各种情况判断，这股敌人是孤军出动，有后顾之忧，可能迅速缩回五台；敌人经过一夜长途行军，疲惫不堪，今日必然要在高洪口休息，估计今晚或明晨才会撤退，且按敌人以往行动规律，一般是原路返回。

张宗逊打开地图，几位指挥员都凑了过来。他们细心琢磨、研究，选择我军设伏地点。

这时，只见张宗逊伸出手指，沿着地图上高洪口至五台的大道，慢慢移



动，最后在“滑石片”这个地方停了下来。张宗逊有力地点了几下，果断地说：“就在这打！”

大家从地图上看，滑石片这个地方，四周山峦起伏，两山之间夹着一条长达数里的山沟，大道就从沟底蜿蜒而进，沟深路窄，确实是伏击敌人的好地方。张宗逊说：“我们在滑石片设伏，击其惰归，只要我们能及时赶到，歼灭蚩野大队是完全有把握的。只是敌人离滑石片近，只有20里，而我们却要走50里，因此，关键要快，要和敌人抢时间，争取先敌到达，占领有利地形。”

最后，他们决定：716团在滑石片两侧埋伏，担任伏击任务；714团开至滑石片西北的南院村地区，警戒五台方向，阻敌增援，并随时准备歼灭从滑石片逃窜的敌人。部署完毕，张宗逊严厉地说：“大家注意——快！一个小时之内，部队一定要出发。”

担任主攻任务的716团的指战员，接到命令，摩拳擦掌，士气旺盛。有的连队已经快做好晚饭，战士们表示，为了争取时间，不吃饭了，打完敌人再吃。

张宗逊率旅部和716团，经过4个多小时急行军，走完了50里山路，于夜晚9时，登上了滑石片以西的高地。

部队刚刚按预定部署展开，远处就传来了日寇的马蹄和皮鞋着地的嘈杂声，不时还夹杂着牛、羊、鸡、鸭的鸣叫声。这伙豺狼在高洪口抢掠一番之后，正得意忘形地往回走。有的嘴里叼着烟卷，有的一边走一边狂颠打闹，一点也没有发觉正在走入猎人为他们设下的陷阱。

等敌人全部进了山沟，只听一声令下，埋伏的八路军战士枪弹齐鸣，前后夹击，最后，经过激烈的搏斗歼灭了这股敌人。

这次伏击战，共歼灭日军109师团第135联队的蚩野大队700余人，俘敌21名，缴获火炮6门，轻重机枪30余挺。步马枪300余支，战马150多匹，还有电台1部及其他大量军用品。

## “娃娃司令”

才华出众的肖华，12岁就参加革命，17岁担任红军“少共国际师”政委，22岁被任命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的司令员兼政委。抗日战争进入二年，肖华率领“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来到冀鲁边地区（纵队指挥机关设在乐陵县），开展抗日活动。为了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开创抗战新局面，肖华决定亲自前往惠民，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谈判。

“‘娃娃司令’也来和我谈判！”老奸巨滑的沈鸿烈自恃年长位高，根本不把前来谈判的年轻对手放在眼里。当肖华一行赶到惠民时，他竟摆起了十足的架子，让肖华和随行人员冷冷地呆在旅馆里，等候他的“接见”。

对沈鸿烈如此无理的态度，随行人员非常气愤，要求马上离开此地，不受这家伙的窝囊气。肖华听了，先是向大家报以沉稳的一笑，接着便胸有成竹地拿出了对付沈鸿烈的对策，大家听了齐声称妙。随后，肖华和负责宣传的同志一块，起草了《给惠民各界的慰问信》，印好后亲自上街散发。顿时，这篇文采过人、激情洋溢、说理透辟的慰问信，很快就在惠民城传开了，人们纷纷为八路军“娃娃司令”的出众才华和深明大义所倾倒。

想摆省主席架子的沈鸿烈，万没料到年轻的谈判对手会来这一招，搞得

他弄巧成拙，吃了一个大哑巴亏。但他仍不服气，经过一番策划，沈鸿烈把谈判地点设在县衙门后院，自己着一身笔挺的将校军服，周围布置了许多荷枪实弹的士兵，想给“娃娃司令”来个下马威。然而，沈鸿烈再次低估了年轻的谈判对手，风华正茂的肖华对这些全然不睬，自然潇洒、神采超凡地步入谈判厅。谈判开始了，“娃娃司令”才思敏捷，谈吐明快，立论充分，谈判桌上的主动权很快操在了肖华的手中。

沈鸿烈说：“惠民属敝人所辖的山东地盘，贵军的防地在陕西，你们应到陕西去征款。”

肖华笑笑说：“沈主席大概不会忘记，蒋委员长在庐山亲口讲过，如果战端一开，则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惠民原为敌后，是我们发动群众打出了这块地盘，你作为省主席应该为之高兴才是。”

“听说贵军吃掉了不少地方部队（土匪）？”沈鸿烈不怀好意地说。

“对破坏抗日的一些汉奸武装，助纣为虐的害群之马，理应除之！”

“倘若有人借抗战名义，私自积蓄兵力，扩张地盘，那是居心何在？”

肖华一脸正气地说：“我军光明磊落，一切从抗战出发。我们收复的失地，都是国军遗弃后被日寇占领的地方。收复失地是每个中国人的神圣职责，这是无可指责的！”

此时，沈鸿烈已被驳的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只好亮出最后一张王牌——以省主席的身份下命令：“不管怎么说，乐陵县是敝人辖地，还是请肖司令不要染指乐陵政务，使地方政府为难。”

沈鸿烈的话音刚落，同肖华一道前来的乐陵县长牟宜之在旁边说话了：“八路军行义师，除奸逆，所到之处老百姓无不箪食壶浆迎接。而且他们和地方政府合作得很好，本人身为乐陵县长，没有感到有什么不便之处。”这一席话说得沈鸿烈尴尬万分，下不来台。

经过三个小时的交锋，沈鸿烈对“娃娃司令”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开始时的看不起变成了佩服不已，不得不在口头上对肖华提出的一些抗日主张作了让步，会后还主动设宴招待了肖华。

## 东进抗日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又在芦沟桥制造事端，借机大举进犯华北，接着，南京、上海相继失陷。新四军成立后，饱受日寇铁蹄之苦的江南人民热切希望新四军进入江南敌后领导抗战。1938年5月，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电示新四军要向江南敌后挺进，创建抗日根据地，组织民众武装。1939年2月，周恩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也指示新四军要实行“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

根据中央的指示，新四军领导决定派新四军第3支队第6团向东路地区挺进。所谓东路地区，是指常州以东宁沪铁路两侧的长江三角洲地带，南起太湖，北至长江，东接上海。这里交通方便，经济文化发达，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为此，陈毅专门给6团指战员作动员：“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要放手向敌后发展，抗击日寇。我们不要依靠国民党发饷、发枪，要独立自主地发展队伍，壮大自己。你们这次到东路去，一要发展队伍，二要搞到武器装备自己，三要筹集款子。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人、枪、款。”他还亲自为这支部队起了一个名字——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

在部队即将出发的前一天晚上，陈毅把6团团长叶飞找了去。叶飞进屋时，只见陈毅坐在椅子上，默默地抽着烟，用手指了一下身旁的竹凳，示意叶飞坐下。看到司令员心事沉重，一言不发，叶飞感到必有重要事情，赶紧问道：“司令员，找我有何事啊？”

陈毅还是不说话，慢慢从口袋里掏出一份电报递过去。叶飞接过来看了一遍，不由得皱起了眉头。这是项英发给陈毅的一封电报，内容是坚决反对东进。理由有两条：一是东进超出了国民党划定的“地盘”，会破坏统一战线；二是东路地区铁路、公路、河网交错，日军兵力强大、据点林立，部队到那里去会被敌人消灭。

叶飞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认为中央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他是从心里赞成东进的，而且也有信心，部队去了后一定能站住脚，不仅不会被敌人消灭，还能使自身发展壮大。但事关重大，他也不好轻易表态。于是，也闷头抽起烟来。

陈毅烦躁地在屋内来回走动，先慢后快，越走越快。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他像是拿定了主意，突然坐下来问叶飞：“你看怎么样？”

叶飞一时弄不明白这“怎么样”是什么意思，怔怔地没有回答。见叶飞没有回答，陈毅又呼地站起来，点燃一支烟，狠狠地吸了几口，来回踱步。最后在一张竹凳上坐了下来。思索了一会儿，他猛地站起来问道：“哎！叶飞，你看你们到东路去会不会被消灭？”

“你问这个呀！”叶飞立即回答，“我们有把握，不会被消灭。不仅不会被消灭，还会发展。我可以向你保证。”

“噢！你有把握？”陈毅仍不放心地又追问了一句。

“有把握！不只我一个人，我们全团的营连干部讨论过，都认为有把握。我敢给你立军令状！”

陈毅摆了摆手，说：“那好！你们走，照原计划行动！”

叶飞站起来问道：“那个‘破坏统一战线’的问题怎么办？”

“你们走你们的，不要管。这不是你们的事。”说着陈毅用右手拍拍胸脯：“破坏了统一战线，我负责！”又指指叶飞说，“部队被消灭了，你可是要负责的喽！”说罢两人都爽朗的笑起来。

## 把炮送给总司令

1939年初春，八路军129师一部在徐向前副师长率领下，集中优势兵力，在香城固一带围歼日本侵略军一个摩托化师，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其中最抢眼的是两门山炮。

一听说缴获了两门山炮，大家都高兴极了！那时候，八路军总部正着手组建炮兵团，总共不过10门山炮，都是在战斗中缴获日本鬼子的。

为支持炮兵团的建设，邓小平政委指示：这两门山炮要立即送到山西潞城的八路军总部去，交给朱总司令。

随后，参谋长李达找来了通信营教导员孙继争，当面交待了任务，让他带领营通信队越过平汉线，执行送炮任务。接受任务后，邓政委又把孙继争找去，说道：“孙继争，这两门山炮是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军组建炮兵急需它，这次送炮任务艰巨，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它送到总部，交给朱总司令。”接着又关心的问：“完成任务有什么困难吗？”教导员肯定而

清脆地答道：“请政委放心，保证完成任务。”邓政委拍了拍孙继争的肩膀又叮嘱道：路上要昼伏夜行，注意伪装，千万不能把炮给送丢了。

夜幕笼罩着原野，他们护送着伪装起来的两门山炮，经过两夜的急行军，来到清丰县。只听见“僻僻叭叭”的鞭炮声，才知道是旧历大年除夕了。俗话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几名刚参军的新战士脚上打了泡，加上想家，情绪不高。

针对这一情况，教导员孙继争趁白天隐蔽休息的时机，把党员骨干召集起来，开了个临时党支部会，会上重申这次任务的重大意义，号召党员带头，帮助新战士克服困难。大家的劲头顿时高涨起来，有的新战士脚上打了泡，就拄着拐棍，坚持行军。出了清丰县向城北过铁路，又朝汤阴方向走。那一夜，伸手不见五指，西北风呼呼地刮着，但没有一个战士叫累掉队的。部队走着走着，来到一座城边，由于天黑，以为是个寨子，就去敲门，敲了几下觉得不对，用手电筒一照：啊，怎么走到汤阴城敌人的眼皮底下啦！这时，城门的敌人发觉城下有人，顿时，枪声乱作一团。

情况紧急，孙继争连忙和其他几个干部商量对策。最后决定，派出一个小分队去城东扔了十几颗手榴弹，吸引敌人火力。果然，敌人不知虚实，枪声又立刻在城东响起来。趁敌人向城东调集部队之机，他们迅速撤离，马不停蹄地通过平汉线，向根据地前进。

天蒙蒙亮时，一头驮炮的骡子的前蹄踩在一个冰洞里，起不来了，眼看天就要大亮了，如果让敌人发现，就完不成送炮任务了。真急人！教导员和营部管理员只好到附近一个大户人家借牲口拉炮。谁知，这是一家地主，好说歹说他不借，用银元买也不行。管理员急了，从身上掏出驳壳枪一亮，地主老财一见枪，连忙说：“卖，卖。”孙继争从背包里拿出100块银元，甩给他，牵上一头骡子就走。一气走出20多里路，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们终于到了根据地。这一夜，他们一连走了近200里。

到了根据地，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朱总司令听说有人特意从前线赶来送大炮，急忙出来迎接，握着教导员的手说：“同志们辛苦了，前线的同志辛苦了！”教导员连忙说：“首长辛苦！”并把刘、邓、徐首长的信当面交给了总司令。

总司令看完信，问了一些前线部队的情况，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你们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我代表总部机关的同志谢谢你们！”

听了总司令的一席话，同志们感动地流下了热泪。

## 鲁西来了一只羊

1939年3月1日，杨勇率115师第686团到达鲁西郛城以北地区。

杨勇，这位建国后被授予上将军衔，曾担任过志愿军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副总参谋长的名将，在到达鲁西时年仅25岁，便打出了赫赫威名，建立了抗日战功。鲁西军民奔走相告，翘起大拇指，用不无赞赏的语气称赞：

“鲁西来了一只羊，打鬼子十分能耐。”

新到一个地区，工作千头万绪，政治、军事、统战，样样都得考虑周到，杨勇决心在大胆的实践于好工作。他毫不迟疑地组织了群众大会，开明士绅会议，深入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报告八路军的抗战形势，广泛发动群众，鼓舞人民士气，不断扩大八路军的影响。

驻张楼的国民党鄆城县保安司令祝壁臣等开明进步人士闻讯后，立即推选孙厚甫、傅仲华等 20 余人为代表，冒雨步行数十里，赶到鄆城来迎接八路军。

祝壁臣原为国民党军 88 师副师长，曾带队去中央苏区“围剿”过红军，但现在他的思想是倾向于八路军的抗日政策的。

杨勇以抗日大局为重，不记前嫌，热情地接待了这些代表。代表们讲述了鲁西人民的苦难，控诉了盘踞在樊坝的伪军刘玉胜的罪行，要求八路军为人民除害。

初来乍到，就去攻坚作战，这个决心确实难下。可不打就不能解除当地人民的倒悬之苦，没有实际行动也就无法扩大八路军的影响。为了造成一定的声威，尽快地创建鲁西抗日根据地，杨勇把坚决消灭樊坝伪军，作为进入山东后的第一个献礼。

盘踞在樊坝及其附近的伪军，共有一个团的兵力，主力驻扎在后樊坝。该村周围地势平坦，村西有黄河大堤为屏障，村庄有土围子作依托，警戒严密，易守难攻。

3 月 3 日下午，部队经过两个小时的行军，到达樊坝附近。按照战前的部署，由 3 营营长周海滨、教导员刘西元带领全营，从北、东、南三面对樊坝进行攻击，2 营作预备队。天刚蒙蒙亮，3 营发起攻击，重机枪连和迫击炮连也开始射击，顿时枪声、炮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樊坝被笼罩在烟雾之中。

经过大约七八个小时的战斗，樊坝里的枪炮声渐渐地稀疏下来，只有樊坝东边那个小村庄的枪声还比较激烈。几十个战士押着一个头上负了伤的俘虏，来到杨勇面前。经过审问，原来他就是伪军团长刘玉胜。

杨勇让卫生员给他包扎好伤口，问他：“那边小庄里是谁的部队？”

刘玉胜有气无力地说：

“是我的一个营。”

杨勇威严地说：

“那好，你马上写封信，让他们放下武器，立即投降！”

刘玉胜见大势已去，随即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去。

不大功夫，这个营的官兵就左肩扛着枪，右手举着枪栓，走了过来。

到此，樊坝战斗结束，这次战斗的胜利打击了日伪军的气焰，鼓舞了鲁西人民的信心。

樊坝战斗是东进 1 支队进入鲁西后与伪军打的第一仗。为了争取和瓦解伪军，扩大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杨勇决定对刘玉胜采取宽大政策。杨勇不但派医生给他岳父治疗战伤，还亲自找刘玉胜谈话，向他晓以抗日救国大义，希望他改邪归正，重新做人。

樊坝战斗结束后，686 团本应随 115 师师部东进至泰西一带，但当地群众害怕八路军走后日伪军会卷土重来，进行报复，便派当地代表来到 115 师师部极力挽留。考虑到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斗争发展的需要，罗荣桓、陈光决定由杨勇率领 686 团的 3 营和团教导队留下来坚持鲁西的抗日斗争，1、2 营重组 686 团领导班子，随师部继续东进。留下来的部队改编为独立 1 团。

3 月 10 日，115 师率 686 团继续东进。

杨勇挑起了开辟鲁西抗日根据地的重任。

为了迅速打开局面，他身体力行，亲自带一个连队到奉张六区吕垓等地

开展工作。

各连分散后，立即逐家逐户地发动群众，一个村、一个区、一个县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受尽了日伪军和顽固派残酷蹂躏的当地群众，亲眼看到八路军的所作所为，体会到八路军才是真正的为国为民的军队，人民群众逐步消除了害怕心理，开始主动地与八路军接近。

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郟城、鄆城、寿张、范县、梁山等地游击组、自卫队、儿童团、青教会、妇教会等抗日救国的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

扩军工作也很顺利。在寿张集活动的一个连，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便扩充了 400 多人，组成了一个独立营。后来又成立了一个寿张县独立营。

杨勇十分重视地方武装的建设。他经常抽调主力部队的干部去加强县、区大队的领导，派主力部队协助地方对分散的武装进行整顿和训练。同时，尽可能地抽出一些武器、弹药给地方武装，使区、县大队及基干团等地方武装提高了战斗力，配合主力部队打击敌人。

群众工作开展得好，独立 1 团的部队也扩充得很快。不久便开始筹建 115 师独立旅，杨勇任旅长兼政委，何德全任参谋长，欧阳文任政治部主任。

这时，国民党鲁西保安第 11 旅齐子修部，拥有 5000 余众，为了躲避鬼子的“扫荡”，跑到梁山。可他一来此地，就经常与八路军闹摩擦，危害很大。

4 月间，齐子修率部到肖皮口一带征粮，他的部队骚扰民宅，烧杀抢掠，激起民愤。杨勇暂时争取到了地方实力派冯寿彭、李树春等人的中立，然后集中了分散在各地开辟工作的兵力，在当地群众的支援下，在郟城东北连续和齐子修打了几仗。先是在肖皮口消灭了他一个团，后在寿张集附近又消灭他一个团。最后，齐子修带着残兵败将逃到黄河以北，后来公开当了汉奸。

反顽斗争打击的第二个对象，是国民党鲁西专员卢义之。

开始，杨勇看他 是国民党专员，总是以礼相待，对他进行耐心地说服教育，争取他一道抗日。为此，杨勇还派欧阳文到鄆城与卢义之谈判。以达到消除摩擦，团结抗日之目的。而卢义之却完全打错了主意，他把八路军的诚意，当成软弱可欺，更加肆无忌惮。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杨勇调集兵力，狠狠地打了他一下。

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卢义之的部队没有了，地盘当然也保不住，没有办法，只好灰溜溜地逃到菏泽一带去了。

7 月 7 日，抗战两周年纪念日这天，杨勇在梁山黑虎庙村召开大会，正式宣布成立 115 师独立旅。杨勇任旅长兼政委，何德全任参谋长，欧阳文任政治部主任。1 团团团长周海滨，政委戴润生；2 团团团长匡斌，政委张国华。

从此，八路军不仅在鲁西站稳了脚跟，还为以后鲁西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 给白求恩找位置

1939 年 4 月的一天，驻在河间城的日军精锐第 27 师团吉田大队 800 余人，带着山炮和装满弹药的 80 多辆大车，侵占了距离八路军第 120 师所在地大朱村不远的三十里铺。师长贺龙接到报告后，立即会同政委关向应和周参谋长认真分析了敌情。一致认为敌人下一步会进攻齐会，既而向我军扑来。

“好狗日的，让你们走不过齐会半步。”贺龙衔着烟斗，神情镇静而自信。这位身经百战的大将军对付起日本鬼子来早已是轻车熟路了。

经过反复研究，周密思考后，贺师长下达了明确的战斗部署。

“老关，老周，睡觉去，养精蓄锐，用天看好戏！”贺龙拍着这两个老搭档的肩膀。

关政委和周参谋长望着他，笑了。

老关，老周走了。贺龙却没有像叮咛战友那样“睡觉”。他点亮油灯，拿出地图，伏在昏暗的灯光下，继续思索着明天的战斗。这次战斗的对手吉田大队毕竟是日军的精锐，来者不善，容不得半点马虎，下达的命令里有没有漏洞呢？他陷入沉思。

“啪”，突然，房门被推开了。一位身着八路军灰布军装，高鼻子，蓝眼珠的外国人闯了进来，一进门就喊着：“贺师长，你说，我的位置该在哪儿？”说的是汉语，却充满着洋味儿。

正在思考问题的贺龙抬起头来。

原来是白求恩大夫。这位医术高明的洋老头是加拿大的著名外科医生。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后，接受加拿大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把自己高超的医术、高尚的医德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积极投身到中国人民抗日的洪流中，千千万万的八路军伤病员经他的医治重新返回了抗敌最前线。如今，他从晋察冀边区来到第120师已有一个多月了，贺龙同他朝夕相处，两人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白求恩从心里佩服这位能征善战、坦率自直的贺大将军，贺龙也十分敬仰白求恩高尚的国际主义精神。

此刻见到白求恩深夜造访，而且很明显地带着怒气，贺龙不禁有些纳闷：咦，白大夫一向都是温文而雅的，官兵从上到下都喜欢他，今天怎么脸红脖子粗呀！贺龙站起身来，笑呵呵地说：“白大夫，什么事呀？”他指着自己的椅子：“请坐，请坐，有什么事慢慢说。”

“我和曾部长吵架了！”白求恩根本不坐，挺着脖子，怒气未消。

“这么大火气。还是先坐下，谁惹你生气，告诉我，我替你作主。”贺龙对待这位大鼻子同志总有特别的耐心。他拉着白求恩，让他坐在椅子上，正想问个明白，却见卫生部长曾育生跨进门来。

贺师长偷偷向他眨了眨眼睛，又冲着白求恩的背影努了努嘴，而后做出一副非常严肃的表情，语气也严峻得可以，“你这家伙，为什么惹白大夫生这么大气？”

曾育生会意了师长的暗示，便也陪出一脸地笑，对白求恩说：“白大夫，别生我的气……”。

白求恩不等他说完，便甩手打断了他的话：“我能不生气吗？”他面向贺龙，双手比划着，努力表达自己的意思：“贺师长，你说，打起仗来，一个医生的位置应当在哪里？曾部长说我应该和师部在一起，你说说，贺师长，你说说，你说应当在哪里？”

“白大夫，到齐会去你的安全没有保证，再说这里离齐会并不远。”曾部长仍然想说服他。

“不，不对，医生首先考虑的应该是伤员的安全，你是卫生部长，难道不懂这个道理。”白求恩自觉占理儿，说起话来理直气壮。

曾部长脸上微微泛红。作为一名医务工作的领导人，他怎么可能不懂这个浅显明了的道理呢？这么多年来，他不就是时时处处要求自己和其他医务

人员要首先考虑伤员吗？可是，他觉得不该这样要求这位新属下，这位远渡重洋帮助中国人民的大鼻子同志。他从内心里敬重，不愿让他有危险。再说，关政委就不止一次地叮嘱他：“你要好好照顾白大夫。冀中比不得晋察冀，战斗频繁，天天打仗，安全很重要呀！”贺师长也对他说过：“白大夫就交给你了，你可要负全责，出了差错，不找别人，就找你！”曾部长有这么多考虑，当然不会答应白求恩到战斗最前沿。于是，他又不死心地劝道：“白大夫，我叫人把伤员都火速抬到这里来，总可以吧？”

“算了，我不说了。”白求恩的蓝眼睛充满渴望地盯着贺龙，“贺师长，你打了这么多仗，你认为我的位置应当在哪里！”

贺龙一直微笑不语地看着他俩的争执。他欣赏白求恩的这股倔脾气，更钦佩这种可贵的敬业爱兵精神。这是共产党人所必需的。他清楚，对白求恩的要求只能支持，对他的精神不能用任何理由束缚。可是，去齐会确实太危险，他有责任保证白求恩的安全。该怎么办呢？他使劲吸了口烟，眼睛一亮。他看到白求恩正期待他的支持，便哈哈一笑，问白求恩：“白大夫，你为什么要到最前线去呢？”

白求恩被这一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弄得莫名其妙：“当然是多救治伤员呀！”

“好！”贺龙轻轻衔着烟斗，拿起一只饭碗往桌上一摆说：“你看，这是师部的大朱村。”又把自己的烟斗放到另一端。“这是齐会，明天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曾部长不同意你到那儿去。”

白求恩不知他要干什么，奇怪地望着他，点点头。

贺龙又拿了一双筷子，在齐会的南、北两面摆好，用手在桌上划了一个圈子，对白求恩说：“明天，这里有激战。你的医疗组是只管齐会，还是这些地方都管？”

白求恩耸耸肩，仍旧有点莫名其妙：“只要是咱们的伤员，我当然都管。”

“好！那么我看呀，你的位置应当在这儿！”贺师长的手指指在烟斗和饭碗之间。

“这是什么地方？”白求恩问。

“一座小庙，离明天枪响的地方很近，可以作你的手术室，你去不去？”

白求恩特别聚精会神地看了一会儿，高兴地一拍自己没有几根头发的秃头顶，叫起来：“太好了，太好了，我的位置就在这里。贺师长，你不愧是真正的军人，懂得战场救护！”他转过身，对曾部长友好地笑着：“好啦，曾部长，咱们的争执解决了。我得去准备了。”说完，高兴地跑掉了。

“一位真正医生的心，一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心呀！”贺龙望着白求恩的背影感叹着。而后，他又对曾部长语重心长地说：“那座小庙稍稍安全些，可还是离齐会太近，明天把我的警卫排拨给你们，一定确保白大夫和其他所有医务人员安全，伤病员离不开你们呀！”

“首长，那您的安全？”曾部长听说贺龙要把警卫排拨给医疗队，感到很不安。

“我死不了，你快去安排吧！”贺龙打断了他的话。“另外，白求恩的行动，是很有力的战斗动员材料，你找甘主任把这事传达下去，告诉战士们：‘白大夫在我们身边，和我们一起战斗！’”

曾部长使劲儿点了点头。



## 以少胜多突重围

1939年上半年，八路军第115师一部在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率领下，首战樊坝，歼灭郟城保安团800余人后，又奇袭草桥，攻克转围里，葛石店，连战皆捷，消灭日伪军1000余人，击退日军两次进攻，并瓦解了1万余人的反动会门“红枪会”，拔除了伪军沿汶河两岸（东平、宁阳县境）的全部据点。扩大了泰西抗日根据地。

泰西抗日根据地的蓬勃发展，特别是我军迭挫日伪军的胜利，使日军山东最高指挥官第12军中将军司令官尾高龟藏似芒在背，如鲤在喉。调集日军8000余人，坦克、汽车100余辆，火炮100余门，摆成铁壁合围之势，分9路围攻泰西抗日根据地，妄图消灭我活动在这一地区的党政军机关和主力部队。

5月2日至8日，日军先后“扫荡”了东平、汶上地区，9日开始向肥城、宁阳间山区推进，10日各路敌军继续实施向心推进，步步紧缩合围圈。是日，陈光代师长指挥686团主力掩护党政军机关和其他部队分路突围。当夜，除山东纵队第6支队顺利突围外，师部、津浦支队、686团、中共鲁西区地委共3000余人，被重重包围在泰山西麓、肥城县的陆房山区。

此时，罗荣桓不在。陈光代师长连夜在陆房村召开紧急会议。师指挥所里，大家围着地图。陈光盯着地图吸了口烟。镇静地对大家说：

“同志们，我们已经被敌人重重包围在不到10公里的陆房山区，尾高龟藏的指挥部就设在离这10余公里的演马庄，情势极为严峻，但是，我们要看到，日军不善于山地作战，它倾巢出动到山区来，我们正可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将我们115师这把锋利的钢刀刺向敌人的心脏，给他以致命的打击。”

陈光反复看了地图之后，语调激昂地说：

“同志们，粉碎日军的围攻，办法只有一个。打！勇敢机智地打，把快送到嘴边的肥肉咬碎嚼烂！现在所有部队的任务是保卫师部，坚守到天黑后相机突围！”

接着，他做好了战斗部署，并要求部队在11日拂晓前做好战斗准备。

11日，东方刚出现鱼肚色，日军向晨雾弥漫的陆房上空打了3发信号弹，接着展开了猛烈的炮击。从山上往下看，只见灰蒙蒙地一片，分不清是硝烟还是晨雾。周围的山头在烟雾中时隐时现。我军战士迅速进入阵地，等待着出击的命令。

日军发起炮击，十几分钟后，烟雾开始飘散，黑压压的日军朝我肥猪山前哨阵地蚜山蜂拥上来。

藏龙卧虎的蚜山，沉默着。智勇双全的2连连长龚玉烈，机智地隐蔽在悬崖边的岩石旁，怒目圆睁盯着步步逼近的敌人。“叭！”随着龚连长手中的枪一声响，1名日军军官从山坡上滚下，战刀甩出好几米远。敌人还没弄清咋回事，山头上便爆发出一片喊杀声。战士们从石旁、树后和峭壁中一跃而出，将一束束手榴弹和一梭梭子弹射向敌群。顿时敌人被揍得像从山顶倒了筐土豆，纷纷滚下山去。

“好！打得好！”第686团政委刘西元在团指挥所看到第2连打得勇猛顽强，高兴地对团长说：“龚连长真行！其他连队要像他们那样，近打猛打，不到跟前不开枪。”

敌人向蚜山冲锋多次未能奏效，便分兵数路，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从

山脚下疯狂地朝肥猪山包抄上来。一时间，炮声隆隆，枪声阵阵，肥猪山上硝烟翻滚，木石横飞。

这时，师首长给 686 团来电话说：“我们有的部队过于密集，被敌人的炮火杀伤。有的同志存在一锤子买卖的思想，只知道豁出命拼，缺乏全局观念。”团领导根据这一指示，当即通知各营，要组织小部队反击，以攻为守，巧打代拼，积小胜为大胜，争取战斗中的主动。

日军攻了一上午，没有一点进展。中午，便改变战法，由轮番攻击改为集团冲锋。敌人集中所有火炮，在山脚下向山上急速发射，炮弹从四面八方飞上山头，直打得岩石开花，树枝横飞，烟火腾空。不一会儿，山顶就像剃了个光头。日军满以为我军被其炮火消灭了，就以石桥为主要突破点，成群结队地拥向石桥。但敌人并没想到，我石桥东的 1 个战斗小组，早在桥东暗暗地放了 1 捆手榴弹。敌人一踏上桥头，就被炸死了 10 多个。各连猛烈反击，刚才还处于沉默之中的群山，顷刻间变成了一座座愤怒的火山。数十挺机枪喷射着火焰，成群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炸响。2 连连长龚玉烈挽起袖筒，挥起战刀，带领战士们与敌人展开了肉搏。

与此同时，其他阵地上的战斗也在激烈地进行。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师部通信员给第 1 营教导员王六生送去陈师长“命令你部不惜一切，坚守阵地”的亲笔信。

王六生看后对通信员说：“回报师首长，请他们放心，人在阵地在，我们营就是剩下 1 个人，也要坚持到底！”

接着，王六生在电话上向张团长汇报了陈代师长的手令和战斗情况。张团长指示他要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

从早晨到中午，战士们虽然滴水粒米未进，但战斗情绪仍然十分高涨，表现出血战到底，誓与阵地共存亡的英雄气概。

下午，敌人分两路进攻，一路向蚜山西边起伏地带隐蔽跃进，企图突破进入陆房的门户——蚜山；一路从正面朝卧牛石方向进攻。蚜山西面的敌人没前进多远，就被 1 营徐敬元副营长率领的 2 连咬住了。这时，王六生从 4 连调上来转盘机枪班，与 2 连一起，把敌人打了下去。溃退下去的残敌，在其指挥官战刀的威逼下，与朝卧牛石进攻的敌人会合在一起，嚎叫着向我 3 连阵地猛扑上来。

面对数倍于我的敌人，3 连指战员毫无惧色，打退了敌人 9 次进攻。

与此同时，坚守在陆房以北、以东的师特务营和津浦支队，英勇地打垮了敌人多次进攻。师骑兵连奇袭陆房东北安临站之日伪军，予敌大量的杀伤。战斗中，曾有 200 多名敌人一度突破了我军 686 团与津浦支队的接合部，逼近了陆房村边，我两支部队派出的突击队密切配合，发起勇猛的反击，击退了突入之敌。

黄昏终于在弥漫的硝烟中来到了。

天公作美，星稀夜黑。

狡猾的敌人以防我军突围，即以重兵把守陆房周围的各个制高点与大小路口，并燃起了堆堆大火。火光闪处，只见戴着钢盔、端着刺刀的鬼子哨兵来回巡逻着。零落的枪声依然刺耳，不知是敌人在给死去的同伙送葬，还是给自己壮胆。

师部命令：“立即轻装，肃静突围！”

22 时许，我被围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开始分路突围。刘西元率 1 营在前

面开路，师部跟在中间，摸着黑出发了。

大家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忽然山影遮天，危崖欲坠，一片黑咕隆冬，谁也分不清哪是道路，哪是悬崖。侦察员在找路，大家在摸路，不知啥时，这条路又弯弯曲曲折到悬崖边上。

好不容易绕到一条小沟处，跳过几具横倒的敌尸，沿着山坡悄悄地爬上山，快到山崖口时，忽听得月本兵喝道：

“答累嘎（哪一个）？答累嘎？”

大家没有吱声，不知哪位愣头愣脑地回击了1个手榴弹。这下日本兵醒悟了，山上传出哇啦哇啦的喊声，急促的哨声，还夹着军犬的嚎叫声……

大家飞快的奔走，当翻过岬山时，看到炮弹爆炸的闪光映出了陆房周围起伏的山岭。原来日军被我军留在陆房的小部队迷惑住了，以为第115师还在他们的包围之中呢。

这下，大家心中松了口气。哪知，随即又传来一阵杂乱的“得得”声。

贴地一听，“啊！”敌人骑兵追来了。大家就地趴下，屏住呼吸，一动不动。战士们握着打开保险盖的手榴弹，等日军靠近。起伏的麦浪盖在大家身上，日军骑兵哗哗地从我军旁边过去。

幸好，大意的日军没有发现。

1日拂晓，我军渡过汶河，到达了东平以东的无盐村和南陶城。津浦支队、中共鲁西区委和泰西地委也安全转移到汶河南岸。而此时日军的大炮却把陆房打得火光冲天。之后，他们小心翼翼地爬上山，却连个人影也没有找到。惊慌地叫道：

“神兵！神兵的有！”

日高尾高龟藏不信，亲自赶到陆房察看，才知诡计已经破产。

为了向上司交差，日军便用枪口逼着几十个老乡穿上八路的服装照了像，好拿回去向日本天皇吹虚“辉煌的战绩”。随后，用汽车往回拉尸体，尸体太多，一时拉不完，日军便把尸体堆成7大堆，其中还有一些哼哼呀呀的重伤员，也一块浇上汽油焚烧了。整整烧了一天一夜。

这次战斗，我军仅以牺牲200余人的代价，毙敌大佐联队长以下1300余人，胜利地突出重围，粉碎了尾高龟藏围歼我军的企图，为坚持泰西根据地，打开山东抗战局面保存了力量。

## 黄崖洞兵工厂

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山地区流传着这样一首歌：

太行有个黄崖洞，

日寇常常来进攻。

朱总司令下命令哪哈，

要把鬼子消灭净。

歌里唱的黄崖洞可是赫赫有名。不仅仅是由于它险峻异常的地理环境，更主要的是因为这里坐落着我军最早的军事工业——黄崖洞抗日兵工厂。

提到这座为八路军、游击队输送了大量武器弹药，起了巨大作用的兵工厂，人们总会想到敬爱的朱总司令，想到他为了这座兵工厂的诞生、发展呕心沥血，想到他像一位慈祥的父亲照顾婴儿一样精心地呵护这个生于战火纷飞年代的小生命。

1938年八路军转战太行地区，根据地日益壮大。为了适应普遍开展的敌后游击战争的新形势，按照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关于“敌后必须大量发展军事工业，以坚持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火自给和准备反攻”的指示，朱德总司令将第129师与第115师的两个随军修配所进行了合并，在榆社县韩庄成立了八路军在敌后的第一个修械所，这就是黄崖洞抗日兵工厂的前身。

起初，由于设备差，技术水平低，经验不足，这个修械所除完成前方部队的修械任务外，每月只能七拼八凑生产出三、五支枪。这怎么能赶上急剧变化的战争需要呢？朱总司令心急如焚。便当机立断从前方部队中调来一批干过军工的老手当师傅，又补充了一批聪明上进的青年战士当学徒，以老带新、以新促老，互教互学，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劳动技术竞赛，使自力更生制造枪弹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一天比一天提高。到后来，由每月生产一百多支步枪、装备一个新兵连，发展到一年生产的军火可武装十六个团。这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生产效率了。朱总司令看着这个弱小生命的茁壮成长，自然是欣慰地微笑喽！

然而，日本鬼子要扼杀这个八路军、游击队珍视的小生命。1939年9月，太行山周围交通线的日军，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九路围攻”，韩庄一带遭受着残酷的“扫荡”。

刚刚成长起来的修械所就这样被鬼子践踏、迫害吗？当然不行！朱总司令指示修械所全体人员和设备都转移到偏僻隐蔽的黄崖洞深山沟里去，在这里重打鼓、另开张。

黄崖洞是朱总司令经过亲自勘察后确定的新厂址。这道葫芦形的黑山沟里，周围层峦叠嶂，峰如剑排，从东南黎城赤峪沟里进去，两边土黄色的千仞石壁犹如刀劈斧砍一般陡峭，中间那条狭长幽暗的通道，则是“抬头一线天，低头难伸拳”，再行进三、四里，有一座十分险要的天然石台断桥，雷鸣般的瀑布从两三丈高的大石墩上跌宕而下。平时牧羊采药的人上去时放一架云梯，战时恰好可以撤梯断行，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过了“断桥”天险后，谷面豁然开朗，葫芦形山沟里一分两岔，左边水腰山，有泉有土，便于建筑厂房，右边黄崖洞沟，崖畔石洞可作原材料和军火产品库，洞下沟岔里有上山小道，可通往总部驻地——武乡县砖壁、王家峪一带。

修械所的同志转移到这里后，都竖起大拇指说：“朱老总选的这地方可真好呀！”

“小日本的飞机、大炮也干着急没办法喽！”

“这回可以安心心地生产更多枪炮喽！”

大家兴奋地讨论着，选定了厂房位置，下一步就是将从韩庄搬来拆卸开的机器设备安装好并且建设新厂房了。

转移前，朱总司令曾语重心长地嘱咐大家说：“我们的机床有的是从延安带来的，有些是战士们用鲜血从敌人手里夺来的，一定要爱护、要珍惜呀！”转移过程中，大家谨记着朱总的话，谨记着他饱含期望的目光，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精心保护着这些机器设备，即使牺牲生命，也不让这些钢铁家伙们有丝毫闪失。如今，全部设备都安全护送到位了，大家又小心翼翼地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安装好。从首长到同志们都指望着它们多出枪炮呢！

建厂工程很快就紧锣密鼓地上马了。朱总司令和左权等首长也来参加劳动了。已是年过半百的朱老总脱下外衣，挽起袖子，埋头大干着，砌石奠基、调泥抹墙，每种活计他都干得得心应手。盛夏的季节，太阳像个巨大的火球，

仿佛要晒化世间一切。即便是安安静静坐在树荫里，也禁不住要冒汗，更别说这么重的体力劳动了。不一会儿，大家就大汗淋漓了。朱总司令也早已是浑身汗透。大家心疼他，劝他休息一下，而他却用手抹了把汗珠，朗声笑着说：“我虽是个老头子了，可身体还满好嘞！现在大敌当前，作战任务紧，枪弹可是我们的命根子，这座大兵工厂就成了我们的宝贝疙瘩。厂子建得越快，生产的武器弹药就能越早些杀敌立功嘞！”他又抹了把汗，“我不累嘛，不信咱们大家比赛！”说完，又低头干了起来。在他的带动鼓励下，工人们起五更睡半夜，冒雨赶建，守卫部队也没日没夜地抢修保卫工厂的工事和碉堡，不到两个月兵工厂就投产制造枪炮弹药了。

黄崖洞兵工厂建成后，为了防止敌人的袭击。朱总司令不仅把总部特务团主力调去保卫兵工厂，还责成军工部组织了工人武装自卫队。工作时间抓紧生产，工余时间加强军事训练，一手握锤，一手拿枪，劳武结合，一次次粉碎了日寇的进攻，生产的弹药枪支源源不断地运往前方。朱总司令经常称赞和鼓励他们，大家的干劲儿更足了。

1939年农历10月，太行山铺天盖地下了好几场大雪，寒冷彻骨。朱总司令惦念着在冰天雪地的深山沟里坚持军火生产的工人，和日夜爬冰卧雪守卫工厂的战士们，便顶风冒雪地从近百里外的总部出发，一路艰辛地来看望大家。

当身着一身褪了色、补丁摞补丁的灰粗布军装，眉毛上结满霜花的朱总司令出现在厂房外的山坡上时，工人们激动地欢呼了。

朱总司令微笑着亲切地问候大家：“同志们辛苦了！”

他顾不得一路风雪辛劳，一刻不歇地径直走进工房，他像一位慈爱的父亲抚着工人們的肩膀：“天冷啦，你们的衣服行不行？”

“行，行，满行呀，首长！”大家指着身上新发的棉衣和工作围裙说：“您给我们发了簇新的衣服，暖和极了。您自己却还穿这么旧的衣服，让我们大家心疼呀！”

“我从小也苦惯了，不怕冷。”朱老总爽朗地笑着。而后对身边的程所长说：“老战士们有锻炼，好些，对不习惯山区高寒气候的新工人同志要多照顾些！另外，鬼子来‘扫荡’，万不得已时，宁可舍得一些物资材料，也要保证每个技术工人的安全，我们培养一个技术人才不容易呀！”

朱总对工人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大家的心里热呼呼的，不知说啥好！

视察完厂房，朱总要察看一下工厂的防卫部署。大家觉得积雪太厚，山道太滑，上山不安全，便提议看看黄崖洞山地的军事部署图。总司令一笑：“我看再难爬也难不过长征时的大雪山吧！”说完，这位身经百战的革命老英雄，顶风踏雪，步履稳健，一口气登上了山巅。高山哨所的守卫战士看到敬爱的朱总司令竟然亲自登上山来，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朱总边巡视边认真地指示欧团长和程所长，哪座山头还应修工事，应该如何如何修；哪道山口要增加哨所，放多大火力。大家都频频点头！

朱总的视察慰问使工人们深受鼓舞，更增强了战胜困难、坚持军火生产的勇气。工厂周围的防卫部署也按朱总的指示进行了改进。

后来，在著名的黄崖洞保卫战中，特务团全体指战员和工人自卫队，在雨雪交加的恶劣天气里，同日寇激战八昼夜，打退了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的五千强敌的陆空疯狂进攻，创造了敌我伤亡6：1的辉煌战绩。

全体战士和工人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朱总司令亲自创办的抗日兵工厂，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 徐海东治病

1939年9月15日，徐海东夫妇伴随刘少奇同志等人经过西安、洛阳，来到竹沟。由于一路上工作繁忙、劳累，徐海东的肺病复发了，刚住下来就吐血了。妻子周东屏为他的病情而担忧，叫来竹沟留守军医处处长钟华为他治病，一连十多天没有好转。当向皖东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进发时，刘少奇让其他同志准备好两副担架，轮流抬着徐海东行军。

来到新四军6支队司令部驻地新兴集后，支队司令员彭雪枫去看望徐海东夫妇。他们是老熟人，共同参加过陕北著名的直罗镇战役和渡河东征战役。今日，徐海东担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4支队司令员，他们又在—个战区与日军作战了。彭雪枫询问了徐海东的病情，请来军医为老战友治病，依然未能治好。

不久，徐海东离开6支队，来到江北指挥部。他不听妻子的劝告，带病出征，指挥4支队与2000余名伪军打了3天3夜，收复了周家岗、复兴集、犬马丁、古河等地，粉碎了敌伪的大“扫荡”。徐海东劳累过度，口吐鲜血，昏倒在地。经医生诊断，是肺病复发。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用战斗姿态带病坚持工作。

1940年初，4支队召开营以上干部大会，总结这次反“扫荡”的经验。徐海东连夜整理发言提纲，几乎—宿没合眼。第二天早上，徐海东毫无食欲，随便喝了几口稀粥就放下碗筷。警卫员见此情景，低声问道：“首长，你是不是又发病了？”

徐海东说：“别瞎说，哪来的这么多病。走，会议就要开始了。”说着，他扎好皮带，向会场走去。

在会上，徐海东以他那一贯宏亮的声音在讲述着周家岗战斗经验和教训。突然，他感到有一股东西，从胃里翻滚上来，但他尽力忍受着、压制着，仍高声说道：“这只是头—次战斗，我们要继续打下去。党中央、毛主席要我们—分钟不停地向东、向东，我们……”话未说完，—口鲜血从他的嘴里涌出，徐海东昏倒在桌旁。

当时没有药物治疗，周东屏和两名医生找来咸菜水、卤水为徐海东止血，效果不太明显。徐海东躺在担架上，吃饭、喝水、大小便、翻身全靠妻子帮助，—连躺了几个月，使他烦躁不安经常叹息：“我这病何时才能好啊？”周东屏劝慰道：“别着急，你这病会养好的！”由于缺少药物，徐海东的病情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天，徐海东突然大口吐身，病榻前放着的—个二号洋瓷盆，—次吐了半盆。还伴随着发高烧，连续几天几夜高烧不退，体温表的水银柱指数总在40度上下。他每天处于昏迷状态。军医和周东屏束手无策，许多领导前来探视，悄悄地准备后事了。

深夜，周东屏守在床边，她想前想后，忍不住流泪，低声哭泣着。徐海东从昏迷中醒过来，自己也知道不行了。他低着声说：“哭什么，你是个红军，共产党员，不该哭哭啼啼。人总是要死的，有的病死，有的饿死，有的战死……你不是常看见吗？许多有才能的好干部，总—块吃饭，有说有笑，上了火线，晚上就……”他说着又昏迷了。—会清醒过来，又断断续续地说：

“……死，是不可怕的，只是我为党做的事太少了……”

就在徐海东垂危之中，地方党的一位同志找来了一名中医。这是一位近60岁的老人，名叫沈默。军队的医官和管医疗工作的领导同志见这位中医貌不出众，名不外扬，怕他乱下药会加速病情恶化，坚决不肯让沈默主治。

“草药是治不了大病的，”有人向周东屏说，“我们要对党负责，不能让他乱下药。”

“要吃这个人的药，一定要报告中原局。”也有人说。

周东屏不懂中医，但她从小在山村生长，见过一些土中医，治好多种病。她知道徐海东在长征途中负伤、患病，正是吃了中药好转的。她救人心切，不要人请示上边，不让人告诉医务部门领导，一个人断然决定：立即请沈老先生开药方，马上派人去抓药。可是三付中药取回来煎好后，周东屏又忧虑起来：是啊！万一吃坏了，这责任太大了。海东不仅是自己的丈夫，而又是党的高级干部，他的一切是属于党的。怎么办呢？

警卫员把抓中药的消息告诉了发高烧的徐海东，徐海东把周东屏叫到床边问道：“药煎好了吗？”

周东屏如实地说：“好了，只是大家怕吃错中药……”

“拿来，”徐海东微微睁开眼说：“中药不会吃坏人的。”

一句话，解除了周东屏的疑虑。她亲自把煎好的药捧来，看着丈夫吃下去。可是，她心里七上八下，不安地坐在床前，不知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眼见病人慢慢地安睡了，她也坐着睡熟了。

无名中医也有本事。沈老中医用药很灵，到了第二天夜晚，徐海东三付中药下腹，高烧退了。周东屏由愁转笑，同志们奔走相告。沈老先生这才知道，吃药的病人不是人们对他说的“杨副官”，而是大别山出了名的徐海东。周东屏陪同老中医守在徐海东身旁，观察了一夜。第二天，老中医背上筐子，上山去挖中草药。回来后，他把采来的7种草药配在一起，上锅熬成一碗碗的黄汤。就是这种黄汤，使徐海东摆脱了死神的纠缠。

### “鬼子是狼，徐司令是老虎”

1939年12月中旬，侵华日军第6师团长谷寿，纠集了南京、明光、蚌埠等地的日伪军2000余人，集于滁县、沙河集、全椒等地，分3路从东南和北面“扫荡”新四军第4支队驻地周家岗。

盘踞全椒之日伪军，一路千余人于19日夜11时出动，经东旺集于20日拂晓进至大马厂；另一路300多人于21日晨经石沛桥、枣岭集窜犯周家岗。驻滁县之日伪军700余人于20日晨分两路出巢，攻击周家岗。这次“扫荡”之敌，依仗其优势装备，以密集的炮火开路，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东西就抢，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疯狂至极。

为了配合全椒、滁县的日军对周家岗地区的“扫荡”，21日，巢县的日军出动近千人，经含山和程家市侵入古河镇。

日伪军闯进古河镇后，到处烧杀抢掠，全镇一片火海，被烧毁民房700多间，被杀害的群众达100多人，有的被日军用刺刀活活捅死。

第4支队徐海东司令员，是一位著名的战将，在红军时期，就被鄂豫皖一带军民称为徐老虎。看到敌人如此残害群众，决心打一个漂亮仗，严惩侵略者。他根据敌情，从滁县太平集支队部迅速赶到第7团团部，进行作战部

署，决定由第7、第9两个主力团打好这一仗。以第7团第3营的第7、第8连，在周家岗西北之常山岭大邵家一线占领阵地，防备施家集之敌向西进犯位于太平集的第4支队司令部；以第7团第1、第2营和第9连，在周家岗西南山地设伏，占据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对从周家岗南下之敌实行侧击、追击和伏击；以第9团主力在周家岗以南的复兴集、玉屏山一带构筑阵地，阻击大马厂之敌北进。

徐海东布下了天罗地网，新四军战士张网以待。

21日拂晓，由全椒出动的大马厂之敌北窜，企图进攻周家岗，被我第9团在玉屏山的第1、第9连阻击，敌即退缩复兴集，以炮兵轰击我阵地，掩护大队继续伸进。我第3连当即在复兴集附近与敌激战约7个小时。敌人遭打击，被阻于大道上，伤亡较大，退回复兴集、大马厂一带，不敢向周家岗前进。

当天上午，由滁县进至施家集之敌与全椒之另一路敌人合击并占领周家岗后，于下午4时30分开始向复兴集方向前进，企图接应大马厂之敌。我第7团第2营两个连尾追敌人，边走边打。当敌先头部队到达山根曹，后续部队离开西魏村时，便进入了我军预设的伏击阵地。

大队敌人沿山路缓缓而来时，我设伏在陈郢山头上的第7团第1营，放过了日军前卫部队，待后边随行的骡马辎重和伪军刚一露头，即以猛烈火力突然袭击，随即发起冲锋。战士们如虎下山，冲入敌阵，顿时将敌人截为数段，首尾不能相顾。押运弹药的一个小队长，膀粗腰圆，被我五六个战士猛扑上去，将其生擒，押下阵地。

敌人遭我伏击，伤亡惨重，前不敢进，后不敢退，龟缩于山根曹、西何家等山庄，据险固守，不敢妄动。我第7团第1营趁夜黑扑下来，偷袭该敌。22日，当这股敌人由西何家南逃复兴集时，又遭到我第7团部队伏击，被消灭一部，其余溃退到复兴集会合。当夜，我第9团又袭击了复兴集之敌。

连日来，各路日军屡遭打击，接连受挫，携带的弹药所剩无几，不得不于23日上午开始撤退，我第7、第9团随即跟踪追击。回窜巢县的一路，被我第9团沿途追击，予以杀伤，我乘势收复了古河镇。回窜全椒的一路，途经小尚村和东刘时，遭我预伏的第7团部队猛烈阻击，惊魂未定的日军无力还手，夺路逃命。我第7团追击敌人直至谭墩才胜利收兵。

经3昼夜激烈的战斗，粉碎了敌人对我的3路“扫荡”。我第7、第9两团共毙伤俘敌160余人，其中击毙日军中队长毛高千穗，生俘敌分队长1人，还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从此，仓皇败退的敌人缩回巢内，半年之久未敢蠢动。

老百姓无不欢欣鼓舞，他们说：

“鬼子是狼，徐司令是老虎。狼再恶，还是怕老虎”。徐海东——“徐老虎”，从此名声大振。

### 罗瑞卿巧计驱伪军

抗日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时，日本鬼子更加疯狂地向抗日根据地发起进攻，连续不断的“扫荡”、“围剿”，我抗日军民积极开展反“扫荡”、反“围剿”斗争，根据地不但没有被摧毁，反而越来越巩固。敌人又改变方式，对根据地采取“蚕食”政策，他们能占领一个村庄就占领一个，能攻占一个



山头就攻占一个，妄图一口一口地侵占整个抗日根据地。于是，在根据地的边缘地带出现了两面政权。村长表面上是为敌人“服务”，实际上却是我们的骨干，其中不少人还是共产党员。在这些拉锯地区，白天，敌人来我们走；晚上敌人走我们来，有时候敌人不来，我们就白天也进来活动。

一天，罗瑞卿来到西口村，该村就是拉锯地区。村支书是个20来岁的小伙子，长得敦敦实实，脸膛红润，一副庄稼人模样。

“小伙子，你们的粮食藏在什么地方？”罗瑞卿问。

年轻的支书说：“首长，我不指给你看，领你走一圈，试试你的眼力。”

“好啊！”罗瑞卿高兴地拍拍小伙子的肩头，“你带路！”

一行人秘密出了村，穿过茂密的玉米地，到山沟转了一圈，又到山头坐了一会儿。罗瑞卿仔细地察看，也没发现什么异常，奇怪，他们把粮食藏到哪儿去了？

“罗主任，来，你看看这儿！”年轻的支书兴致勃勃地从山头向右侧一拐，站在一堵石壁前说：“石头开门！”

只见那石壁慢慢地打开了，里面是一个洞，洞中全是装满粮食的麻袋。门原来是大树后面的两个民工用绳子拉开的。罗瑞卿叫人把石门关上，检查了门的暗锁，感到粮食放在这里，十分安全隐蔽，不由得对群众的创造性表示叹服。

回到村里，天已经黑了。他想走，支书说：“晚上是我们的天下，吃完饭再走。”

在支书家，刚吃过饭正准备上路，突然一声枪响，把在场的人都惊呆了。有情况，一定是敌人进村了。

年轻的支书迅速吹灭了油灯，吩咐说：“村长，你去应付敌人，不管是鬼子还是汉奸队，拖住他。我领罗主任向后山转移！”

村长应了一声，就跑了出去。其他人刚要出门，一个民兵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不好！敌人已经进了村！”

支书说：“别慌，把好路口！”

说着领罗瑞卿和两个警卫员穿过一条小街，跳进了小学校。

这时，外面枪声更急，说明今晚情况非比寻常。

“是不是有坏人给日本鬼子送了信？”警卫员猜测着。

“不会！”支书说，“自罗主任进村，我们就封锁了路，许进不许出。”

“冷静点！”罗瑞卿镇静地说，“只要他们不是为我们而来，就好对付。”

“哈哈！”是村长的声音，“这老黑天，你们还出来，真够辛苦了，来来来，到小学校里休息一下。”

糟糕！真是冤家路窄，竟然走到一起来了。

随着一阵人影憧憧，十几个伪军进了院子，被村长领到前边的一间教室休息。罗瑞卿等人被堵在后边教室里走不脱。

过了一会儿，支书和村长暗中接上了头才知道，这伙伪军是跟鬼子进山抢粮的。鬼子抢到粮食赶着大车跑了，要他们当后尾，结果走岔了路，天黑了怕遇上八路军，一路上慌慌张张，看看到了边缘区，便鸣枪耍起威风来。进了村，要杀猪，烙饼，喝酒……

村长和年轻的支书商量着对策。

“狗日的，杀猪？没那便宜事。”支书气盛，“杀两只鸭子都便宜他们了。”

“可今天不比平常，罗主任给挤到这儿了。”村长为难地说，“别弄出了事。”

“哎哟，也是。但……”

两人正在后院小声议论着，罗瑞卿轻轻走了过去，问明情况，便如此这般一布置。村长和支书都乐得合不拢嘴。

“小二，快烧茶！”村长大声吆喝着，“老张头，快点杀猪！”

不一会儿，村口又响起了枪声。伪军们吓了一跳，个个面面相觑，脸色灰白。

“别怕，我看看去！”村长说着把屋门带上，出去了。

在学校门口只听村长大声说：“哎哟，八路兄弟，你们来了！”

教室里的伪军听了吓得大气也不敢出。

“我问你，有没有一伙二鬼子进了村？”

“没、没有！”村长有点结巴。

“胡说！你这老汉奸，我们跟了他们20多里了，在东山头上明明看见他们进来了。”

“这、这……”

“他们一准在这学校里，要不你这老汉奸上这儿来干什么？说！”

“老总！”

“闪一边去！”八路军干部下了命令，“一排守住大门，二排堵住后路，三排跟我冲！”

“老总，八路老总，别、别，有话好商量。”村长显然着慌了。

“没商量，打！”八路军战士们喊起来，那声音在夜空中传得老远。

“好，同志们！”八路军干部说，“叫这村长进去说说，叫他们出来投降！”

“等一下，叫他们队长出来！”显然是一个南方老干部的声音。

“首长，你别管，我们来收拾他们。”

“莫忙，莫忙！村长，”那老干部继续说，“叫他们队长出来，要是态度好，可以放他们回去！”

“首长，这太便宜他们了。”

“谈谈看嘛，急啥子哟！”一口四川辣子味。

村长进了教室。一会儿，那个小队长哆哆嗦嗦地出来了。

“报告八、八、八路，在下，在下——”

“算了算了！”那首长高高的个儿，两个警卫员像两座金刚虎视眈眈地站在背后。

“八路首长，我们可没来抢过东西，没有，您、您可以问村长。”小队长哀求着，几乎要下跪了。

“是是，”村长赶忙说，“这些弟兄挺规矩。”

“规矩？屁话！”首长怒视着伪军小队长，“你们不是要杀猪、要喝酒吗？嗯？”

“这……”伪军小队长连忙求饶，“首长，我们不要了，不要了！”

“要想活命，有两个条件：第一，赶快离开这里。第二，再跟鬼子出来，要老老实实，不得为虎作倀。”

“是是！一定做到，一定做到。”伪军小队长打恭作揖地保证。

就这样，十几个伪军吓得屁滚尿流，恨不能再长两条腿，惶惶然地跑了。

## 赔砂罐

彭德怀同志既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又是千军万马中的普通一员。每时每刻，他都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要求战士们做到的，他都带头自觉做到。就拿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说吧，他经常对总部指战员们强调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看似简单，真正做到，永远做到却没那么容易。可作为人民的子弟兵，我们又必须做到。老百姓们就是从我们这些一点一滴中了解我们，从而支持我们的……”他娓娓的话语牢记在指战员们心中，他身体力行的作风更让大家心服口服。

都是芝麻大点儿的小事，却反映出一代伟人的风范。

1940年春，八路军总部驻在太行山区的王家峪村。

彭德怀副总司令常常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走东家串西家，了解乡亲们的衣食住行有哪些困难，征求乡亲们对部队各方面的意见。

有一天，他走到警卫连的房东刘新林家，了解警卫连的官兵爱民遵纪情况。

刘新林是位20多岁的壮小伙子，爱说爱笑。见彭副总司令亲自上门，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了。忙把他让进屋里。

彭副总司令先询问了小刘家生活情况，接着问：“警卫连的战士们同你们的关系搞得怎么样啊？”

小刘掏出烟斗一边在烟袋儿里挖着烟叶，一边由衷地说：“要说咱部队和俺老百姓的关系呀，可真是三伏天生起炭火盆儿，热火着哩！”说着，他一边衔着烟斗，一边扳着手指头，如数家珍般地说起警卫连官兵们的好处来：什么帮他家和左邻右舍扫院挑水呀，什么帮乡亲们耕地播种呀，什么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呀……他滔滔不绝地说着，彭副总司令面带微笑地仔细倾听着。等他停下来，彭副总司令便和蔼地问：“都是好事，他们就没有做过错事，违反过群众纪律的时候吗？”

“错事儿？”小刘被问的一怔，使劲儿想了想特别肯定地说：“没有，他们做得一个赛一个的好，没谁犯过错误。”

彭副总微微一笑：“就这么肯定？”

“当然！”小刘为了证明自己话的正确性又补了一句道：“不信，你问问大家！”

“我听说有位战士打破了你家一只砂罐……”

还没等彭总说完，刘新林就急得插话说：“这哪怪他呀！他们每天下沟给俺家里担水。昨天是一不小心被石头绊了一跤，才把那只砂罐打碎的。再说那本来就是一只旧罐，早破得不行了。您快别提了！”为了给战士找理由，他又笑着说：“就算他们不把它打碎，我还想摔了它呢？”

他的话把彭副总逗笑了：“你别包庇他们。”转而又严肃地说：“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损坏东西要赔，这是毛主席在井冈山时就规定的制度嘛，我们要坚决执行好啊！”说着就伸手到衣兜里掏出一些钱来，放到了桌上。

刘新林看到彭总亲自替战士赔砂罐，急得不行。一把握住彭总的手，激动地说：“首长，您这样做让我怎么过意得去呀！昨天那位战士给俺送过钱来，说是赔俺砂罐，可俺怎么能收呀！可那位同志左说右说，非把钱丢下不

行。午后，俺又悄悄地把钱放到了他的铺下面，可他趁我下地不在时，又把钱送来了。你们八路军为了咱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辛辛苦苦打鬼子，连死都舍得，俺还能舍不得这么一只旧砂罐吗？……”小刘说着说着，不知是激动还是着急，都快流眼泪了。

“打鬼子是我们的职责，是该做的，损坏了群众的东西要赔偿也同样是应该做的呀？乡亲们自己吃苦受累，支援我们八路军，我们当然应该更加全身心地爱人民。”彭总拍着小刘的肩膀谆谆开导：“再说，事情虽小，可如果处理不好，也是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呀！你说对不对？”

“对是对，可这砂罐钱俺不要！”小刘说着，把钱往总司令衣袋里一塞，担起铁锹下地去了。

晌午的时候，刘新林收工回来，一进院子就看见窗台上放着一只崭新的砂罐。他双手抚摸着光闪闪的新砂罐，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 叶剑英舌战群儒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期间的一次发言中说：叶剑英在长征中获取张国焘的密电立了一大功，在重庆与国民党斗争，“舌战群儒”又立了一大功！

事情发生在1940年3月。当时，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各战区军以上参谋长会议。18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参加了会议。

开会那天，胳膊因摔伤尚未痊愈的叶剑英，臂带石膏夹板，身着黄呢军服，佩带中将军衔，双目炯炯，精神抖擞地走进会场。

这是一次蒋介石精心筹划的会议，将对日冬季攻势打得不好的罪名嫁祸于共产党领导的第18集团军，是他们的预谋。会议刚开始，蒋介石就声色俱厉地批评冬季攻势打得不好，指责这是因为18集团军“游而不击”“破坏抗战”“制造摩擦”等等不法行为造成的。并杀气腾腾地声言要整顿军纪军令，彻查此事。紧接着，天水行营参谋处长、第2战区参谋长楚溪春、冀察战区参谋长黄百韬、第8战区章参谋长、第10战区周副参谋长、第34集团军罗参谋长等人，纷纷跳出来表演，抛出18集团军“袭击友军”“掩护叛军”“破坏政权”“强征粮食”“滥发钞票”“贩卖毒品”等一顶又一顶大帽子。在他们发言之时，蒋介石眉飞色舞，自以为得计。并不时地看着端坐在那里的叶剑英。

每临大事有静气。叶剑英面对种种恶毒攻击，内心无比地气愤，但外表却显得异常的平静和冷峻。第一天散会后，刚一回到驻地，他立即召集南方局的同志，一起研究反击敌人的对策，针对会议上反映出的问题，作了充分的准备，将原来的发言稿修改了一遍又一遍。

到了3月8日，叶剑英择机而动，要求发言。他健步走上讲台，镇静地环顾会场，然后有针对性地讲了作战和摩擦这两个焦点问题。

针对所谓18集团军“游而不击”的论调，叶剑英历数了本军艰苦奋战所取得的伟大战果。他言言有据地指出：抗战两年半来，18集团军在敌后作战，克服了缺衣少食、武器弹药奇缺等各种困难，付出了巨大代价，进行大小战斗2600余次，歼敌8万余人，我将士阵亡1500余人，负伤4万余人。18集团军的辉煌战绩早为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所称道，也曾为蒋介石和统帅部所嘉奖。他还引用国民党军委会印发的敌伪广播材料，说明18集团军不仅圆

满地完成了冬季作战任务，而且是按照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行事的。

针对所谓摩擦问题，他首先精辟地提出了从政治上、战略上正确解决各有关战区和集团军之间摩擦问题的基本原则。然后，他列举事实，雄辩地说明在河北等地区发生的摩擦，责任完全在国民党军队方面，而 18 集团军则处处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只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自卫还击的。他尖锐地指出：有些国民党军队，为了反共反人民，不惜和日伪军勾结，围攻 18 集团军，惨杀抗日的人民群众和干部，这是无耻的卖国行为！

叶剑英的发言犹如黄钟大吕，铿锵有力，无可辩驳。会场上的人们鸦雀无声，认真地听着他的发言。突然，军委会参谋次长刘斐打断他的发言说：发言已经 30 分钟，时间到了！这时叶剑英还有重要的话要说，便请示蒋介石：“委座，我还没有讲完！”蒋介石不得不表现出他的雅量，便让他继续讲下去。当叶剑英讲到张荫梧勾结日伪军进攻 18 集团军的罪行时，蒋介石显得有些沉不住气了，便大声质问：“有这回事吗？”叶剑英响亮地回答：“有！”并立即从公文包中拿出缴获的张荫梧和日伪军勾结的有关材料，一件一件宣读，并拿给蒋介石过目。

蒋介石失算了。他原以为在众人围攻面前，叶剑英是无法招架的，就是申辩几句也成不了气候。万没想到叶剑英的发言是这样的有理有据，把他的预谋全打乱了。在内心里，他不得不赞叹叶剑英是个难得的人才。刚一散会，他就神情沮丧地离开了会场，并下令撤销了原定的请叶剑英等将领出席的晚宴。

会议结束后，叶剑英和陪同他赴会的新四军参谋处长萧正岗回到驻地，整个办事处里一片欢腾，大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叶剑英就这次会议的情况，向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连同发言稿一起送上。毛泽东把叶剑英的这篇著名演讲交给中央领导同志传阅，并批示：“叶剑英同志 1940 年 3 月初在全国参谋长会议上的报告，此报告得到广大的同情。”董必武赞誉这次讲演是“叶剑英舌战群儒”。

“就叫百团大战好了！”

1940 年的夏季，对反法西斯阵线的人们来说，是一个风云险恶的季节，对中国抗日军民来说，也是一个时局十分危险的季节。在欧洲，法国政府向德国法西斯投降。希特勒的军队席卷了半个欧洲，并向英伦海峡进军。在亚洲，英、法屈服于日本的压力，相继关闭了中国的西南国际交通线滇越铁路和滇缅铁路。日军在占扼长江入川门户宜昌重镇之后，又叫嚣要拿下西安古城，切断我西北国际交通线。关外日军大批入关，津浦沿线日军向陇海线集中，太原日军亦沿同蒲路南下。同时，日机轰炸重庆，引起大后方人们的惶恐和震动。一时间，投降派甚嚣尘上，中间派悲观失望。而作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中国共产党力主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

作为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变化。转瞬到了 7 月，4 月的烂漫山花已变为一望无际的青纱帐。这正是开展游击战的黄金季节。善于择机而战的彭德怀感到在敌后打几个规模较大的仗，以鼓舞民心士气的时机到了。

“大家老盼着打仗，我看可以开始行动了。”他对左权副参谋长谈了自己的设想。他说话的口气是那样的平静，但他胸中涌动的却是一个即将掀动

华北的战略方案。他派左权立即到 129 师师部征求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的意见。

刘伯承、邓小平仔细倾听了彭德怀、左权的战役设想。近一个时期来，他们也和彭总一样，周密地注视和研究着时局的每一个变化，思考着怎样用军事手段实现党中央关于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盼望着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给 129 师下达战斗任务，当听完左权的设想陈述，刘伯承和邓小平显得是那样的兴奋。邓小平郑重果断地表示：“这个设想我看行，可以这么干！”他和刘伯承接着吩咐在座的 129 师参谋长李达说：“打破敌人‘囚笼政策’，这一着棋太好了，彭总设想很好。正式下达命令之前，一切战役准备工作你们可以提前搞。”

刘伯承、邓小平对彭总设想的积极赞同，使左权感到这几位老总想到一块去了，一场大的惊天动地的战役行动就要拉开序幕了。他沿着清漳河快步返回总部，立即向彭总作了汇报。接着总部召开了军事会议，进行酝酿决策。

1940 年 7 月 22 日清晨，一束束无线电波，把八路军总部破袭正太路战役预备命令，传达到了分处敌后的各师、军区的领导人，并上报到了中央军委。8 月 8 日，朱德、彭德怀和左权又发出了战役行动命令。

8 月 20 日晚上 8 时整，各兵团按预定时间发起攻击。彭总一夜没合眼，他等待着前线的消息。21 日和 22 日，正太、同蒲、白晋、平汉、津浦、北宁各铁路及各公路干线上的一份份捷报发到总部。

22 日午饭后，作战科长王政柱向彭德怀和左权汇报实际参战兵力，正大路 30 个团，平汉线卢沟桥至邯郸段 15 个团，同蒲线大同至洪洞段 12 个团，津浦线天津至德州段 4 个团，邯郸至济南公路线 3 个团，代县至蔚县公路段 4 个团，北平至大同线 6 个团，辽县至平定公路线 7 个团，宁武、奇岚、静乐公路线 4 个团……共计 105 个团。

“好！这是百团大战，作战科要仔细查对。”左权话音刚落，彭德怀就说：“不管是一百零几个团，就叫百团大战好了！”

彭、左当即拟电发各兵团，并报告中央军委，将破袭正太路战役定名为百团大战。当日，《新华日报》发布了 18 集团军司令部参谋处关于百团大战的第一号捷报。百团大战成为举国欣慰的消息。

### 善待两个日本娃娃

1940 年秋，在百团大战中，聂荣臻先后组织 39 个团和大批地方武装，在正太铁路及其它铁路、公路沿线进行破袭战。

燃烧着仇恨烈火的八路军战士，如猛虎下山，一举攻克天险娘子关，直插井陘煤矿，迅速抢占了东王舍矿区。日军为了阻止八路军前进，不顾自己的侨民尚未撤退，用夹杂着烧夷弹的排炮，向东王舍村猛轰滥炸。矿区顷刻间变成一片火海。在浓烟烈火中，忽然从半倒塌的日本人宿舍里，传来凄厉的呼救声和婴儿的哭叫声。八路军两名机枪手毫不迟疑地冲进烈焰，看到的是一大一小两个日本小孩和她们中弹垂死的父亲。稍大点的是个五六岁的小姑娘，小的还在襁褓中。两位战士出于人道主义和善良慈爱之情，毫不犹豫地把这父女三口从烈焰中背了出来。并拿出在当时非常缺少的急救包抢救，但孩子的父亲终因伤势过重，不久就死去了。

前线总指挥杨成武把这件事报告给聂司令员。

聂荣臻接到电话，心头涌起一种深深的怜悯之情，他忽地又想起了自己失散多年的女儿至今杳无音讯。他的心剧烈的抽搐了一下，但他马上让自己平静下来。战争的罪过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孩子是无辜的，应当好好安置她们。想着，他立即对杨成武说：“好好照看这两个孤儿，并尽快送到指挥所来。”

两个孩子安全送到了平山县洪河槽村——聂司令员的临时指挥所。许多老乡和战士们都赶来看新鲜。

聂司令员也来了。他小心翼翼地抱起那个襁褓中的小囡囡，亲了亲她胖乎乎的小脸蛋儿，用脸试了试她额头的温度，又仔细地查看包扎的伤口。他的动作是那样精心，轻轻的，绝不像个能征善战，纵横驰骋的赫赫将军，倒更像一位细心周到极疼爱孩子的慈父。

他小心地把婴儿交到旁边的医生手中，叮咛道：“一定要好好给孩子治疗！”而后，他又叫过警卫员说：“立刻到村子里看看有没有哺乳期的大嫂，请一位来，给孩子喂喂奶。这么小的小生命，不吃奶，会饿死的。”

警卫员飞快地跑去了。

聂荣臻又走到那个大点儿的小女孩跟前，蹲下身来，轻轻抚摸着孩子的头发，把一块糖送到孩子嘴里：“这个好吃，甜的，好吃。”他的神情是那样和蔼可亲，本来有些紧张害怕的孩子竟冲着他天真稚气地笑了。

旁边围观的战士和乡亲们当中，有些对聂司令员的作法不理解。因为他们对可恶的日本鬼子太仇恨了，认为不该对小日本的孩子这样好。

聂司令员理解大家的心情，便站起身来，对大家说：“大家恨日本鬼子，我理解。日军烧杀抢掠，干尽坏事，杀害了我们无数同胞，侵占了我们大片国土，的确可恨。可这一切坏事都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干的，并不是这些不懂事的孩子干的呀！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受害的不仅仅是中国人民，日本的人民也是受害者呀！大家应该把仇恨、愤怒归到日本军国主义者头上，而不是日本人民身上，更不是这些不懂事的日本儿童身上上……”

乡亲们和战士们都理解了聂司令员的话，频频点头。

夜深了，聂司令员处理完一天的工作，又想起了这两个日本小女孩。此时此刻，她们都睡在那位善良的大嫂家热烘烘的土坑上吧！小囡囡吃到了乳汁，不再哭了吧！小姐姐梦里想日本的家了吗？他充满温情地考虑着：是把这两个小生命留下来抚养呢，还是送回去？如果留下来，激烈的战争不知何时才能结束，边区的生活又极端艰苦，能养活吗？再说，两个孤苦伶仃的孩子留在异国，大的五六岁了，已经开始懂事，不在本国的土地上，会感到痛苦的……想来想去，他最终决定把她们送回去。

翌日清晨，聂荣臻司令员早早起来，修书一封给日本片山旅团长，义正辞严地斥责他们的侵略罪行，要求他们保护和哺养这两个日本儿童，并将她们安全地送回日本本土亲人的手中。写完信后，他拿出自己的津贴费让警卫员去给孩子从老乡手中买来几个水灵灵的大雪梨和几个煮熟的鸡蛋。又挑选了一位精明勇敢的战士和一位壮实憨厚的农民，挑着两只藤篮，揣着鸡蛋和梨来到那位照顾两个小姐妹的大嫂家里。

他抱起小姐姐，慈爱地说：“好娃娃，想家吗？来，伯伯送你们回去。”

那位善良的大嫂听说孩子要走，竟有些不舍，解开衣襟，又让那个可怜的小囡囡饱饱地吮吸了乳汁。

两个孩子，一人在一只藤篮里，每只藤篮底上铺着的是聂司令员仅有的

那条褥子一分为二后做的垫子。

聂司令员弯下腰去，亲了亲两个可怜的孩子：“希望你们能平安回到亲人身边吧！”他又对要去送孩子的战士和老乡说：“你们俩一定要精心照顾好这两个娃娃，她们是无罪的！”他把那封信让战士揣好，把鸡蛋和梨放在藤篮里。而后，握了握战士和老乡的手说：“全靠你们了。”

两个孩子坐在藤篮里渐渐走远了。聂司令员站在山坡上眺望着，眺望着。

### “金蝉脱壳”过大江

1940年夏天，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正副指挥陈毅、粟裕，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抵制新四军军分区书记项英的右倾错误指导，毅然决定率领苏南部队渡江北上，执行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陈毅首先带少数警卫人员化装渡江。粟裕率领江南指挥部机关和所属部队随后跟进。

当时，新四军江南、江北部队正面对着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两面夹击。粟裕率领江南指挥部机关、部队向北开进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冷欣的部队尾随追击，丹阳等地的日本侵略军则出动“扫荡”。日顽互相配合，妄图把我苏南部队消灭于长江以南。

粟裕指挥机关、部队，白天隐蔽，夜间行军，冲破层层封锁线，穿过林立的碉堡群，在日顽的夹缝中前进。在金坛地区，粟裕抓住战机，导演了一出“鬼打鬼”的好戏。

6月下旬的一个黑夜，粟裕指挥一支小分队，插入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军队之间，同时向两面的敌人射击。日顽双方都认为遇到了新四军主力，轻重武器猛烈开火，混战几个小时。直到第二天上午，日军把顽军打垮，才发现交战的不是新四军。粟裕这时已经“金蝉脱壳”，指挥部甩开敌人，一夜急行军，到达丹阳附近的运河南岸。国民党第3战区前敌总指挥冷欣得知这个消息，气急败坏地说：“粟裕真厉害，打仗真有一套。我们上了大当，吃了大亏。”

丹阳附近的运河，紧靠沪宁铁路，由东南向西北与铁路平行延伸。沿河一带，日伪军碉堡林立，铁路上的巡逻队时出时没。部队来到运河南岸，只见河宽流急，河面漆黑一片，没有桥梁，也找不到渡船，如何迅速找到渡河工具，保证部队在最短时间内安全过河，成为当时的关键问题。粟裕派人侦察，得知河宽大约50米，对岸就是渡口，而且有渡船停靠，急切间在身边未找到会游泳的人。于是他当机立断，布置好警戒，指定了临时指挥员，说了声：“我到对岸找渡船。”就纵身跳入河中。他游到对岸，找到了一条可载8~10人的小船。河宽流急，他用了很大力气，才把小船划过来。

粟裕想到，还要解决水流湍急带来的渡河安全问题，连忙对旁边的人说：“你们赶快准备绳子。”同志们正为找不着绳子着急，粟裕把电台的同志找来，让他们把捆天线杆的绳子连接起来，绑在运河两岸的树上。然后，让同志们坐在船上，扶着绳子，一批一批地过河。首先是女同志和电台过河，然后是司政后机关的其他人员过河，会游泳的同志和马匹则泅渡过河。就这样，在粟裕的周密组织指挥下，依靠一条小船，使机关和部队顺利渡过了运河，摆脱了敌人。



## 智斗审判官

万毅将军早年在张学良的东北军中供事，并参加了国民党。后来，他耳闻目睹蒋介石置民族危难于不顾，对日本侵略者一再妥协退让，使祖国大好河山陷入敌手，非常气愤。又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日，促成国共合作携手抗战。因而对共产党十分向往。终于在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在东北军中的一名秘密党员。

1941年2月，万毅所在的111师的一些反动军官，经过密谋，突然打着“为了延续111师的政治生命，清除左倾分子”的旗号，搞了一次大逮捕，把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抓了起来。在被抓的人当中，就有时任该师333旅旅长的万毅。

实际上，万毅的真实身份并没有暴露，只是因为他平时主持正义，倡导抗日，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并在蒋介石那里挂了号。所以，反动军官这次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万毅也被抓了起来。

万毅被抓后，一年多没有被提审。第二年，他被押到苏鲁战区总部军事监狱。蒋介石给苏鲁战区于学忠拍来电报，要他将万毅秘密处决。于学忠没有按蒋的指示办，而是采取“明正典刑”的方式进行处理。开庭时，审判官按照预告给万毅定的“通敌”、“西安事变从犯”和“‘奸党’嫌疑”的三条罪状，逐条进行审问。

在第一条罪状提出后，万毅冷静地反驳道：“我从1937年12月，在江阴首次参加对日作战起，到你们将我扣押，同日军打了大小近百仗，哪一次战斗能证明我通日本人。你们给我加这样的罪名，不仅对我是个莫大的诬陷，也对不起同我一起作战牺牲的官兵，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与民族敌人战斗，你们现在这样讲，良心不受到责备吗？！”

法官被问得理屈词穷，恼羞成怒地说：“罪状里有这一条，我不能不问！”说着，他又向万毅宣布了第二条罪状：“你是‘西安事变’的从犯，犯有劫持领袖罪，该承认了吧？”

“我不承认！现在已经很清楚，没有‘西安事变’，就没有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也就没有今天的抗战局面。退一步说，即使按你们的说法，张副司令（即张学良）有罪，我也构不成从犯，当时，于总司令是军长，我只是他手下的一名团长，如果我是从犯，于总司令算什么呢？”

严密的辩驳，无懈可击，法官又被驳得哑口无言。于是，又搬出了第三条罪状——“‘奸党’嫌疑”。万毅来了个以攻为守，继续理直气壮地同他辩论：“你清楚，我是1930年的国民党员。你要把我赶出国民党是可以的，可你为什么一定要把我往共产党那边赶呢？这不是有意用共党嫌疑的罪名坑害我吗？！”

“定你奸党之罪是有证据的。”

“那好哇，请你把证据拿出来。”

“为什么你被抓之后，八路军散发标语和传单为你呼吁，说你万旅长抗日无罪？”

“发不发标语传单是人家的事，与我毫不相干。我从被抓到现在，一直处在你们的看押之下，八路军贴什么标语，我根本不知道，这罪能算到我身上吗？假如共产党也给你写一张标语、传单，你就是共产党了？这样定罪岂不太荒唐，能服人吗？”

结果，原定的三条罪状全部被推翻，法官显得十分尴尬，只得气急败坏地宣布审判终结。

当时，机警的万毅发觉气氛有些不对，估计可能要对他下毒手，便在这天夜里，利用闹肚子频繁跑厕所，麻痹了看守的哨兵，成功地逃出了虎口，来到几十里之外的八路军根据地，开始了新的生活。

## 一套旧棉衣

1941年深秋，陕北高原的早晚，已明显地呈现出寒冷来。看来，今年的冬天来得早，该穿棉衣了。

警卫员小陈专门负责毛泽东主席的衣食住行。他看着院子里的杨树掉光了叶子，在秋风中瑟瑟摇荡，心想：该给主席准备好棉衣了。于是他翻箱倒柜，从一堆堆书中找出了那套灰粗布棉衣。这套棉衣的历史可真称得上“悠久”了，不但已洗得发白，而且补丁擦补丁，里面的棉絮也没有了疏松暄软的感觉，根本不暖和了。

小陈拿着这套棉衣，不禁有些鼻子发酸：这就是敬爱的毛主席的棉衣呀！这么多年来，多少个寒冷的冬夜，他就是穿着这套破旧不堪的棉衣，夜以继日地为党、为全国人民工作着……小陈越想越激动，抱着棉衣来到了中央管理处。

管理处的同志们一个接一个地捧着传看这套比在场任何一个人拥有的棉衣都破旧，也像小陈一样，不由自主地落泪了。

“小陈同志，请你放心，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想办法为主席做一身可以过冬的棉衣！”一位负责同志紧紧地握着小陈的手，激动地说：“请你替我们、替全国人民照顾好敬爱的毛主席！”

小陈面对着大家无比信赖的目光，使劲儿点了点头。

也许是老天爷开了眼，第二天，管理处就接到了地下工作者从敌占区搞来的一部分棉花和布匹。大家心里那个乐呀！心想：“这回主席和许多同志都可以暖暖和和过冬了。”

他们精打细算，努力用这些有限的材料尽可能多做出几套棉衣。

很快，第一套崭新的棉衣做出来了。是按照毛主席高大的身躯做的。大家捧着这套新棉衣又是一个接一个地传看着，仿佛看到敬爱的毛主席穿上这暖和的棉衣后更加精力充沛地为革命而工作的情景，大家的激动是不言而喻的。

第一场雪铺天盖地地飘落了。寒风卷着大片的雪花在陕北高原上呼啸怒吼。

小陈早早起来，满怀喜悦地把那套新棉衣悄悄地放在主席床头。昨晚主席又很晚才睡，小陈不忍心搅醒他，便悄悄地退了出去。

“主席穿上新棉衣，一定很高兴吧？……”小陈兴奋地想着。

突然，听到主席在叫自己。小陈赶忙回到主席窑洞里。

主席仍旧穿着那身穿了整整一个秋天的夹衣，而那套新棉衣原封未动地放在原处。

“小鬼，这棉衣是哪里来的嘛？”主席和蔼地微笑着，指着新棉衣问。

“管理处的同志给您新做的呀！”小陈愉快地回答。

“是你的主意吧！”主席仍然十分和蔼。

“我见您的棉衣太旧、太破，根本不暖和了，就……”

“就给我搞特殊化了，对不对？”主席不等小陈说完，就微笑着打断了他。

“不是特殊化。好多同志都穿上新棉衣了！”小陈不由辩解道。

“很多同志？是所有同志都穿上新棉衣了吗？”主席捧起那套新棉衣，轻轻抚摸着，深情地说：“我换一件新棉衣并不难，可我们想想，现在陕甘宁边区人民的生活多困难，全边区人民是不是都能穿上新的？全军、全国人民能不能都换上新的？要不然，身上穿多么暖和的棉衣，心里也不踏实，也会觉得冷啊！”

小陈被主席的话深深振动了。他望着主席高大魁伟的身躯更加懂得了：主席的心里盛装的是全国人民的温饱，盛装的是宏大的革命事业呀！可是，小陈心疼主席呀！他含着眼泪说：“主席，您穿不暖，我心里会难受，大家会心疼呀！”

主席亲切慈祥地拍着小陈的肩膀说：“小鬼，别担心我，我的身体好得很哪！”他把新棉衣塞在小陈怀里：“去，交给管理处的同志，让他们发给更需要的同志穿。顺便麻烦他们把我的旧棉衣拆洗一下，还能穿好几年哩！”

小陈使劲地点了点头，飞快跑走了。

第二天，主席的旧棉衣送来了。颜色褪得更白了，破的地方又加了几块补丁。

小陈把棉衣捧到主席面前。

主席像是见了老朋友似的，把棉衣接在手里。微笑着说：“这不是很好嘛！”

此后，主席就是穿着这身旧棉衣，走过了一个个不平凡的岁月。

延安整风运动中，主席夜以继日地开会，写文章，做《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风尘仆仆地往返于枣园、杨家岭之间，穿的就是这套旧棉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主席发表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同与会代表亲切合影留念，穿的也是这套旧棉衣。当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围困，边区军民处于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主席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并带领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他还是穿着这身旧棉衣，和大家一起开荒生产，纺纱织布，吃小米饭，喝南瓜汤。

这套旧棉衣呀，体现的难道不是一代伟人艰苦奋斗的风范吗？

人们不会忘记主席的这套旧棉衣！

### 采药访医救伤员

这是一个秋日的黎明，东方的天空刚刚泛起鱼肚白。威武雄壮的太行山脉依然沉浸在浓郁的秋色里没有醒来。对于抗日根据地而言，难得有这样宁静的早晨。

到了收获谷子的季节了。勤劳的张大爷早早起来，带着几个青年小伙子来到二龙山下的谷子地里，准备开镰收割。

清凉的山风吹动谷田，泛起金黄色的波浪，“今年的谷子可望丰收啊”，张大爷捻着山羊胡子，舒心地呵呵笑着。

忽然，背后的羊肠小道上传来唧唧啾啾的人语声。真是“莫道君行早，

更有早行人”，张大爷寻声望去，见有四五个八路军说笑着走来，个个提着竹篓，别着镰刀，打头的一位是个大块头，四十来岁的年纪，慈眉善目的方脸堂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

“这不是刘师长吗？”张老汉当然认识这位顶顶大名的刘伯承将军，岂止是认识，他还和刘师长面对面坐在家里的炕头儿上，聊过家常呢。刘师长曾不止一次地到他家里问寒问暖，帮助解决了许多困难。张老汉对刘师长啊是敬佩极了，感谢极了。此刻看到刘师长走来，赶忙迎上前去，热情地打招呼：“刘师长，您大清早这是干啥去呀？”

“老哥，我们上山挖宝去呀！”带有浓重四川口音的话语中饱含着亲切。

“挖宝？”张老汉不解地问，“挖什么宝呀！”

“这一阵子，我们的队伍进行反‘扫荡’斗争非常激烈，下来的伤员很多，可鬼子封锁很严，外面的药品很难运进来，我们绝不能让敌人困死！”刘师长神情严肃地挥了挥手，表现出对敌人的仇恨、对伤病员的关切之情。继而，他又恢复了和蔼的语气，“我们想上二龙山寻找一点儿中草药，给伤病员治病。眼下这药就是‘宝’呀！”

张老汉听着连连点头。看到刘师长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亲自上山挖药，如此关心伤病员的疾苦，特别受感动。他凭借多半辈子的经验热情地介绍说：“这山倒是块宝地呀！五花八门的中草药，多得很哩。可药材虽然多，却不容易到手啊。有的钻在石头缝里，根扎得老深老深，要一点儿一点儿刨；有的长在悬崖上，上下都探不着；有的跟杂草长在一骨堆儿，难以分辨，稍马虎一点，说不定抱回去一捆野草……”

通讯员小李皱起了眉头说：“是呀，首长，这活儿这么难干，行吗？”

“不要紧，不要紧，过去神农尝百草，如今这二龙山遍地是宝，我们先刨一点试试看。再说，不是有这本书的指导吗？”刘师长说着，从兜儿里掏出一本旧得发黄的书，满有信心地说，“这是20多年前，一位老中医送给我的，说以后可能有用。如今倒真是派上用场了。这书里详细记载着许多中草药的形状，和可能生长的地方。咱们那，就按书行事，不行的话再说。”他又对张大爷说，“老哥，咱们这一片儿地方，有没有经验丰富的中医，能够通晓中草药的制作加工方法？我们的军医同志都是学西医的，没干过炮制中草药这一行，得找个行家里手取取经！”

“有哇！”张老汉热心地介绍说，“离这儿不远的洪水镇药铺，有一位坐堂老中医。三世祖传的制药手艺。找他，准行！”

“谢谢你呀，老哥！”刘伯承使劲儿握握张老汉的手，“我们上山采药走了，您忙吧！”说着，带领着几个战士大步走上了山峦。

在刘师长的带动下，第129师的医务人员们都开始了上山找“宝”的活动。他们走遍了二龙山、黄烟山，采集了百多种中草药材。

刘师长在军务繁忙、日理万机的情况下，时刻挂念着药材炮制的事儿。

一天晚饭后，刘师长处理完了一天的工作，把医务所最年轻、聪明、好学的黄医生请来，说：“小黄，今晚，咱们去拜见一位老师吧！”

“老师？”小黄不解。

“洪水镇药铺，有一位精通中药炮制的老先生，咱们去向他拜师学艺呀！”

还没等小黄回答，警卫员小李嘟着小嘴插话了：“首长，你这几日身上的弹伤又犯了，疼得你直出虚汗，你以为你不说，我就不知道。从这里到洪

水镇还有 20 来里山路，你怎么走得了哇！派我去把老中医请来不就行了！”小李对这位首长从来都是“不客气”的。

刘师长微笑地点了点小李的鼻子：“你这个小鬼，总喜欢把问题严重化。我的身体哪里有那么糟糕嘛？登门拜师，是正理，哪能让老中医屈架来见学生哩。”

小李知道扭不过这位打定了主意，十头牛都拉不回来的首长，只好嘟着嘴陪他上路了。

晚霞映照着秋色浓郁的太行山，美丽、宁静。

崎岖的山路上，刘师长带着黄医生和小李，抬着一筐中草药，向洪水镇走去。

赶到中药铺时，早已是上灯时分。

老中医对这 3 位八路军的夜晚造访感到意外。当他得知他们的来意时，心中涌起一阵感动：“共产党、八路军好呀！就凭这，小日本的阴谋也不会得逞。你们有啥子要问的，只要我老汉知道，会教给你们！”

刘师长朝小李点点头，说：“快把筐子抬上来，请老先生过过目，指点指点。”

老郎中把油灯就到筐前，从筐里取出一种种药材，熟悉地讲解着：“这是柴胡，能解表，退热，疏肝解郁，升举阳气，用途极多……这个叫凤尾草，清热利湿，凉血解毒，治痢疾、拉肚子，灵得很……”他说得有条有理，头头是道。

黄医生一边听，一边往小本上记。

刘师长面带微笑地倾听着。等老先生讲完，他感叹道：“真是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呀。常言道，事要办好，多问三老。群众里头有好多高明的老师呀！”

他们谈着谈着，不觉已过了两个多钟头。刘师长一看天色已晚，便叫大家收拾好药材，准备告辞了。

老郎中热心地留他们过夜，刘师长婉言谢绝了。临行时，他握着老先生的手说：“老先生，多谢你呀，你给我们帮了大忙。”

老郎中至此还不知道眼前这位平易近人的老八路就是赫赫有名的抗日大将军刘伯承。

在刘师长的亲自关心支持下，第 129 师医务所建立起了自己的中草药“仓库”。大大缓解了医药困难，救治了许许多多伤员。而刘师长采中药、访郎中的故事也广为流传。

## 苏中奇谋克奇险

1942 年，在苏中抗日根据地，敌我之间“扫荡”和反“扫荡”、“清剿”和反“清剿”的斗争正在激烈进行。日伪军四、五百人的“扫荡”平均一周一次，千人以上的“扫荡”平均半月一次。粟裕指挥的新四军 1 师在反“扫荡”、反“清剿”中大显神威，在 1942 年的头三个月中就作战 168 次，攻克敌据点 20 余个。在频繁的战斗中，粟裕多次身历险境。由于他机动灵活，指挥若定，出奇制胜，终于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1942 年 1 月下旬，粟裕率领新四军第 1 师前指机关转移到苏中第 2 分区三仓和泾港之间的滨海地区休整。当时正值春节临近，为了让部队过一个愉

快的节日，粟裕特意通知在海上隐蔽活动的师直机关人员上岸，与前指机关会合。由于接连取得“保卫三仓”、“保卫丰利”和“百团大战”的胜利，上上下下喜气洋洋。

当天黄昏，师侦察科报告：处于我军南、北、西三面的敌军增兵，有三路合击三仓的动向。粟裕当机立断，与敌人相向对进，跳出敌人的合围圈。当天夜里就率领师直机关人员向西面敌人来路富安、安丰方向开进。

第二天拂晓，粟裕率队来到鲁家灶。这是一个小村，村北有一条由西向东的小河，河南岸有一条通向安丰的小路。敌人本来习惯于走大路，但是他们发现我军惯走小路，就改变战法，有时也从小路掩袭我军。粟裕估计袭击三仓的敌人可能从村北的小路通过，立即下令：“不能在这里停留，要赶快过河，越快越好！”果然，师直机关的人员刚刚过河，后卫部队就同从安丰出动的敌人交火了。机关和部队虽然安全过河，但是目标已经暴露，只得赶快向北转移。当天中午到达四灶，炊事班立即埋锅造饭。饭菜还没有做熟，又响起了枪声。敌人分路分梯次行动，前面的走过去，后面的又跟上来。粟裕带领机关、部队继续向北走。傍晚到达七灶，刚刚准备做晚饭，北面又发现敌情。于是掉头往南走，转移到张家灶，敌人刚刚从这里袭扰过去。粟裕决定，一面在这里休息，一面侦察敌人动向。

时隔不久，侦察员跑步回来报告：“唐家洋的鬼子集合在打谷场上，指挥官正在训话。一部队鬼子押着抢来的东西往李家堡据点运。”为什么敌人不待天明就集合？为什么敌人急于往据点运东西？粟裕判断，敌人要轻装行动，不是回据点，而是杀“回马枪”。于是立即命令部队集合，继续向南开进，越过海安至丁家所的公路，跳到如皋东面的汤家园地区。

粟裕带领部队走上公路，发现路边有一堆人粪，用树枝一挑，里面还是软的。用手电观察路面，发现有许多新的穿着钉子皮鞋的脚印。

他判断，有一批敌人刚刚通过，后面还可能有敌人跟进。于是决定抓住这一间隙，迅速越过公路。部队还没有全部通过，后续之敌果然从海安方向开了过来。粟裕指挥部队顺利越过公路，到达预定目的地汤家园。这次行动，部队连续行军一天两夜，行程100多公里，终于甩掉了敌人，跳出了合击圈。后来得知，粟裕率领部队离开张家灶以后，敌人果然杀了一个“回马枪”，然而却扑了个空。

## 带鬼子溜弯

1942年5月，日本鬼子又开始了对晋东南根据地的“扫荡”。敌人疯狂扑来，想找八路军太行总部决以死战，以剪除心腹之患。

八路军总部针对敌人的计划，决定分散开来，跟鬼子周旋。彭德怀、左权带司令部，罗瑞卿带政治部，杨立三带后勤部分头行动。

日本鬼子和伪军、汉奸们，白天像梳子梳头一样仔细搜查着每一个山头。晚上在山头、沟底、大小道路上点起篝火，用重兵把守，防止我军突围。

形势越来越严重。罗瑞卿带领大家在山中转了三天，不要说可口的饭菜，连口水都喝不上。山区气温低，到晚上躲在山洞、棚子里常常冻醒。这天，他们发现了一座庙宇。它建筑在半山腰中，下面就是悬崖。高大的林木几乎遮住了它的飞檐和红墙。

警卫连长建议进庙休息，晚上也住在这里。为了防止万一，他可带一个

班在外面放哨巡逻。

罗瑞卿听了，说：“可以进去休息休息。”

小庙里只有两个和尚。前后殿里的佛像由于久未粉饰，油漆已开始剥落。和尚帮助炊事员生火做饭，又用糊米为大伙泡了茶水。

总算吃上了一顿舒心的饭，从地图上看，敌人尚远，这里暂时还是一片净土。一些同志要求住在这里，明天看情况再决定走不走。

罗瑞卿说：“麻痹不得。还是住在山上好，我们撤离前，要清除一切痕迹。”

他们上山了。

夜幕降临，西风虽然不大，却十分寒冷，吹得人浑身冰凉，肌骨发疼。

“罗主任，”连长又来劝了，“请您到庙里住吧，山上太冷。”

罗瑞卿摆摆手说：“不去。你认为是在照顾我，我倒怕钻进敌人的口袋。”

“可是，”连长指指四面黑黝黝的山说，“一个火堆也看不到，也没有枪声，估计不会出什么事。”

“敌人来不来，什么时候来，可不是你说了算。”他吩咐连长加强警戒，然后把大家召集到一起讲故事，分散大家对寒冷的注意力。

他又何尝不冷？围上毯子还觉得太薄。可他想的不是个人能怎样少吃点苦，而是大家的安全问题。

下半夜，同志们陆续睡着了，他也合上眼睛，渐渐进入了梦乡。不知睡了多久，他突然被急促的钟声惊醒。

“当！当！当！”

奇怪，怎么天还没亮，庙里就敲钟？

连长跑过来，怀疑地问：“也许，他们就是这么个规矩？”

“不！”罗瑞卿一挥手，“肯定有情况！都起来！”

“当！当！当！”

急促的钟声，在群峰中回荡。

“同志们，动作轻点！”他压低了声音，“赶紧转移！”

黑暗中，他们向峰顶爬去。罗瑞卿站在一棵大树旁，向小庙望去，只见小庙周围，晃动着火把，隐隐约约听到了鬼子的叱骂声。

“好险！”连长倒吸了口凉气，心中暗暗佩服罗瑞卿的英明决定。

接连几天，他们在山中周旋，却始终没甩开鬼子。鬼子像是嗅到了气味的野狗一样跟着他们。他们在东山，鬼子上东山，他们下沟底，鬼子也赶到沟底。警卫连长怕甩不开敌人，便要求带领一个小分队，在相反的方向向鬼子出击，把鬼子吸引过去，以便罗瑞卿和政治部的同志安全转移。

罗瑞卿听他讲完，看看茫茫的大山、飘逸的云雾，说：“不行。那样你们肯定回不来了。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用这种办法。”

“可是——”“不要再说了。”鬼子越来越近了，当向导的老乡说：“我们到沟崖底下去吧，天不亮，这儿的小路就不会被任何人发现。”

沟崖上面，林深草密，似乎跟别处一样。可是向下一望，天啊，脚下是笔直的崖壁，好像是天神一剑削出来似的。

向导在草丛里找出了一条非常隐蔽的小道，他们互相搀扶着下到了沟底。

沟底还有秘密。在密匝匝的树林后面，有一溜深深的山洞。不是向导指明，人们是极难发现的。沟崖对面又是万仞绝壁。

日本鬼子追到崖上，找不到路，只好胡乱打了一阵枪，撤走了。

罗瑞卿对大家说：“好，咱们在这儿休息两天。下一步，等敌人撤退的时候，咱们要用子弹为他们送行。”

山洞里传来一片笑声。

### 和鬼子“捉迷藏”

战斗在太行山区的我八路军第129师是一支抗日劲旅。指挥这支部队的是著名的“常胜将军”刘伯承。日本侵略者对他始终是又恨又怕，敌人的多次“扫荡”、奇袭，都想打掉这支部队的指挥机关，但却都一次次地以失败而告终。这个故事就是刘伯承无数惊险故事的一个。

1942年5月至7月，日寇以2.5万兵力，对我太岳区、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所在地的太行区进行了“铁桶合围”和“抉剔扫荡”。

1942年5月22日凌晨，一股伪装成所谓“新六旅”的日军独立支队突然包围了129师师部刚刚离开3个小时的会里村。这个日军独立支队是专门执行刺杀我军高级将领任务的“挺身队”。他们身穿中国军服，讲流利的汉语，个个心狠手毒，手段高强，可是此次奇袭却扑空了。敌人不甘心，抓到百姓，就追问刘伯承的踪迹。并又派出大批特务，每日每时都在寻找刘伯承的去向。

6月8日一早，我军又发现大批鬼子从黎城向东开来，并附有一部分骑兵，目标直取我129师师部所在地的黄岩地区。

刘伯承接到报告，立即将师部分成前后两个梯队，一律轻装，经过一夜急行军，从涉县、黎城两股敌人的接合部突了出去，于第2天来到了涉县城南的张汉村。

这一带，山虽不高，但地势险要，沟壑纵横，四周光秃秃的，不便于隐蔽。部队到达后没过多久，就又出发了。时而攀登山岗，时而下到深沟，尽量走小路，有些地方甚至地图上都没有标记，但只有走这样的地方才能避开敌人的围击。

天慢慢地暗了下来，夜幕降临，淡淡的月光不时被浮云笼罩，四周一片漆黑。为了不暴露目标，部队既不能点火，也不能打手电，只有在黑暗中摸索前进。这样走是很危险的，不但有可能迷失方向，还有可能闯到四周鬼子的宿营地。走着走着，刘伯承停了下来，果断地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周围同志大惑不解，刘伯承解释说：“我们这么个大摊摊，走了几十里路，鬼子特务很多，我们不可能不暴露目标。在这里过夜，可能遭到偷袭。让大家打个盹，然后连夜返回张汉村。鬼子怎么也不会料到我们还返回原地吧？”

一席话，说得大家极为佩服。

部队又掉转头来向原驻地张汉村前进了。在漆黑的夜里，走崎岖的山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七转八弯，走了不少冤枉路，直到次日中午，才又回到了张汉村。此时，烈日当空，经过连日的作战、行军，大家精疲力尽、饥渴难忍，刚想在张汉村喘口气，警卫部队就从望远镜里发现在不远处，有一小股敌人正在搜山。部队立即又行动起来，避开敌人。谁知，刚刚翻上一道山梁，发现前面也被敌人占领了。刘伯承从警卫员手里接过望远镜，仔细地观察了一番，发现响堂铺和神头岭方向都是浓烟滚滚，这说明那里也有鬼子，不过，从鬼子盲目搜山的情况看，估计他们并没发现我们。但是，敌我双方



的部队都近在咫尺，交错在一起了，一旦遭遇，四处的鬼子就会很快地麇集过来。因此，要尽量不惊动鬼子。那么，往哪儿走呢？

正在此时，有人报告说，此地几个放羊的老乡告诉了一条“羊肠小道”，这条路是老乡放羊时偶尔走的，地图上根本没标出。刘伯承一听，立即决定走这条小道。刘伯承边走边说：“俄军统帅苏沃洛夫有一句名言：‘凡是鹿能走的地方，人就能通过。’他在1799年就曾经率领一支大军，从人迹罕至的地方翻过了阿尔卑斯山，救出了被困在瑞士的俄军，创造了一个奇迹。我想，凡是羊能通过的地方，我们也能通过。鬼子自然不知道这条路。”刘伯承的腿过去曾经负过伤，但他手拿一根树枝当手杖，和部队一起爬坡钻沟，在这条小道艰难地前进着。

天色渐渐地又暗了下来，可是四周仍有许多敌人在搜寻我指挥机关。我129师师部利用“羊肠小道”摆脱掉白天的敌人之后，一从小道出来，又陷入了敌人的四面合击之中。此时，师部的警卫部队只有一个连。情况万分危机。在此关头，刘伯承镇定自若，命令部队：“除非必要，不要开枪，哪怕是撞对了面，只要鬼子认不出我们来，也不要先开枪，要沉住气。别忘了鬼子现在是闻枪声必集结的。”

刘伯承的话没说多久，果然应验了。

当师部人员刚刚登上一个山岗，就隐隐约约地看见对面山坡上有一支队伍正朝这里走过来。由于夜暗，能见度极差，还以为是自己掉队的警卫部队赶上来了，师机关就向他们迎了上去。可当走到相距只有几十步的时候，突然发现情况不对，迎面而来的是日本鬼子！幸好敌人并未看清对面正是他们苦苦追杀的129师指挥机关。

刘伯承急忙命令部队不要开枪，从侧面过去。部队立即有条不紊，非常肃静地钻入了另一道山沟。这股敌人竟未发现我军指挥机关从他们的眼皮底下走掉了。

入夜，刘伯承终于甩掉了敌人，率队来到一个山凹里。

不久，师直属队及其他部队也都陆续到达安全地区和刘伯承会合。此次突围，我129师指挥机关及直属队未伤亡和丢失一人，又一次挫败了敌人消灭我指挥机关的阴谋。

## 太行山上急行军

1942年6月，正值太行山的盛夏，骄阳似火，酷暑难当。

黄贝坪村的八路军第129师指挥所里笼罩着一层忙碌、紧张的氛围。

大规模的日军正采用正面包围、两翼迂回的战术，向第129师逼来。企图将师指挥机关和部队压缩在第4分区方圆不过40公里的狭小地域内，然后进行“抉剔”、“清剿”，逐个消灭。

刘伯承师长仍像往常一样，端坐在指挥桌前，神情镇定、安详。对于敌人惯用的伎俩，他早有预料，并已作好了以外线突击与内线坚持相结合对付敌人的部署。如今看来，这些部署与当前的敌情是相符的。眼下，可以按预定计划转移了。

烈日炎炎，像要把世间的一切都要烤化。“轰轰”、“轰轰”……敌人的炮火拚命地吼啸着，我们的队伍就在烈日和炮声中急速前进，时而登上山脊，时而下到沟底。马不停蹄，一走就是半天。残阳如血，天色已近黄昏，

官兵们又渴又饿，行军的速度越来越慢。

刘伯承估计着已远离敌人 10 公里以上，暂时不会有危险，便下令让部队休息一会儿。

一停下来，大家不约而同地抓紧时间喂已造了半天反的肚子，抓起炒熟的黑豆、麦面使劲儿往嘴里塞。

刘伯承的肚子也早已是瘪瘪的了。便也同大家一样把黑豆、麦面当成山珍海味一样吃起来。可刚吞了两口，便再也咽不下去了。没有水喝，嗓子干得要冒烟，哪里还有吞咽的能力。刘伯承伸了伸脖子，使劲往下咽。嗓子被弄得生疼，那点麦面依旧顽固地粘在嗓子眼儿，就是不往下去。

“师长，您……怎么样？”警卫员同样一副痛苦不堪的模样。

“我……好得很。你呢，小鬼？”刘伯承使劲儿装得像平日一样。

“师长，一滴水都没有了。”警卫员用力摇了摇明知是空空如也的水壶，特别难受，特别愧疚地望着刘伯承，“到处都找不到一滴水，有些同志已经喝马尿啦。”

“马尿……嗯，还好喝，比羊尿好喝。就是有点……咸、酸。”刘伯承一副很有经验的模样，微笑着说。

突然，传来战士们兴奋的喊声“水！找到水啦！”

刘伯承的脸上闪现出一种孩童般的欣喜，他“嚯”地站起来，拄着一根手杖，高兴地说：“走，看看去！”

在一个山洼洼里。果真有一个水坑——是老百姓的牛在里面蹭出来的，坑底有点浑浑的泥水，泛着暗绿色的光，散发着一股难闻的腥味，坑旁边还有几堆牛粪。由于实在口渴难当，战士们便也顾不上脏，用茶缸舀了就要喝。

“慢一点，慢一点，小鬼。不要这样喝，会拉肚子的。”刘伯承急忙制止住这些冒失的战士。“你们不看看这水有多脏。”说着，他取出一条毛巾，在水坑边蹲下，用毛巾在水面上蘸一蘸，然后拧进碗里。他做得那阵细心，那样小心翼翼。一边拧，还一边念叨：“这样干净些，细菌会少些。”而后，又蹲下去，蘸水，又站起来，拧水。一会儿功夫，就拧出大半碗“清”水来。他端到一个个嘴唇干裂的战士们面前，疼爱地说：“小鬼，喝吧！”

一双双眼睛闪着感激和崇敬的目光，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师长，您先喝！”

“我不要紧。你们年轻，消耗大。你们先喝。润润喉咙，坚持一下，冲出危险地带，下山就有水喝了。”

战士们的眼睛湿润了。这群面对死亡连眉头都不皱一下的硬汉子们被首长真诚的关怀、疼爱，深深地感动了。他们就着师长双手捧着碗，依次轻轻抿了一小口……水，像清泉般流进人们心窝。它，比琼浆玉液都要甜，都要美呀！

入夜，队伍继续行军。山路崎岖，夜里的能见度差。刘伯承弃马步行，他已经 50 岁的人了，长期的战争生涯留下了一身伤痛。警卫员要用担架抬他，他摆摆手，操起一根树棍当拐杖，迈开大步朝前走去。

走了一阵子，发现左前方山上燃起了几股大火，升腾起冲天的火焰，传来嘈杂的人声和牲畜的惊叫。

刘伯承对身旁的李达、唐天际等人说：“一定是鬼子在那里烧杀抢掠了。他们的行动满快嘛！打算把我们压缩到合击圈的中心咧。不能按原计划朝北走了，那样的话，正好碰到敌人的钉子上。你们想想看，还有什么路可走哇？”

“往西有一条羊肠小道。从西北这条大岭过去，经宋家庄的北山，再向北翻过香炉峽，往西直插石盆凹，不远就是黎城与东阳关之间的公路。一过公路是东、西黄须，紧挨上、下桔花。这条路是老百姓放羊走出来的，穿谷傍崖，不少地段很险要，恐怕部队难以通过。”李达有些担心。

“出敌不意才能稳操胜券。俄军统帅苏沃洛夫有一句名言‘凡是鹿能走的地方，人就能通过。’当年，在他70岁高龄的时候，率军人迹罕至的阿尔卑斯山，救出了陷在瑞士的俄军，创造了人间奇迹。我想，对于我们而言，‘凡是羊能通过的地方，人也能通过’。鬼子不会料到我们走这条路，这样安全就更有保障。”说着，他站立起来，果断地一挥手：“我们就走这条牧羊道！”

夜幕罩着山野，像一口黑锅一样扣住了绵亘的山峦。从伍行进着，只听到沙沙的脚步声和偶尔踩塌石头的滚动声。

山，越来越高，越来越陡；路，也越来越窄，越来越险。刘伯承拄着拐杖，在警卫员的搀扶下艰难地攀登着。无尽的劳累使他积年老伤又犯了，中过弹的右颊又胀又痛，负过重伤的右腿一阵阵麻木。他努力忍受着，努力稳住脚步，不让大家看出来。

“砰——”，“砰砰——”，不远处传来一阵阵枪声和声嘶力竭的吆喝声。

“这是鬼子的搜索队在放空枪。夜过坟场吹口哨——给他们自己壮胆的。”刘伯承诙谐地说，“不用理他们。”

大家被他的诙谐、镇静感染了。脚下的步子也似乎变得轻松起来。

又是一阵急行军。在这山峦起伏、怪石突兀的牧羊道上走夜路，实在不同于走公路大道。连大白马都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打着响鼻，有时踟蹰不前，有时失蹄跪倒。小伙子们个个都两腿灌了铅似的，汗流如注，张着嘴出大气，可大家谁也不叫一声苦，不喊一声累，因为在他们前面有一位年过半百，遍体伤痕的老人，正拄着拐杖，同他们一样不停地攀登。那就是他们敬爱的刘师长。

“师长都50多岁了，一只眼睛走夜路多难呀！”

“他的右腿负过重伤，平时都一拐一拐的，真难为他。”

“为了打鬼子，他是在拚老命呀！走！跟上去。”

大家互相鼓励着，不断前进。天色变得更加黑沉沉的，只能摸索着向前移动。

一个战士问道：“快要天亮了，为啥还这么黑漆漆的？”

刘师长扬起手杖，指向天空，意味深长地说：“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冲破这片黑暗，太阳就出来了。”

终于，朝霞映红了天际，雄伟的太行山又呈现出伟岸的英姿。部队在刘师长的带领下，经过一夜的艰苦行军，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一轮红日从东方喷涌而出，阳光把太行山装点得格外壮美。不知谁领头哼起了《我们在太行山上》：

“红日照遍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

“我们都姓‘共’”

整风运动后，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又叫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会上，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的谭政就军队中的军阀主义倾向作了题为《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分析了军阀主义残余的各种表现、危害和产生的原因，同时提出了纠正的方针政策和要求。这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报告，叶剑英元帅后来称它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我军政治工作的又一历史性文献。

然而，这一历史性文献的产生过程，还有一段插曲。

在一个严冬的日子，毛泽东为起草这份报告专门约见了谭政。那天，黄土高原上的西北风刮起了大风沙，让人看不见天，看不见地。谭政迎着狂风来到毛泽东的窑洞前，毛泽东微笑着迎接了客人。

寒暄后，转入正题，毛泽东说：“谭政同志，你考虑过没有？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学各界高级干部整风会议上，揭露和批评军队那些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军队本身存在的军阀主义倾向，以及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种种矛盾的劣根性。”接着，毛泽东谈出了自己的想法：把当前军队存在的种种问题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通过民主检查大会加以揭露，从而纠正不良现象，平复不满心理，以造成军队内部亲切友好团结的空气，激发官兵的积极性，提高部队战斗力，迎接即将到来的大反攻高潮。

“谭政同志，你回去作些准备，把整风运动中，高干会上对军队方面提出的那些意见理一理，再在部队里开展一个民主运动，对各级领导上的错误揭露一番。你带机关干部再深入部队作些调查研究，写成报告，提出改进的办法来！”

两人一边研究一边讨论着，不觉已到了吃饭时间，警卫员端上饭来。

“哦，该吃点东西了，不然的话肚子又要开船了！”毛泽东风趣地说。

“什么好吃的呀？”谭政一边走到桌旁一边问。

“好吃！好吃！辣子炒苦瓜，咱们家乡菜。”毛泽东边说边示意谭政“入席”。

“现在大冬天，哪来的苦瓜？”

“还不是我那块菜地的收获吗？秋天摘下来的，炊事员老王收在地窖里。知道是你这湖南老乡来了，专门炒给你吃的！”毛泽东笑着说。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谭政深有感触地说。

“还记得井冈山时期，开始不懂得发动群众，也不维持部队纪律，搞得军队和老百姓关系恶化，弄得咱们没粮食吃，咱俩也天天一个房子里喝南瓜汤吗？”

“记得，当时熬夜写文章，能吃碗带咸味的南瓜汤就算好的了！”

“缺粮，又少盐啊！”毛泽东用筷子敲了敲碗边说，“现在咱们吃的什么呀？现在吃的是小米饭。你说，要是不关心群众，军队不开荒生产，咱俩能这样‘丰衣足食’吗？”

“哈哈！”谭政笑了，毛泽东也笑了：“所以，你这次在高干会上的报告，不仅要解决官兵关系的问题，还要检讨军民关系，检讨军队和地方党、政府之间的关系……”

“好了，主席，今天来你这里，肚子喂饱了，脑子里也装满了你的教导。该回去了，回去好好消化消化！”

毛泽东送谭政出门来，像想起了什么事，突然在院子里停下来，问道：

“你今年有多大岁数？”

“38岁了。”谭政不明白这突如其来的问话的意思。

“孔夫子说过‘三十而立’，你是快40的人，那早就该‘立’了？”

“嗯！”谭政还以为毛泽东在鼓励他承担起草《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的任务哩，便莫名其妙地应了一声。可又见毛泽东用右手食指在左手心里比划着，就等候着毛泽东的问话。

“我知道你原来的名字叫谭世名。可你注意过现在的名字——谭政吗？”毛泽东问。

“这个我不曾想过。”

“你数一数‘谭政’两字是多少笔划？”

谭政也用手指在另一手心里比划着：“28划。”

“那你再数一数我‘毛泽东’三字多少笔划？”

谭政数过后：“也是28划。”

“咱俩从井冈山到长征到延安，共事15年有余了，大概你没有想过这一个十分简单的数字。好哇，这28划不平常啊！你看，共产党、共产主义的‘共’字，不就是廿八吗？”

谭政恍然醒悟过来，会心地笑了。毛泽东停顿一下，又说：

“我们都姓‘共’，做了共产党的人，都是信仰共产主义，并为实现共产主义在奋斗呀！”

一个“共”字，把毛泽东、谭政两人紧紧连结在一起，这也是毛泽东委托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的用意。

### 许世友胶东反“扫荡”

1942年11月，胶东大地渐渐地换上冬装。从渤海湾吹来的朔风，一阵紧一阵。

日军很快就要大“扫荡”的消息，也传得一阵更比一阵紧。

这时，上级正式通知许世友，日酋冈村宁次已经由北平飞往烟台。

冈村宁次是日军驻华北派遣军最高司令官，以嗜血成性和阴险狡诈而臭名远扬。他亲临胶东半岛，决不是偶然的。胶东半岛三面环海，一面沟通冀鲁平原，水陆交通便捷，物产富庶，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在日本法西斯“大东亚圣战”的战略计划中，一直把胶东作为往来于海上与华北之间的重要通道和“以战养战”的补给基地之一。

在敌人的冬季大“扫荡”之前，上级调许世友来到胶东半岛，任胶东军区司令员，林浩任政治委员。

许世友，中国军队的传奇式人物。以其特殊的性格、特殊的经历、特殊的贡献，而闻名中外。早在红军时期，就已担任红军军长，是赫赫有名的战将，以敢打硬仗恶仗而闻名。时年37岁的他，正是人生鼎盛之年，风华正茂、经验成熟。爱打恶仗、硬仗的性格，使他决心在这次反“扫荡”中一试身手，让驻胶东的日本鬼子尝尝他的厉害。

11月上旬，许世友在海（阳）、莱（阳）边区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作了紧急的反“扫荡”动员，研究部署反“扫荡”作战。

11月17日，敌人突然由青岛、高密派出汽车六七百辆，沿烟青公路、烟（台）潍（坊）公路向莱阳、栖霞、福山等地大量增兵。

21日清晨，天色阴沉，朔风骤剧。蛰伏在栖霞、牟平、海阳、莱阳边区，“拉网”合围以牙山、马石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合围圈南北不过90公里，东西仅75公里。日军出动1.5万人，加上伪军和投降派赵保原等部5000余人，总兵力达两万人，另有海、空军配合“扫荡”。

敌人多路分进合击，密集平推。曾得意地夸口说：

“只要进入合围圈内，天上飞的鸟要挨三枪，地上跑的兔子要戳三刀。共产党、八路军插翅难逃！”

敌人的大规模“扫荡”开始了。许世友率领胶东地区军民积极投身到反“扫荡”斗争中。

各村普遍实行“坚壁清野”，日军常常利用狼狗搜寻地洞口，这是很厉害的一手。

但群众研究出一种好办法，即用辣椒面拌上烟梗末撒在地洞口的周围，狼狗一闻到这种刺激性的气味，连打喷嚏嗅觉顿时失灵，再如部队的女同志和地方妇女干部多数剪了短发。敌人在“扫荡”中，见到妇女就查头发，专门抓捕、杀害安假发的妇女。在妇救会的动员下，东海几个县的妇女纷纷剪掉头发，使敌人真假难辨。

敌人的“网”愈收愈紧了。24日，日军收“网”合围马石山。

莱（阳）、海（阳）、栖（霞）等地群众2000多人被围困在山上。执行任务途经马石山的警卫连3排，毅然留下来带领乡亲们连夜突围。他们和地方干部、民兵一道，往返数次冲破敌人的“火网”，护送出群众1000多人。

拂晓以后，当他们再次杀进重围抢救群众时，被日军团团包围在山峦上，战士们燃烧着复仇的怒火，奋勇杀敌，英勇献身，血染马石山岗。在马石山合围的激烈战斗中，许多地方工作人员，民兵和群众纷纷以树棍、石头与日军拼杀，宁死不屈。

丧心病狂的日军，在攻占马石山后，将抓捕到的500多名群众全部杀害，老弱妇孺，无一幸免，制造了惨绝人寰的“马石山惨案”。

听到这一消息，许世友直气得牙齿咬得格格发响。但是，他没有冲动。这位貌似粗犷，其实很细的将军，此时清楚地知道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冷静，比什么都重要。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硬拼是没有出路的，必须争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才能战胜敌人。

此时，胶东我军兵力共1.4万余人，日军有2.7万余人，加上顽固派、投降派的队伍，超过我军总兵力数倍。敌人依仗军事上的优势，采取分割封锁的“蚕食”、“囚笼”政策，在边沿区安设大量的据点，以小规模的分区“扫荡”相配合，逐步向根据地推进，由点到线，由线到面，进行伪化活动，变根据地伪化区，并逼群众沿交通线和抗日根据地周围垒封锁墙，挖封锁沟妄图摧毁胶东抗日根据地。

许世友认真思索对策，他与军区其他领导一起，制定了破敌之策。坚决保卫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战，把军事斗争和政治攻势紧密结合起来。

胶东军区军民在许世友的率领下，以巧战破敌，搅得敌人日夜胆寒。

在敌人“蚕食”推进最严重的西海区，抗日武装变被动为主动，接着发起店子、纸房等战斗，围困古岬，逼近平度。

崮山后村边的一处据点，驻守伪军1个连，修有八九座碉堡和一道壕沟。我西海军分区1个营，深夜潜入崮山后村内，隐伏一天一夜，敌人毫未觉察。第2天黄昏，伪军正在开饭，我军突然发起攻击，5分钟内攻破围墙，当夜

完全摧毁据点，歼灭伪军 100 多人。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西海共建立 400 多个村的抗日政权，新开辟莱西旌顶山区，掖县南、北大部分敌占区成为游击区，使敌人征粮区缩小了五分之四。

南海地区抗日武装开展驱逐顽固派隋永霄等部的斗争，恢复烟青公路西、胶路北的大片地区，建立 4 个区的抗日政权。新开辟平度水泊、上河头、院后一带，控制即墨 10 区。

一次，古岬据点的伪军 1 个中队，押解 400 多辆车子，满载小麦 10 多万斤，去送交平度日军，途中遭我南海地区一部伏击，车子、小麦全部截获，活捉伪中队长以下 27 名，我军无一伤亡。

12 月间，许世友亲自出战，许世友带第 16 团攻打旺远。

旺远，在烟台南 10 多公里，驻伪军约 1 个连，用石头砌成 1 座大碉堡，有四层楼高。许世友率部星夜奔旺远，指挥所设在旺远南 1.5 公里处，部队连夜发起攻击。

许世友叫作战参谋从当地小学教员那里借来一本《三国演义》，未等看完关云长“温酒斩华雄”一节，主攻部队告捷。他们用 25 公斤炸药送进碉堡门里，轰隆一声巨响，大碉堡顿时炸了个通天透，守敌统统坐了“土飞机”。

作战参谋高兴说：

“司令员，关云长是温酒斩华雄，你是看书灭敌军。”

许世友哈哈一笑：

“那关云长温酒斩华雄是假，我看书灭敌军是真。”

一副大将气概。

为了摧垮敌人在烟青公路两侧的封锁，打通 4 个海区抗日武装的联系，许世友领导胶东军民有计划地组织了为期 5 个月的烟青公路大破袭，动员群众 15 万多人参加，填平封锁沟 440 多公里，使敌人设封锁沟的计划付之东流。

我军在积极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对敌政治攻势也逐渐加强，大力开展对敌占区群众宣传工作和敌军、伪组织人员的争取瓦解工作。有的巧妙地通过内线，把抗日宣传品放置在伪军的被子里，伪军临睡一看，大惊失色，说：“八路真是神兵！”有力地瓦解了伪军的士气。据统计，自 1943 年冬到 1944 年初，全区共散发、张贴抗日宣传品 10 多万份。

许世友十分重视发挥民兵的作用，发动民兵创造了地雷战、麻雀战等战术。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胶东民兵，始终站在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斗争的第一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胶东武装民兵在主力部队和各区地方武装的支持和配合下，活跃在村头地边，沟坎山坡，广泛开展分散性、地方性的游击战，组织“村村联防”，实行武力与劳力相结合，武装保卫家乡，保生产，用各种方式同日、伪、顽斗争。在胶东战略要地大泽山区，民兵以地雷战、麻雀战对付敌人，“时时枪声响，处处地雷炸”。

一次，日伪 1500 余人侵入大泽山，刚爬上一座山坡，脚下地雷就开始炸响，在不到 1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踏地雷 30 余处，被炸得人仰马翻，血肉横飞，顿时死伤 70 余人。

只吓得日军官兵寸步不敢挪动，战马原地兜圈嘶嘶，不得不草草收兵回营。

在 1943 年反“蚕食”、反封锁斗争中，胶东军民对日作战 975 次（平均每天作战两次以上），攻占日伪据点 23 处，歼灭日伪军 1.03 万余人，扩大

根据地 400 多平方公里，粉碎了日寇的“蚕食”推进政策，基本打破了敌人对胶东根据地的分割封锁，为 1944 年开始的局部反攻奠定了基础，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 勇赴“鸿门宴”

1943 年 6 月底，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周恩来同夫人邓颖超从重庆出发经西安返回延安。

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决定在西安给周恩来一个下马威，煞煞共产党的锐气。

7 月 9 日，周恩来和邓颖超抵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刚刚安顿下来，就有人送来胡宗南的请柬，邀请他们参加专门为他们接风的盛大宴会。

“胡宗南又有什么花招？”邓颖超看着那张烫金的豪华请柬，疑虑地问。

“不过是场虚张声势的‘鸿门宴’，恐怕是他们对共产党，对我有气，想给我一个下马威罢了。”周恩来镇定自若，“颖超，此次赴宴，我一人前往，你就称病不去。万一他们下毒手，你就立即报告党中央……”

“恩来，你要多加小心！”邓颖超不免有些担心。

“放心吧！”

这对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革命夫妻彼此信赖地微笑着。

胡宗南怕周恩来拒绝，便特意派副官熊向晖坐专车来接。熊向晖是我党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地下党员，他利用此机会用英语告诉周恩来：“请小心，提防被灌醉，我会设法保护你！”周不露声色，紧紧地握了一下他的手，这一握包含了多少革命同志间的言语呀！

汽车穿街走巷，很快到了小雁塔荐福寺。欢迎宴会就在这里举行。

周恩来款步走下车来。

胡宗南已在院内恭候多时，看见周恩来，忙趋步上前，“啪”地一个立正，而后表面十分热情亲切地微笑着对周恩来说：“周先生，一路辛苦了！”胡宗南是黄埔第一期学员，而当时周恩来任校政治部主任，故而胡宗南称周恩来为先生。

周恩来微微一笑：“胡副长官，不必如此拘礼嘛！”

两人并排走进宴会厅。30 多位身着戎装的军官和打扮得花枝招展，雍荣华贵的夫人们立即起立，热烈鼓掌。这些军官们都是黄埔六期以前的上将级军官，个个能言善辩，绝非等闲之辈，是胡宗南专门挑选来对付周恩来的。周恩来似不经意地环视了一周，发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并且清楚记得这些熟悉面孔们早先在黄埔就读时的表现。他更加胸有成竹，态度自若地接受他们的问候，并很有分寸地和其中一些人交谈一二。

宴会开始，胡宗南的政治部主任率先走上前来，彬彬有礼地向周恩来敬酒：“在座的黄埔同志先敬周先生三杯酒，欢迎周先生光临。请周先生和我们一起祝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身体健康，请干第一杯。”他笑容可掬地望着周恩来。

周恩来不慌不忙地举起了酒杯，面庞上仍带着那种特有的优雅适度的微笑，说：“为了表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诚意，我作为中国共产党员，愿意为蒋委员长的健康干杯。在座诸位都是国民党党员，也请诸位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



一语惊四座，谁也没料到周恩来会如此回答，都怔住了。一时间，整个大厅里鸦雀无声。那位政治部主任尴尬地站在那里，手里的酒杯仍举着，不知如何处置。

周恩来仍旧微笑着：“看来诸位有为难之处，我也不喜欢强人所难，这杯敬酒就免了罢。”说着，放下了酒杯。

仍怔在那里的胡宗南半天才回过神来，忙满脸陪笑道：“周先生的幽默谈锋依如当年，令胡某钦佩，钦佩！”

其他人也随声伪善地附和着。

过了一会，几位夫人一扭一扭地走来，向周恩来举杯道：“为了发扬黄埔精神，我们每人敬周先生一杯。”

周恩来没急着端起酒杯，而是反问道：“我倡导的黄埔精神是什么，想必夫人们一定知道，那就请回答出来，谁答的对，我就同谁干杯。”

顿时，这些漂亮的夫人们膛目结舌。只知道安排的程序里有这一项，谁也没关心到底什么是黄埔精神。

胡宗南又赶忙出来打圆场：“今天只叙友情，不谈政治。”

周恩来便和这些夫人们周旋。不知说了些什么，竟使她们一个个笑得花枝乱颤，欢喜而归。

隔了一会，又有十几位将军列队成行地走过来：“当年我们在黄埔军校学习，周先生是政治部主任，同我们有师生之谊，我们每人向老师敬一杯。”

周恩来依旧态度优雅地说：“刚才胡长官讲，今天不谈政治。你们又提到我当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不能不谈政治。”说到这里，他转向胡宗南：“这杯酒是不是不该喝呀！”

胡宗南的气恼是可想而知的，但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话对答，只好说：“他们犯规，酒该他们喝。”

将军们只好彬彬有礼面带笑容地干了杯，回到各自座位上。他们心里那个急呀！宴会的时间快过去一半儿了，别说没把周恩来灌醉，就连一杯酒还没让他喝下去，而且还受了他一顿不动声色的奚落。真是窝火。怎么办呀！看来胡副长官布置的任务完成起来没想象的那样容易。

这些道貌岸然的将军们为想出一句恰当的祝酒词绞尽了脑汁。

几位夫人交头接耳后，又一同起身来到周恩来跟前说：“我们敬周夫人一杯，祝她康复，回延安一路顺风。请周先生代她分别和我们干一杯。”

周恩来听后，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神情严肃起来，说：“你们提到延安，我要顺便谈一下，前几年延安人民连小米都吃不上，经过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日子比过去好多了，可仍然很艰难。让邓颖超喝这样好的酒，她会感到于心不安。请各位喝酒，我代她喝茶，我们彼此都尊重。”说着，也不管几位夫人如何反应，就举起茶杯，一饮而尽。

时间一点点流逝，胡宗南和在座所有军官、夫人的心都焦急非常，可就是找不到还击周恩来的机会。周恩来总是一副不愠不火，不卑不亢的样子，举止优雅洒脱，礼节适度周到，宴会的气氛也一直维持着表面上的友好和谐。

将近尾声时，周恩来举起杯：“感谢胡副长官的盛情款待。胡副长官告诉我，他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意图，他指挥的部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向大家敬一杯，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打败日本侵略军，收复被日寇侵占的中国山河领土，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独立、自由、幸福的强大国家！”说完，他一

饮而尽，而后告辞。

周恩来乘胡宗南的专车在熊向晖的护送下离去了，胡宗南呆呆地站在院子里。一场精心准备的“鸿门宴”就这样毫无结果地结束了。

## “飞兵”渡黄河

到中原去！

到抗战第一线去！

1944年冬，王树声被任命为河南军区司令员，他从毛主席那里当面受领了任务，积极筹组部队，从延安开赴豫西抗日战场。王树声率领的部队，跨太岳、绕太行，兼程疾进，来到中条山下。途中，曾收到电报，说黄河封冻，要他们趁机尽快渡河。所以，指战员们在山麓喘息未定，王树声就传令：

“翻山。”

大家抬头望，这中条山，突兀峥嵘，煞是巍峨。黄昏时分登山，上到山顶已是黑天了。雪光映照下，只见山巅是一块大平场，周围农家户户。大家正寻思，这下总该歇歇脚了吧。可司令员问了问前后情况，手一挥：“下山。”

常言道：“上山容易下山难”，更何况目前又是这冰天雪地呢？！特别是那厚厚的雪，被千军万马一踩，磨得镜光，稍不注意就是一跟头。开始，几个警卫员还前边扶、后边拉，护着首长慢慢往前挪，可挪着挪着，就“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摔了个七仰八歪。王树声连连摆手，笑道：“好啦，好啦！我看咱们还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

他自个儿拄了根棍子，溜溜滑滑往前走。几个警卫员依然前后左右护着，互相提醒：“小心，小心！”

终于，天亮前，全军下了中条山，来到了黄河岸边。

王树声和其他领导经过研究决定，先组织试渡。

侦察分队的30名勇士，肩负重任，在首长们的目送下，斗志昂扬地登船启程。万没料到，离岸不远，一块楼般高的浮冰排山倒海而来，渡船躲避不及，被撞了个粉碎，船上的战士很快就消失在水中。

试渡证明靠船渡河不行。王树声和他的助手们心急如焚，齐聚滩头，思考良策。

此时，得到情报大批日伪军正兵分两路，向我军夹击而来。前有黄河挡道，后有追兵赶来，别无他途，只有想办法迅速渡河。

王树声提议：“眼下当务之急，是找一些有经验的老船工，向他们讨教。”

旋即，大批侦察员被派出去寻找老船工。

不一会儿，一个侦察员领着一位老汉回来了。王树声连忙迎上去，急切询问他过河的办法。

老汉说他是刚从河对岸过来的，并指了指背上背的一捆木炭说：“我是踩冰过来卖这个的。”

“这么说，黄河上游封冻了？”王树声音调颤抖地说，“请您老人家带我们过河好吗？”

“中！”老汉点点头说。“那得等我卖了这些木炭。”

“好，这炭我包了！”王树声兴奋地说，“多少钱？”

老汉伸出一个指头。

“噢，一块？”王树声回头对管理员说：“给五块。”

老汉惊呆了，这辈子还没见过这样仁义的军队，他动情地望着王树声说：“你们就是八路军吧，早听说了，今天见了果真不假，真是咱老百姓的队伍。走我给你们带路！”

于是，部队在这位老汉的带领下，悄悄地过了河。王树声一直站在河岸边，看着全军都平安地过了河，才动身。

等到敌人来到河边时，冰已开封，无法渡河了，气得鬼子只有“望河兴叹”，冲着河对岸乱放了一阵子枪。

八路军“飞兵”渡黄河，沿途群众拍手称快，他们说：“自古到今，黄河只冰封过两次，一次是刘秀过河，走的就是冰道，过罢，冰就开了；再一次，就是咱们八路军。真是‘天顺人心’，俺们有救了。”

### 三打“大寨子”

1944年末，王树声带着一支队伍由延安浩浩荡荡向中原挺进，他是奉党中央、毛主席的委派，前往河南，组织河南军区，建立根据地。经过转战跋涉，王树声率部来到河南西部的渑池县。

当时，豫西情况比较复杂。最显著的一个特色，就是“土围子”星罗棋布于广大农村。这些“土围子”，近似《水浒》中的“祝家庄”：在封建地主的大小头目统治下，一个个乡、村、镇都用泥土砖石围了起来，明碉暗堡林立；其中有的打着抗日招牌，有的扯着反共旗号，还有的标榜国、共、日都反……，真是五花八门的旗色，复杂混乱的政治背景。但都有一共同的手法：都不让共产党进他们的围子，更不许八路军接近围子的老百姓。

王树声心中有数：这些“土围子”，绝大多数是为“保家活命”的。他们之所以不要外界接近，主要原因是，这些年来河南人民，确实被水、旱、蝗、汤（恩伯）的“三灾一害”和日伪军的烧杀抢掠给害苦了，同时，长期受到反动宣传影响，不明了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救国的真相。所以，部队进入豫西，王树声就谆谆教导干部和战士们，要体贴人民、爱护人民；并约法三章：不进围子，不走小路，不踏青苗。

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老百姓逐渐改变了对我军看法，认识到我军是一支抗日的队伍，从不侵犯他们的利益。绝大多数的“土围子”被争取、说服和团结过来了，可仍有少数，对八路军还是采取软拖硬抗的态度。其中，有的“脚踏两只船”，不大相信八路军的实力，对这类人好办，王树声派出一支人马，拖着小钢炮，驾着重机枪，在朦胧的月光中绕着这些“土围子”显示“威力”，并向他们喊话，宣传抗日道理，开展“政治攻势”，很快就能收到成效。最棘手的是极顽固分子盘踞的“土围子”。他们仗着人多势众，工事坚固，粮弹充足，扬言：“决不买共产党的帐，誓不与八路军为伍！”这些“土围子”的问题不解决，既是前进的障碍，又是身后的祸害。经过反复思考，缜密研究，王树声选择了登封附近、距司令部不远的一处大寨子，作为首先开刀的对象。

这个大寨子，号称千人铁军。寨主原是国民党的一个上校团长，凶残恶煞，目空一切。因为当初日本侵略军尚不摸他的底细，曾跟他有过一次小小的交手，没把他怎样，他就更趾高气扬，吹嘘日本皇军也是他的“手下败将”；此后，日本人给了他些“甜头”，他就又跟鬼子暗送秋波，成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死对头”。为此，先期在那一带活动的八路军小部队也曾与其接触，

没有什么结果，更助长了这个反动寨主的凶焰。

这次，王树声下令当地军分区司令员皮定钧旅长二次攻打此大寨。怎奈打了两三天，又打了个“平手”。寨墙太厚了，一般武器攻不动，想爬上城头，又被密集的手榴弹所阻，皮定钧旅长匍匐过麦垄看地形时，被土炮的铁砂粒炸了满身眼子，差点上了大当……

如此军情传到王树声耳里，他火了！立即率领主力亲自出征。来到阵前，他翻身下马，观察地势，把寨子里里外外的形势研究了个仔仔细细。随后和大家商定了一个周密的作战方案。

在王树声亲自指挥下，“三打大寨子”的战斗打响了。

拂晓时，一辆“土坦克”向寨子移动过来。这个“土坦克”正是王树声和大伙一起设计的，它是以一个人顶着张桌子，桌子上面再盖上湿棉絮当“装甲”，专门用来消耗敌人弹药的。寨子上的敌人看不清是何物，就枪弹齐鸣，正中王树声的计。

天亮后，“土坦克”撤下，八路军时不时就发起一次小冲锋，不让敌人歇下来。

就这样两天过去了，敌人见八路军不过如此，更加得意起来。正在敌人得意忘形的时候。第三天，东门的激战又开始了。八路军猛攻东门，惊得敌人不敢怠慢，投入所有的兵力招架。这时，只听“轰”的一声巨响，北边的寨墙被炸开了一个大豁口，接着无数的八路军战士从这个缺口杀了进来。王树声声东击西的战术奏效了。顷刻，敌人的防守被瓦解了。这个顽固的“土围子”就这样给拔掉了。

